

Emily Honig

1850—1980

苏北人在上海

〔美〕韩起澜 —— 著 卢明华 —— 译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出版说明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原名《创建族群：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作者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教授韩起澜(Emily Honig)。本书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简体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收于“上海史研究译丛”中。全书以上海的苏北人群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相关研究著作、档案材料和口述访谈，通过考察其历史经验，分析其来源、群体形象及身份认同，阐述苏北人这一群体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反复建构和延续的。长期以来，苏北人作为一个事实而存在，他们所经历的浮沉命运，呈现了近现代上海历史的复杂面相，然而对其进行深入而具突破性的学术研究者，则为数寥寥。历史学家韩起澜的这部作品，在研究苏北人领域的著作中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它使我们重新将视线聚焦在苏北人群体身上，探析他们在近现代上海历史中的生存境遇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本次再版，本社对2004年出版的简体中文版本进行了修订，提升了译文质量，并新增索引部分，以期完善本书。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时代和观念的影响，本书部分内容和观点存在局限性。尽管西方的族群理论在我国的历史学、民族学研究中已被经常应用，但这些理论始终伴随着争议。对书中将美国多种族民族国家的族群概念简单套用在同种族民族国家的中国社会中的做法，我们持保留看法。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广大旅沪劳动人民逐渐摆脱了旧社会时备受压迫的境遇，遗留在部分上海市民心中的对于苏北人的偏见，也逐渐消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本社引进并出版本书，着眼于其学术创新性和史料的丰富性，对其个别观点上的局限性，冀望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本书时注意鉴别。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6月

献给罗莎和马娅

前言

本书论述上海的族群，撰写本书起意于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城。1977年，我初次来到埃尔帕索，同两位朋友一道，从事对卷入1972—1974年法拉制造公司罢工的奇卡纳女工的口述史研究工作。奇卡纳女工在罢工期间形成的联合组织令人印象深刻。听说这次罢工也被描绘成奇卡纳和墨西哥的女工之间的分裂和对抗，这让我们最初感到困惑。我们在1978年和1979年回头进行深入访谈时发现，这些分裂派系夹杂着像埃尔帕索那样的边城所具有的族群含义。

1979年我来到上海，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棉纺厂女工史。在那时，我总是能想起在埃尔帕索采访过和结交过的妇女们，我们曾试图解开关于她们团结和摩擦的谜团。也许是无意识地，在埃尔帕索令我全神贯注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研究，因为不无巧合的是，上海女工内部（特别是在来自江苏省北部和南部的女工之间）的分隔，成为本研究的主导旋律。长江对江苏的分隔，令人回想起（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格兰德河所代表的分隔，该河把埃尔帕索同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城分隔开来。根据上海以原籍为基础分隔的最初提示，我加紧采访和阅读文件资料以探索这种分隔对女工生活的含义和对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发展的影响。

然而，在有关女工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中，有一个基本问题依然无法回答，这关乎来自江苏南北两个地区的人之间分隔的根源，尤其是江苏北部土生土长的人即苏北人地位低下的根源。有两点认识使我有兴趣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第一，分隔并不限于棉纺厂，而是事实上在上海形成了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第二，这种分隔及对苏北人的偏见在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存在。于是，本书在刚开始的部分，试图分析在上海出现这种偏见的根源。起初我设想的是写一部关于上海苏北人的历史。

由于有关苏北人的资料极度匮乏，好几次我差点放弃这个项目。但最迫使我放弃的是一个惊人的认识，我在已经工作好几年之后才意识到，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我一直以为，包括我的大多数知情人也都以为，谁是苏北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在我开始调查时，我发现苏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关于某个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该地区可以包括整个江苏北部，也可以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邻省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以及江苏南部的某些地区，就看你问谁了。它可以按地理、语言或经济状况来界定，但是每一种界定都产生即使不矛盾也差别很大的定义。我的课题和我的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在我眼前仿佛都消失了。

我没有中止我的研究，这种令人不安的认识反而最终改变了我。从那时起，我不再殚精竭虑去拼凑上海苏北人正史了，而是去探讨苏北人这一类别被建构的过程及其发挥的功能。在我开始把籍贯（比如苏北人的籍贯）看作社会建构的类别时，也开始考量籍贯表现族群含义的方式。我越来越明白，至少在上海，原籍界定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美国历史上一向被认为是族群关系，这种分析以前从未应用于中国，也许是因为压倒多数的人口都是汉族身份吧。于是，本研究最终没有成为关于上海底层社会形成的研究，而是成了关于创立中国族群学的研究。

本书并不僭称是上海苏北人的完整历史，也不按编年次序编排。相反，每一章都探讨苏北族群被建构和受到争议的历史场合。导论之后的三章聚焦于精英集团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的建构。第二章探讨同苏北有关的种种含义，分析其作为社会类别的产生以回应苏北移民来到江南和上海的现象。上海的苏北移民群体的形成和上海当局把这个群体边缘化的企图是第三章的主题。第四章聚焦于苏北人在上海的从业经历，分析劳工市场是如何产生族群，又是如何受族群影响的。第五章将我们的视角转向苏北人本身，探讨他们如何建构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如何对精英集团炮制的苏北身份进行抗争和抵制。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独一无二的历史瞬间出现了，在那时，苏北人的地位成为公众辩论的主题，这个社会类别

史无前例地遭到冷遇和受到挑战，这是第六章的主题。尽管头几章全都聚焦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第七章则论述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苏北族群的存续和对之进行的商讨，第八章也是本书最后一章，是对籍贯的族群含义方面的反思。

社会类别的含义以往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我质疑社会类别的目的产生了一个术语学问题：如何指涉我所要描述其历史的那个人群。我在本书从头到尾使用苏北这一术语来指涉江苏北部，即从长江至淮河故道之间的核心地区，苏北人则指该地区的居民。当我使用苏北这个措辞时，系指那些当初在上海被称为“苏北佬”的人，而不论其确切的出生地在哪里。我如此用词是希望苏北一词被理解为一个复合名词——既是现实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实际的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

在上海，最通常用来指涉江苏北部的是江北而不是苏北。事实上，许多上海人一听说我在研究苏北人就好奇地看着我，当他们听到江北这个术语的时候，我的主题就很清楚了。我使用苏北这个术语是因为江北这个术语在上海已成为贬义词，即使在以前也许并非如此。

我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对本项目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们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特别感谢罗丽莎，在我十分确信我的课题已经告吹时，她帮助我理清了各种可能的思路，令人振奋。黛安娜·怀利花费很多精力在纽黑文听取了我关于籍贯族群的最初步的想法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在我动手写书时，柯临清、韩惊、贺萧、玛丽莲·杨以及罗丽莎投身到我们在周六开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中，其中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讨论我的作品。他们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评点数易其稿的本书各章，易稿次数之多可能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位留心记忆所不及的。

另有许多人也对本项目作出了贡献。裴宜理和曼素恩不仅极其慷慨地让我分享了她们拥有的有关上海工人的资料，而且还对整部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点。我也感谢戴慧思、史景迁和白凯阅读和评论了本书最后一稿。戴维·蒙哥马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例证。多年来，许多同事拨冗莅临饭局和会议，讨论有关苏北人的理

念和提供知情人线索，他们是：安敏成、白彬菊、周锡瑞、康无为、李中清、托马斯·罗斯基、萧凤霞、王绍光、范力沛、魏斐德、华志坚、魏爱莲、蔡九迪。韩森贡献了她研究宋代的经验，她帮助我正确地分析有关资料方面的问题。米凯拉·迪莱昂纳多慷慨地贡献了她在有关族群的人类学文献研究方面的专长。

然而，倘若不是上海众多人士慷慨襄助，恐怕永远不会有这份书稿，要不是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们的批评指正，恐怕连主意也不会有。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同意我采访的在上海的苏北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助了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其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赵念国，常常竭尽全力安排访谈。我感谢筱文艳、马秀英和上海淮剧团的成员帮助安排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苏北之行。我在上海期间，邓裕志、徐新吾、薛素珍、陈曾年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帮助。

好几项学术基金使我从事这项研究成为可能。这些学术基金来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王氏中国问题研究所、耶鲁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耶鲁大学格里斯沃尔德基金会。这些资助使我得以借重赵小建、申晓红、梁侃的非常宝贵的研究襄助。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查尔斯·格伦奇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有时还会悄悄提醒，这正符合我对编辑的预期。劳伦斯·肯尼对手稿做了仔细的校订。邓尔麟代表出版社对手稿所作的评论充满真知灼见，促使我对自己的分析精益求精。

有几位人士对本项目作出了不那么直接但还是很有意义的贡献。我感谢莉莎·菲奥尔—马塔和路易丝·默里提供了纽约西村的一套公寓，使我能花一周时间对本书的尾章进行反复思考；伊迪丝·赫德提供了一所可以眺望旧金山的房子，使我在那里修改定稿；也要谢谢罗莎和马娅自己玩耍、讲故事；莉西娅·菲奥尔—马塔拓展了我在思想上和地理上的想象力。最后，从我俩1977年前往埃尔帕索起，历经无数次去中国的研究之旅，贺萧始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严肃批评者，也是一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朋友。

第一章 导论

本书探讨了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最被轻视的群体历史。在中国的语境下，它讲述了原籍而非种族、宗教或国籍是如何被界定为族群身份的。这种情况犹如非洲裔美国人和奇卡纳、波兰人、意大利人的身份在美国一向被视为族群一样确定无疑。本书所写的苏北人，其家庭源自江苏省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全书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

自19世纪晚期以来，成为一名居住在上海的苏北人，就意味着他是穷人。苏北人多半是由于洪水、饥荒或家乡的战争而逃难的难民，他们在上海从事的是最不赚钱、最不理想的职业。他们占了非技术劳工队伍的大多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建筑工人、拉粪车工、垃圾运输工、理发匠、澡堂侍者。大多数苏北人居住在这座城市周边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用芦苇、纸板和能够找到的任意废料搭盖棚屋。

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贫穷，苏北人成了遭受偏见和歧视的对象。他们因为穿着红红绿绿的褂子、嘴里一股人皆趋避的大蒜味、操着一口苏北方言而受人取笑。苏北文化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19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从20世纪早期起，称呼某人为“苏北猪猡”就意味着这个人即使实际并非来自苏北，也是穷困、无知、肮脏和鄙俗的。

大多数苏北人生活的聚居区被认为是粗野的地区，父母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进去。大学毕业生最怕日后被分配到苏北居民区里的学校去教书，据说那里的学生没有什么积极性。最后，谁也不希望同苏北人结婚。当年轻人，包括苏北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出去找对象时，几乎总是指明对象不能是苏北人。

对苏北人的偏见如此冥顽不化，以致已经移居出去的上海人也把它传输出去，加以再创作，赋予新的含义。例如，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家境殷实的上海老

年妇女解释道，每当她在纽约乘地铁想要抱怨波多黎各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时，就把他们说成是苏北人。这位妇女在纽约生活了好多年，她相信她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因被人说是种族主义者而受到攻击的可能性。

对苏北人的偏见是那样溢于言表，上海人又是那样直接地承认这种偏见，在上海的西方观察者和历史学家对此多半无法察觉。他们更关注以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为基础的不平等和对抗而忽视那些由籍贯所界定的不平等和对抗。而且，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籍贯构筑了社会等级结构，形塑了大众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本书不仅旨在分析一个移民群体即苏北人的历史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的根由，这些是中国城市居民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有可能建构族群。

苏北人在上海的经历直接使人想起同在那些族群身份上很少受到怀疑的集团所作的跨文化比较。乍看起来，苏北人的贫困和对苏北人的偏见似乎很像非洲裔美国人、奇卡诺、波多黎各人和亚裔美国人等美国少数族群的经历。然而，苏北人同这些族群不同，他们在形体上同其他上海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几乎全是中国汉族人。尽管精英集团可以像对待不同种族一样对待苏北人，但事实上只有方言才能把他们区别开。

移居美国的白人移民，例如19世纪早期因马铃薯荒而逃荒的爱尔兰人可以用作较接近的类比。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城市中，如同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英国城市中一样，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单独的街区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从事本地人不愿为之的职业。虽然爱尔兰人同苏北人一样有着以移民为基础的身份，但他们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以国籍界定的族群：他们来自一个国家，其文化传统和历史无可否认地不同于他们新家园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而且，要确定谁是爱尔兰人不成问题：很简单，爱尔兰人就是来自爱尔兰的人。

苏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不是跨越国界而来的移民，苏北也不是一个有着一目了然或能直截了当定义的地方。苏北这个名称既不是指一个城市、专区，也不

是指一个省份，而是指一个地区，其区界和内核是争议未定的。因此，同美国的以种族或原国籍界定的族群集团有所不同，苏北人的经历类似于那些由地区差别界定的族群，如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区人”，他们定居在北方的城市里，又如移居加利福尼亚西南部的“俄克佬”。

至少从表面上看，或许可以把苏北人称为上海的俄克佬。同苏北人一样，俄克佬也来自这样的地区，其地区的内聚力仅仅是为了应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才形成的。这个地区并非以俄克拉荷马这个州名所表示的州界来划定，而是包括了得克萨斯、阿肯色和密苏里诸州的部分地区。20世纪30年代，在有名的干旱沙暴地区移民即他们成千上万的老乡重新定格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之前，谁也想象不到这4个州竟建构了一个地区。作为移民，他们完成了加利福尼亚本地人不愿干而以往由墨西哥移民来完成的农业生产任务。尽管俄克佬同本地人一样都是白人，但他们被当作“卑微和异化的社会集团”来对待。称某人为俄克佬，就像称某人为江北佬（老江北）一样，成为一种流行的贬义措辞，意谓落后、贫穷、低劣。最后，尽管俄克佬是一个公认的加利福尼亚族群集团，但俄克佬族群最初不是一种由移民自己建构的身份，而是他们同加利福尼亚本地人发生关系的产物。同样，苏北族群不是基于传统，而是在上海被建构的。

尽管加利福尼亚的俄克佬同上海的苏北人之间有着种种相似之处，但这种类比仍是不完善的。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格雷戈里的说法，俄克佬身份是同阶级相联系的。俄克佬这个名称本质上是下层阶级的一个隐喻。来自俄克拉荷马和西南部其他州份的移民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甚至在中央谷地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他们并未被人瞧不起或被斥为俄克佬。格雷戈里告诉我们，俄克佬这个陈年旧称“从来不是意指所有西南部人的”。

中产阶级的新成员几乎没有遭到怨恨或不尊重。即使是在反移民运动的当口上，大多数人还是得到了同经济地位与之相仿的其他白人一样的基本尊重。俄克佬这个陈年旧称首先不是一个地区偏见问题……阶层是根本的分界线。俄克佬的外

围集团包括了非西南部的人，而社会身份体面的内部集团则吸收了某些西南部人。

一个人的原籍远不如他或她的职业重要；地区差别之所以显眼，只是为了将穷苦白人同富裕白人区分开来。

然而在上海，阶层同籍贯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阶层差别为基础的。苏北人这种称呼明显是意指下层人的一个隐喻，该名词系指贫穷、受侮辱的人。在上海，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籍贯的建构是阶层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类身份同阶层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籍贯就具有了族群含义。

另一方面，苏北人这一社会类别的建构并不是严格的阶层现象；一个人的原籍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这个人的职业。一些苏北人试图隐瞒其出身，但他们的身份不可能因阶层的流动性而改变。20世纪40年代，逃离土地改革的富豪地主可能像苏北人一样被人瞧不起，逃荒的穷苦农民也是。换句话说，在上海，最要紧的事情不只是阶层。族群性与阶层分野多半交相叠合，族群性强化了阶层分野，但族群不可归结为阶层。

要弄清什么东西在上海最要紧，必须比照中国的情况加以考量，只有某些中国人被称为族群。实际上，在中国，最通常称之为族群的那些集团在理解上也许同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最不相干。中国的族群研究经常聚焦于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尽管近期许多研究表明，界定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同汉族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则是无可争辩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边陲地区，因而不是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族群概念的主要面。换句话说，如果说中国族群式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少数民族的存在，那就找不到什么族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族群。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揭示族群身份是怎样在汉族本身的人群中得以建构的。

一些形形色色的汉族人，与其说像少数民族，不如说更似苏北人，这些人群至少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里被认为是落魄失意、受人歧视的。诸如浙江的“堕民”、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广东的“疍民”一类的群体，他们都沦为完全不同于且低于其余汉族人的地位。他们不得参加科举，分开登记人口以别于“良民”，其妇女不许用缠脚来抬高地位。同上海的苏北人一样，这些集团的成员全是汉族人，但他们的落魄地位严格地按职业而定。

同苏北人更为相似的是遍布中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也都是汉族人。最明显的比照是中国东南部的客家人（北方官话，即“客民”之意）。同苏北人相仿，客家人是一群移民，有别于本地人，主要以方言相区别。他们也像苏北人那样成为偏见的对象，被描述为贫穷的、未受教育的、不文明的乡巴佬。然而，同上海的苏北人相反，客家人并没有一致的原籍：他们的祖先据说在公元4世纪迁离河南，虽然大多数人是唐代福建移民的后裔。中国东南部的某些地区几乎成为清一色的客家社会。客家人自认为不同于他们那些讲粤语的邻居；他们把自己看作宋代官宦的后裔，而相比之下，讲粤语的本地人则据称是土著蛮人的后裔。

中国其他地区的移民就不如客家人明显了。例如，明清之际来自福建和粤北的移民定居在江西的山麓地区。尽管这些移民特性殊异，但本地人认为他们全是清一色同类流民或客民，用这种贬义的称谓称呼他们。本地人对这些流民的敌对情绪基于他们相对贫困及方言和文化习俗的差异。江西当地人在清代也迁移了。大批江西人定居湖南时，他们与湖南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日甚一日。为了把自己同卑微的江西移民区别开，湖南人认为这些移民是非汉族的部落人，虽然这些所谓的蛮人逐渐主导蓬勃发展的商业，从而最终在经济上压倒了本地人。

问题不在于江西的流民或在湖南的江西蛮人是否天生是族群，这个问题不是研究他们的学者提出的。相反，这两个个案揭示了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是怎样成为全中国范围内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对抗性关系这个更大范围历史的一部分的。

中国境内的移民产生了籍贯概念。中国人历来把他们的出生地同他们的籍贯区分开，后者系指他们祖上的故土。对于正式文档来说，或就识别自己与他人而言，原籍至少同他的出生地一样重要。顾德曼在她关于上海同乡会组织和意识的研究中指出：“原籍概念是传统中国个人身份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一般说来，这是陌生人之间相互打听的第一件事，是记录一个人（在姓名和化名之后）的第一个特征，是个人涉讼前要被查明的第一个事实。”

然而，籍贯是一种有伸缩性的建构：个人可以决定哪一代人的故乡作为他或她的原籍；而且，原籍可以指特定的村、区、市或省份。正因为原籍对一个人的身份十分重要，因此，要说明一个人的原籍殊非易事。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已认识到籍贯对于中国人的自我和群体观念十分重要。何炳棣的行会研究是第一篇引起人们注意原籍在中国的重要性的作品；籍贯和同乡关系在施坚雅的社会流动战略研究中有所暗示：地方性怎样培育人的具体本领而后传输到中国各地——山西钱庄老板、宁波商人等等。同样，曼素恩分析了上海的宁波人如何得以凭借同乡关系建立起强大的社群。柯慎思也记述了离开故乡的绍兴人依靠同乡关系的历史。稍后，韩书瑞和罗友枝在她俩有关19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中指出：“同乡是离开故园到异乡客地从业的人们相依相助时作为根本手段最经常提及的。”尽管同乡关系的作用在史谦德关于北京的研究中不算突出，但他描述了以同乡为基础的工人之间的派别，指明了同乡联谊在20世纪20年代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揭示了同乡关系如何有时在城市政治中提供权力的基础。

对于城市条件下同乡关系的最广泛详尽的分析是罗威廉关于华中通商口岸汉口的极其翔实的研究。尽管他断言“该城市盛行的心态是世界主义的”，但还是强调城市发展中籍贯认同的持久性。罗氏描述了同乡关系在就业、寻求经济帮助和日常街头吵架时帮腔护驾方面的重要性。经商结帮、员工招聘和闲暇活动经常围绕同乡关系来组织。居住也反映了地方主义的持久性：汉口有些街区以特定同

乡人为主，因而很像族群飞地。尽管出现了新的城市制度，同乡会在汉口居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仍起一定的核心作用。籍贯的突出作用使罗氏得出结论：“地理决定的亚族群划分……建构了晚清时期区分中国个人的最重要特征。”

尽管认识到籍贯在界定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性，但罗氏的研究和其他学者都按其字面意义看问题。他们并没有探讨籍贯怎样同阶级和文化盘根错节，怎样体现比地名本身更为全面、更加变幻不定的含义。指认一个人是宁波人或山西人，其含义是不成问题的，或者可以理解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分析籍贯在中国的含义的更有生气的方法是近期有关非中国背景中族群的人类学研究。尽管对从何时起籍贯成为“族群”身份的问题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这些研究提出了思考社会集团的方法，这些方法若应用于中国，那就意味着对籍贯的分析要比以往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复杂得多。柳迫淳子关于西雅图日裔美国人的研究、卡伦·布卢的北卡罗来纳伦比族印第安人研究，以及詹姆斯·克利福德的科德角土著美国人研究，全都推动我们不要盯着字面意义上的身份而要去探索象征性的、社会建构的身份。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张不要把族群理解为单个身份，而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这就是说，身份只是在特定地方背景和历史背景下同其他身份的关系与区别中形成的。

然而，族群不仅仅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新的研究成果还突出地表明族群是一个历史过程。新的研究成果不把任何特定地方的居民所标明的社会类别——非洲裔美国人、爱尔兰人、俄克佬、苏北人看作是一种确定的类别，相反，它鞭策我们去探讨这些类别被建构的过程和它们含义变化的过程。这些学者并没有把“共同传统”或“人丁共同身份感”这些通常在族群定义中援引的术语当作移民带到新家园来的一成不变的信念，相反，他们争辩说，我们应当把这些术语看作是由于移民而建构的理念乃至神话。正如威廉·扬西、尤金·埃里克森和理查德·朱利安尼在他们有影响力的文章《新兴族群：重新探讨与重新阐释》里所断

言，“将共同传统作为族群本质的假设是错误的。族群也许相对来说同欧洲、亚洲或非洲没有多大关系，但同这个国家迫切的生存需要和机遇结构很有关系”。

因此，问题不在于要确定中国的籍贯何时通过族群的定性试验。相反，如果我们认为籍贯可能是族群，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凸显以往未能识别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的方法去审视它。我们也可以把籍贯看作是不断地处在被建构和被赋予新含义的过程之中，从而以全新的方法去理解中国城市史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籍贯与阶层概念的关系、籍贯同城市文化的竞争领域的关系便豁然开朗了。

读者也许很想弄明白，族群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少有什么题目像这个问题那样让人类学家争得不可开交，若不熟悉这场辩论就下定义，那是莽撞的。此外，尽管本书利用了有关族群的辩论，但也想探讨一种族群的形态——由原籍同乡界定的族群，这种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未引起重视，本书希望以此来促进这些辩论。因此，本书的宗旨之一——通过探讨一种缺少我们最熟悉的族群标志如种族和国籍的线索的情境——是要激励读者以新的思路去思考族群问题。

有关族群含义的某些见解也许还是有启发的。第一，族群不是诸如血缘之类的客观事物，而是一种过程。更具体地说，它涉及建构、援引和操纵文化独特性概念，以便在共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将人划分为我者与他者。语言、种族、宗教、历史经验和原籍构成了属性金字塔，也许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来建构这种“我者/他者”的界限。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构成不同的或者独特的语言、种族、历史或原籍的要素全是有伸缩性的。没有哪一个特征天生就是族群的标志。人类学家李·德拉蒙德指出：“某个特定属性，例如体貌、衣着、讲话、生活方式或宗教，只有凭借体现它的内涵体系才具有族群意义或标志意义。”这导致有关族群含义的第二种见解：没有哪一个人群是天生的或是不可被改变的族群。例如，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就不是族群，只有在他们移居美国后才成为族群。非洲裔美国人

和整个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被视为族群的人也是如此。同样地，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为苏北人。换句话说，族群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

关于族群含义的第三种见解涉及谁来界定社会类别。人类学家露丝·曼德尔指出，族群身份大概是谋求以“集体团结集团”自诩的人说出来的。表明这种团结是为了抵御侮辱或歧视，要求政治经济权利，以集团的传统而自豪。然而，曼德尔确切无疑地说，“被划分”感也许正是“外在决定的，例如，旨在从属和统治”。正是后一种现象主导着上海苏北族群的建构。

关于族群含义的第四种见解涉及族群同阶层的关系。尽管一个社会可以由阶层而不是由族群来建构，反之亦然，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二者似乎是交叉的，或者甚至是代表同一人群的不同名称。尽管阶层和族群都根植于不平等结构，但阶层是根据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界定的，而族群是以基于原籍的差别来界定的。二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归结为另一个，但二者往往重叠，就像有关族群差异的信念，即使没有被建构，也经常被用来解释或文饰职业上的等级结构。

我在本书里既小心翼翼又深思熟虑地使用族群这个术语。我小心地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族群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这个词在中国经常被译成民族。民族一词的字面意义系指“族籍”，或“少数民族”（仅指非汉族人）。我所撰写的这个主体在中文里没有称谓。而且，就连西方人类学家们也很少把它引申到包括地域身份，即大不同于民族、种族、宗教或部落身份的身份。但我使用族群这个术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没有别的术语可以哪怕是大致充分地描述苏北人这个类别在上海历史上的功能。简单地指涉籍贯就模糊了社会建构过程及其所涉及的统治与从属关系。

许多学者用亚族群和准族群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中国的以原籍为基础的社会集团。然而，说上海的籍贯为亚族群是成问题的，因为那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更显赫、大概也更正式的族群类型，而籍贯则是从属的。正如柯娇燕所说。

也许在描述汉族内部的族群时已经约定俗成的“亚族群”术语中，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种汉学遗产。这就是，汉族只有一种可采用的“语言”——中国的语言在汉学术语中成了“方言”——所以他们只能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内部的变种就不是“族群”，而是“亚族群”。当然，“族群”的更广泛含义易于涵盖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多样性，一个层次上的人全都认为自己是汉族人，而在另一个层次上的人则显示了可认知的族群意识。

把族群这个术语归之于由原籍所界定的集团的做法其实在中国学研究中是有先例可循的。施坚雅在他的清代中国城市制度的分析中第一个提出了这种做法的适用性。

在晚清城市里盛行的原籍同乡经济专业化模式可以按族群分工来分析，这样做大有裨益。把中国城市里的外地商人的“殖民地”看作少数族群没有任何困难。……重庆的安徽商人、北京的宁波商人、汉口的孝感商人、广州的宁波商人、福州的山西商人——全都讲当地人难以听懂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显得稀奇古怪。但是，如果说近期的族群研究对我们有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族群的固定性绝不是单单基于文化差别；口音的些微差别乃至习气的小有不同，只要认为有利于保持或树立族群界线，二者便都可以成为族群的标志。

这种分析已被应用于若干个案研究中，不过多少是有限地应用。例如，王大为和郝瑞二人都说晚清从中国东南部各地移居台湾的移民之间的分野就是族群分野。葛希芝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大陆人与台湾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族群关系的过程。最后，柏桦分析了香港新界的一个集镇的社会结构，他坚持用族群这个术语来描述在很大程度上由原籍来界定的群体身份。我的苏北人研究借重了这些著作，在地理上扩大了以往局限于台湾研究和香港研究的那种思想框架。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上海，因为本书不是泛泛地谈论籍贯，而是探讨一个特定类别。本书也不是泛泛地谈论苏北人，而是探讨他们在上海的特殊经历。（其

实，苏北人这个类别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上海人所称的苏北人，若生活在北京、汉口一类的城市里，则并不被认为是苏北人。）本书探索原籍的含义，但也探讨上海历史的进程。

当诸如苏北人那样的特定原籍同乡类别成为研究的焦点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海，社会和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籍来界定的。这并不完全令人惊讶，因为1949年以前的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1907年，上海地方志的作者们指出：“上海是一块混合杂居地，来自中国各地的人杂居于此。外地人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统计数字证实了这种印象：1885年，移民约占该市人口的85%；1930年占78%（这是空前下降的最低数字）；1949年占84.9%。

原籍构成了上海主要的社会和经济图景。各色外侨的飞地——显然就是法、英、俄、日侨的居住区——成横列与来自中国特定地区的移民街区毗邻。例如，宁波人集中在法租界和黄浦江畔的南市北区；广东人主要定居在虹口区或广东路沿线，靠近大型造船厂，许多人受雇于此；苏北人大多数见诸外国租界边沿的棚户区。

从19世纪中叶起，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和工业都市开始发展起来。上海的劳工、商人和中小企业主大多数来自三个地区：广东、江南（浙江的宁波—绍兴地区和江苏的无锡—常州地区）和江苏北部（谓之苏北）。一个人来自上述哪个地区对其就业机会、居住格局、文化活动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至为紧要。等级结构多半是按原籍建构的：精英集团主要由来自广东和江南的人组成，非技术性的服务行业则主要由来自苏北的移民充任。即使并非所有的宁波移民都富，亦非所有的苏北移民都穷，但毋庸置疑，宁波人身份意味着富有和温文尔雅，而苏北人身份则与贫穷无知相联系。

社会冲突也往往以不同籍贯人群之间的对抗为基础。以往的研究业已指出了19世纪中期广东人和宁波人之间明火执仗的争衡。但苏北人和江南人之间的冲突是19世纪晚期以来上海最突出的两个不同籍贯族群的分隔，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

一直受到漠视。而且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史，有时乃至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冲突在当时背景下的产物。要理解上海这个移民城市里社会组织及阶层与籍贯之间的关系，就要分析这两个最大移民集团之间的矛盾。

上海社会类别的建构和命名也反映了籍贯的中心地位。鉴于上海的移民人口众多，因此毫不奇怪，原籍界定了某些主要的社会集团（上海帮、宁波帮和苏北帮），这同美国经常以原国籍来界定个人和族群集团极为相似。但是，如上所述，怎样界定一个人的原籍并不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来自中国的美国人可谓华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来自墨西哥的美国人可谓墨西哥裔美国人、奇卡诺或拉美裔美国人。对这些称谓选择上的冲突，即少数族群集团如何界定自己与精英集团如何界定他们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证明了以下事实：要害不仅仅是称谓本身。来自江苏北部的人通常不接受江南精英集团强加的苏北称谓就暗示了充斥于上海历史上的类似冲突。

最后，聚焦于苏北人迫使我们以新的思路去理解上海人和上海文化。以上海人和上海文化自居是要经受严峻挑战的。江南移民为声称上海人就是他们自己而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存在着一个受人鄙视的苏北人集团——在上海发展成为现代工业中心的整个过程中，这一信念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只有对照它界定自我时作为反衬的另类才能理解上海人身份，苏北人就代表那个另类。

尽管苏北人的经历清楚地显示了以往在上海历史上看不见的方方面面，但上海发展的某些侧面仍是分析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形成的主要途径。移民组成的人口百分比早已一目了然。同样重要的是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尚未立显昭昭。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签订《南京条约》起，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蜂拥来到上海。到20世纪早期，原先的中国老城在地理上处于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边缘。

因此，据称苏北人的贫困落后不只是以中国精英集团的标准来衡量，而且还用外国的标准来衡量。沿黄浦江码头的英式建筑大楼和“法国城”的别墅凸显了苏北人居住的棚户区的破烂不堪。欧洲服饰彰显了苏北人褴褛的衣着。首批从国外进口的有轨电车和汽车使许多苏北人拉的黄包车更显落后。

外国对上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苏北人这一类别的建构。第一，外国工业在上海的发展对江苏农村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加剧了该省以长江为界的分隔，从而使江苏南北逐渐分别代表富裕与贫穷。倘若上海不是通商口岸，那就很可能没有一个叫作苏北的地方。第二，外国投资构筑了上海的劳动力市场，致使某些职业由于属于现代产业而被界定为地位高的职业，所谓现代则多半是外国人界定的。地位低的职业是同苏北人相联系的职业，这一点必须联系外国控制经济的背景才能理解。最后，在建构苏北人这个类别上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江南精英集团自身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它以上海人自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同外国人的联系——即使只是一种模仿的企望——来界定的。与之相反，苏北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西洋方式。

殖民主义为苏北人类别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外国人有时成为建构这个类别的积极媒介。整个20世纪前半期，外国控制下的租界当局不断努力消灭苏北人居住的棚户区，减少苏北人拉的黄包车的庞大数量。正是外国人强加了关于现代城市应为何物和苏北人被认为是这一理想中的一个瑕疵的信念。

因此，苏北人的历史不仅是上海贫困阶层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的过程、结果和体现自身含义的历史。它验证了我们如何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以崭新思路理解一个特定移民群体的经历，此外又认识到以往视而不见的上海不平等和偏见的种种形态。

有关苏北人的书面材料少而又少。苏北人同知识分子、农民、妇女乃至工厂工人不同，人们很少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因此从来不是观察、调查和报告的对象。此外，尽管他们的有些职业，如拉黄包车，经常有人调查，但其

他许多职业，如在理发店和澡堂的差使、拉粪车工、卖菜人，却很少有人去写。就连人口普查都不把上海的苏北人计算在内，致使人们无法知道在任何给定的时期里他们构成人口的确切百分比。

在1949年以前有关上海社会状况的数千种书籍和期刊文章中，只有两三百种聚焦于苏北人的经历。同大多数非精英集团一样，苏北人写他们自己的东西少而又少。最后，就连那些提供零星提到苏北人资料（正是这类零碎的数百份资料形成了本书的核心）的人也是成问题的，因为他们绝不认为鉴定一个人的苏北身份有什么可争议的。

尽管有这些局限，上海苏北人的史略还是可以辑成的，虽然也许不完整。必须在字里行间寻觅苏北人：在有关棚户居民、帮会组织和工人的研究作品中，在旅行指南、语言学调查和有关地方剧种的宣传材料中去寻觅。也许在地方报纸上最容易找到他们，1949年以前，这些地方报纸一律具体指明所报道人物的原籍。可以接触到的工厂档案和代表江苏北部各地区的同乡会档案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然而，若无口述史访谈，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我在1986年和1988年间对大量的上海苏北人进行正式采访，主要是为了印证他们的从业经历。然而，漫不经心的评述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同他们提供的信息资料一样富有启迪性，一样重要。例如，上海淮剧团的成员们一听说在他们到苏北各地作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演出时有一位外国学者要随团前往便大喜过望。我的随团前往使他们原来的沉闷出行变得津津有味起来——原本之所以沉闷是因为苏北的住宿条件和食品供应远远比不上他们在上海习以为常的水平。虽然巡回演出是必要的，因为上海的观众面不足以供养他们。他们以前从未想象过一个外国人会对他们感兴趣，也乐于有机会打听地位同他们在上海差不多的美国演出团体。同样地，一群来自苏北的环卫部门工人也很高兴一位外国学者对他们感兴趣，他们欢迎我到他们在工作单位去，除了在让他们感到自信、受到尊重的单位里沏上一杯比较普通的粗茶水

以外，还端出大盆大盆的水果、瓜子和糖果。一位来自扬州的澡堂修脚工前来接受采访时穿着西装，同来的一位来自盐城的工人同伴却穿着较为普通的工装；他以此衬托出他的态度：虽然他们都来自苏北，扬州人却文雅老到得多。许多次原先作为正式采访的会议变成了被采访者之间就对待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性质和原委展开的激烈争论。这些自发辩论反映出来的怒气和义愤，较之他们对我关于他们来自苏北意味着什么的正式提问的回答更能说明他们的态度。

在探讨对苏北人的今昔态度方面，随意的交谈同正式访谈一样重要。由于同1949年以后的工人阶级或少数民族的地位不同，苏北人的地位从来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没有任何敏感、难堪或羞耻心去检点人们的贬抑性评论。例如，只要一提到我的研究话题，就势必引起有关苏北人性格缺点的热烈谈论。即使与苏北人无关的话题交谈也有可能引出表明流行态度的评述。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她大学里的一位教师的故事。这位教师据说陷入了婚外情，她说，“当然啰，他是苏北来的”，她不知道我对苏北人怀有特别的兴趣。

通过随意交谈、采访和文件资料收集苏北人作为一个移民群体的已知历史，我的目的是要分析上海最有害的偏见和歧视的根源。更为广义地说，我探讨原籍与社会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与含义的影响。最后，我之所以强调基于苏北一类籍贯的社会类别的建构和含义，是希望提出创建中国历史上族群学的新思路。每个族群都有一部历史，只有从它的原籍诸方面去寻迹那段历史才能加以理解。归根结底，这就是本书想要贡献给读者的。

第二章 寻觅苏北

江北人居住在茅草棚里，盖茅草棚很便宜，在他们居住区里，火灾是常事。……大多数人是黄包车夫、泥瓦工、码头工人或搬运工。大多数妇女当女佣、仆役或缫丝厂女工。可以说，他们从事最底层的职业。

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上海的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苏北人一向被认为是上海的一个主要社会类别。上海的大多数非苏北人相信，尽管长江以北各地区之间存在经济、语言和文化差别，但江苏北部的人具有共同的身份和经历，因此是一个同族集团，按分类学术语谓之苏北人（或江北人）。

从中国报纸开始出版发行以来，苏北人就是用于个人的最常见的身份之一。来自长江以北的人被认定和通称为江北人，有时也被称为“操一口江北腔”的人。同样地，有关“江北棚户”和在洪水泛滥时的“江北难民”的报道，通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有些报道提到“江北帮”，暗示苏北移民不仅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同族集团，而且也是一个统一的集团。报纸很少把某人说成是苏北某具体地区的人，如盐城人或淮安人。

相反，来自无锡的人一律被指认为“无锡人”，来自宁波的人则称为“宁波人”。他们绝不会被列入标题为“江南人”的集团，江南人这个类别只有在全国层面上才存在。

在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虽然很少聚焦于苏北人，但经常指认他们为一个类别。在《新青年》杂志（1920年）的一期劳工特刊及《上海的企业与工人》（1939年）这一更为全面的研究著作中公布的上海劳工概况中，苏北是划归工人的主要籍贯之一。偶尔也会出现具体涉及苏北人的文章，对他们在上海的苦难表示遗憾。就1949年之前在上海的经历接受采访的工人们深情而又确凿地详细述说

了苏北人的特征、职业和居住条件。简言之，苏北人是上海社会风景线上一一种确定无疑的存在和社会类别。

谁是似乎人人都能指认的苏北人？最浅显的回答是：来自苏北的人。苏北是一个地方，人们对它的定义的理解隐含在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苏北洪灾、饥荒和战乱的文章登上了新闻头条；江苏的农村调查一成不变地把江苏分成江南和苏北，并对苏北地区进行了长篇描述。很显然，一个叫作苏北的地方是存在的。历史文献丝毫没有暗示它的定义还需要被明确解释，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即使是在今日上海，若问任何人有关苏北这一名称的含义，他或她就会马上自信地回答说，人们绝不会怀疑这是一个有什么可争议的问题。大多数人最开始的回答是：“苏北就是江苏北部，就是长江以北的江苏全区。”

然而，一问及更加具体的问题，苏北的定义便愈发难以捉摸了。“淮河以北地区是苏北的一部分吗？”有人说是，另一些人说不是。“长江北岸地区如海门、南通怎么样——它们是不是苏北的一部分？”作出的回答又是五花八门。对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答案也是如此，比如镇江。有些上海居民开始深思苏北定义时仍坚持说，就连南京也包括在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山东和安徽的一些地区也属于苏北。换句话说，你愈追问，围绕苏北定义的确定性就愈在云里雾里。围绕苏北定义的混乱不足为奇，因为苏北不是一种有着明确划界的行政建构。它既不是省份也不是县，它是一个不存在始终如一定义的地区，很像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人类学家费孝通的见解称“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苏北’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此说把问题轻描淡写了。问题是，苏北不是一个客观的地方，而是代表一种对一个特定地区的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同质性的信念。而且，苏北同质性的信念本身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建构的。只有联系1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关于一个呼作苏北的地方这种理念才会出现。

苏北：其地

苏北，就其通常的字面意义上说，是一个地理区域，指江苏长江以北地区。一如苏北其名所示，它是（江）苏北（部）。这是一块广袤斑驳之地，包括从长江北岸的海门、南通至最北部的海州和江苏西北边缘的徐州之间的每一抔土。最北地区（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最为崎岖不平，干旱少水，庄稼生长季短，该地区出产冬小麦、小米、玉米、花生、甘薯。法国的地理学家理查兹将徐州周边描述为“与中国北方并无二致”的地区。“那里物产匮乏，只有稀疏的竹子，柳树和杨树为贫瘠的土地提供了一些树木，桑属植物稀少，不产大米亦不种茶。有少量果树，果子呱呱叫，尤其是桃子。”一份传教士报告描绘了一幅该地区的萧瑟凄凉景象：

从山东至黄河故道流域的该（江苏）省北部地区在经济上是最不被看好的。该地区特有的那么多盐碱地的出产看来大大不如苏南沃土，夏季遭受洪灾的地区只出产单一作物冬小麦。高地冬季产麦，夏季产高粱、大豆、花生或其他作物。调研显示以下事实，一个北方家庭要想确保南方农家种植20亩（3英亩）所得的同样收获，就得种植40至100亩。

这整个地区的人明显比往南地区简朴、贫寒，也更加粗壮。他们为生计而挣扎，艰辛不已，饥荒频仍，口粮所剩无几。家徒四壁，几无家具摆设，不修装潢，鲜见被褥。衣着几乎全是棉的，并无丝绸毛料。

靠近山东的地区素以贩私盐、盗匪活动和鸦片种植之中心而闻名，该地区作为犯罪沃壤的名声，由《北华捷报》驻苏北的记者在1897年所写的一篇报道加以典型化。他告诫道：“拦路强盗出没特多特危险的季节快到了。高粱长势正旺，杆高七八英尺，十分浓密，提供了方便的设伏地点。即使是大白天在人迹稀少的路上孤身出行也是不安全的。”

往东南方向走，就到了以淮河故道为界的地区，人们发现这是一个大不相同的地区，虽然该地区并非到处都一个样。正如该地区主要城市盐城其名所示，其部分地区是围海造田开垦出来的，几乎只适于产盐和养猪。再往内陆去，土壤盐分不那么多了，因此能种植棉花。再往西去，南向伸展至扬州、泰州，这一片土地上江河湖泊、沼泽、运河纵横，土壤湿润，可种稻米。再往南的地区，包括南通、启东、海门和如皋，是长江北岸的一个肥沃的半岛，那是全国有名的南通（通州）棉的主要产地。

尽管字面意义和民间感受都认为苏北包括江苏的长江以北所有地区，但几乎所有历史地理学家和农村经济学者都认为上述所指整个地区无疑只包括苏北北部地区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对究竟指哪一部分莫衷一是。我要指涉的是长江以北的江苏三个大区：北区（淮河以北）、中区（从淮河南下至扬州）、南区（长江北岸地区）。

民国时期，大多数观察者认为北区和中区之间——即江苏淮河故道南北两地区之间——有着基本区别。例如，王培棠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述中认为，长江以北的这两个地区截然不同：一个叫苏北，另一个是淮北，前者在经济和文化上接近江南，后者接近安徽和山东。王培棠指出，淮河是稻米产区和小麦产区之间的界河；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人，同江南居民一样，主要吃稻米为生。住房风格也以淮河为界，南北迥异。淮河以北的人用泥土、茅草盖房，而淮河以南的大多数人像江南居民一样拥有瓦房。坚持苏北淮北有别的主张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的组织战略中：江苏长江以北地区被分成两个行署专区，即苏中、苏北；淮河故道为其分界线。既然如此，江苏最北部的徐州地区和海州地区属于淮北；苏北则包括南起南通、海门，中经扬州、泰州和高邮，北至盐城、阜宁和淮安的所有地区。

西方学者的许多研究虽未解释苏北的定义，但不约而同地确认了江苏北部与淮河南北两地区的区别。例如，安东篱在她关于扬州腹地的研究中指出：“从气

候上讲，在清代大部分时期已被黄河改道占用的淮河故道是比长江更为重要的分界线，淮河故道以北的地区由于降雨量不同而与淮河故道以南地区有别。这表明淮河故道是长江稻米—小麦产区与冬小麦—高粱产区之间的分界线。”她还指出，她谓之（以淮河为界划分的）苏中、苏北之间的旅游、运输和通讯极为困难，而苏中区内和苏中与苏南之间的众多水道则方便出游。因此，根据她的分析，必须把苏中、苏北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而不是一个特征相同的苏北。同样，裴宜理在她关于华北农民起义的研究中聚焦于淮北，根据她的定义，淮北就是淮河与黄河之间的地区，“中国的所谓洪灾与饥荒的腹地，该地区以地瘠民贫而出名”。在这里，江苏淮河以北地区被描述成与山东西南部和安徽东北部一样同属一个地区，言下之意，有别于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最后，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描述了包括山东西南部和江苏最北部的一个地区，暗示江苏淮河以北地区属于一个不同于往南地区的区域。

然而，并非所有1949年以前的农村经济观察者都同意这样来理解苏北。例如，陈果夫在他回忆20世纪30年代督治江苏省的回忆录里讨论江北时描述了徐州的情况。另一位作者不仅包括了徐州、海州，还排除了南部的南通、海门地区。按照他的定义，苏北包括江苏扬州以北的每个地区，而扬州以南但还是长江以北的地区属于江南。一些不把扬州包括在内的、认为扬州属于江南的作者暗示了有关苏北的最后的地理定义。例如，易君左在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的引起争议的《闲话扬州》中强调了扬州和苏北之间的区别。他宣称，扬州的气候格局同江南一样，并接着说，“江北人的性格多强悍而扬州人则很和平。扬州人虽在江北早已江南化了！他自隋以来代表整个儿的江南民族性，说扬州是江北，真黑天冤枉！”一篇研究江苏的文章的作者王树槐持相同观点，认为扬州几乎同江南的地方一模一样。他指出：“在扬州，人们的习惯完全不同于淮北。这里有茶、盐、棉、丝；人们喜欢经商。”因此，根据这些研究，从扬州以北起始才是苏北。

有关苏北的这些说法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准确与否，而在于其对什么构成苏北的问题缺乏共识。如果不存在苏北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标准定义，如果某些作者

认作苏北的地方，其他作者却认为是淮北，那就难以指认谁是苏北人了。

然而，地理不是用来界定苏北的唯一标准。语言同样重要，也同样难以捉摸。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没有任何形体或种族区别，因此，方言成为上海苏北人的唯一标志。一般说来，江苏南北两地区的人所讲的方言属于完全不同的语族，相互难懂：南方以吴语为主，而北方讲的是扬州方言的变种。尽管长江确实是两个语族之间的大致分界线，但地理相异和语言变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吴语并不限于长江以南各地方言，如同苏北方言不限于长江以北一样。例如，溧水和镇江都在长江以南，以北方方言为主。1960年进行的一次江苏方言重要调查把江南的南京、江宁、句容各地区和溧水、镇江一道列入与苏北的扬州、盐城、阜宁、高邮地区一样的方言区。同样，在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和如东，均以吴语为主，而所有这些地区都在长江以北。

有时，架构还要复杂得多，因为一个给定地区可能本身被分成吴语区和北方方言区。长江北岸的靖江便是这样，据一份研究说，那里的吴语方言同长江以南的常州方言一致，有五个县主要讲这种方言，而其他县份则讲江淮方言。之所以有这种区分是由于靖江特有的历史发展：靖江原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其居民是讲吴语的江南人。明朝时期，在该岛与长江北岸之间形成了一个沙洲，随着该岛逐渐与北岸连成一片，讲江淮方言的长江以北的人逐渐定居在这块可利用的新土地上。

而且，根据语言学标准，苏北人这个类别不会包括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靖江、南通、海门、启东各地是江南。由于同样的理由，镇江人、溧水人，甚至还有南京人应为苏北人。有些人从地理上讲是苏北人，从语言上讲是江南人，而有些人从地理上讲是江南人，按讲话看则为苏北人。这种复杂性导致一位研究江苏的作者断言，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认为“江北就是长江以北，江南就是长江以南”。

除了围绕居住在长江两岸的人的身份问题出现的混乱以外，语言标准进一步证实了上文所述的苏北/淮北分野的复杂化。尽管一般人们相信长江以北到处都讲清一色的以扬州话为基础的“苏北方言”，但其实是淮河大致区分了这两个被进一步细分的方言集团。淮河以北占主导的是一种类似于山东方言的北方官话而不是扬州方言。换句话说，语言并不提供任何明显的、直截了当的苏北定义。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来自山东的人被指认为苏北人。

除了地理和语言以外，文化是经常被用来界定苏北的第三个标准。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突出了江南/苏北分野的模糊性及江苏北部的多样性。第一，正如语言格局所示，长江并不总是提供所谓江南和苏北文化之间明确的分界线。例如，尽管靖江位于长江以北，但那里盛行许多江南习俗。一篇研究江苏的文章作者指出：“因为接近江南的关系，所以妇女也流行着剪发、穿长旗袍。”同样地，靖江讲吴语的人自视优越于他们的苏北人邻居，按江南习俗过春节。例如，在清明节和冬至之前祭祖10天，这与讲江淮方言的人不同，他们的习俗是只在节日那天祭祖。另外，讲吴语的人据说为证实他们的南方身份，一直过长江到南岸买货。

文化生活所显示的江苏北部的第二个不一致之处是淮河南北两地区之间的分野。淮河据说是这样两种地区的分界线：一种地区的妇女普遍缠小脚，另一些地区妇女不缠脚：淮河以北妇女多半在家里干活，而淮河以南妇女在田里干活。衣着风格亦以淮河而异。淮北衣服多半是棉制品，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人们兼穿丝绸和棉布，因此，据王培棠说，“他们接近于江南的习惯”，江南丝绸更平常。即使是个性类型据说也遇淮而异。据王树槐证，“江南之人很文雅，而在淮北（淮河以北），人们很粗犷。但是，江北（淮河与长江之间）人介乎文雅与粗犷之间”。

也许，对长江以北地区特征同一说大不以为然的文化格局的最生动例子是地方戏剧，地方戏是全中国农村人民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一。乍看起来，戏剧风格显示了苏中和苏北之间的差异：自19世纪以来，淮剧在苏北居上，而扬剧在

苏中盛行。然经仔细考察，两个剧种实际反映了对于苏中，即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苏地区的划分。

淮剧并非源于江苏的淮河以北地区，而恰恰源于淮河以南地区：以淮安、淮阴、盐城、阜宁为中心。它从香火戏演化而来，香火戏在诸如春节一类的节日里或某人生日时演出，以及是为了祈求病愈康复或消弭火险而上演。在此类场合，人们招来几个童子唱民歌而他们则焚香。

直到19世纪早期，这些香火戏才成为成熟的戏剧演出，也是在这个时期徽剧从安徽传到苏北。香火戏吸纳了徽剧风格，逐渐在那里涌现出一批职业戏剧演出团体，演员在乐器伴奏下演出，后来即谓之淮剧。即使到了20世纪早期，淮剧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时，也往往或先或后与徽剧连台献艺，这显示了两个剧种的相似性和共同拥有文化天地，他们的观众即安徽东北部和苏北的当地人认为他们同属这个文化天地。

扬剧起源于有点类似但完全不相干的传统。同淮剧一样，扬剧部分源于当地香火戏习俗。但是，扬州的香火戏传统不同于上述地区的传统。因为在以盐城、淮阴为中心的地区，演出香火戏是为了庆祝华诞、祭祖、祈求健康、求雨或求子。但在扬州，从唐代以来人们就搭台演出香火戏，经常利用拜佛之日在庙里演出。他们用扬州方言演唱，打鼓击钹伴奏。当地的香火戏是扬剧起源的唯一传统。同样重要的是自清初就在该地区流行的花鼓戏。两个剧种最终在20世纪早期合并，起先叫淮扬剧，后来称为扬剧。

扬剧和淮剧不是单一苏北剧目的单纯变种，这一点为两剧在上海的发展所证实。两个剧种在不同的戏院里演出，吸引不同的观众（参见第五章）。文化标准同地理和语言标准一样，使苏北即“长江以北”的简单定义变得让人疑惑起来。

苏北：其理念

如果按照所有这些标准，有关苏北的定义是成问题的，那么，谈论苏北或苏北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更具体地说，那些使用这个术语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要只注意他们认为苏北是什么，也许稍稍转移一下我们的聚焦点，去探讨一下苏北“不是什么”更有意义。因为充斥于多半是江南人所写的有关苏北的著述中的说法是，苏北不是江苏南部或江南，江南也包括浙江北部。如果说江苏的长江以北地区有什么区域共性的话，那就是它同苏南的鲜明反差。

在所有的文献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有关南北对比的写照：南富北贫；南方景色秀丽、生机盎然，北方灰蒙蒙一片，毫无生气；南方讲吴语娓娓动听，北方的扬州方言刺耳难听；南方是工业经济，北方是农业经济；南方土壤肥沃，北方是干旱的盐碱地。正如范树平在20世纪30年代描写穿越江苏之行的文章中概述的，“在‘江南’有肥沃的土地、秀丽的河山、便利的交通、高级的文化；而在‘江北’，则地瘠民贫、满眼荒芜、交通阻塞、文化落后。因此，‘江北佬’一向是被‘江南人’所看不起的”。1933年，冯和法在他的农村经济研究中断言，“尽管江南江北仅一江之隔，历史却把它们分开达千年之久”。有些苏北人对这种把苏北说成“穷窝”的说法提出疑问。例如，尉迟酣在江苏对大多来自苏北的和尚进行采访时发现，许多人否认（苏北）穷苦不堪。他们说，苏北有许多好地，其中没有一块是盐碱地，因为那里离海岸很远。

因此，可以部分地不把苏北理解为一个客观的地方，而是作为一个有别于江南的另类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江南的遗忘之地。在上海的环境中，江南和苏北都被简单化了，都被当作象征来用。江南是富足和高雅的体现，不论其内部有多大差别，而苏北则成为贫困和穷乡僻壤的体现，不论其是否丰富多彩。苏北的象征意味要重于它的实际状况，一旦联系历史看问题，苏北的这种几乎是隐喻式的意味就比较好理解了。更具体地说，把苏北理解为一种理念——诚然，这一

理念影响物质现实——需要探讨这个理念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产生这种理念的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

以前，一个叫作苏北或江北的地方并不总是存在的。只是到了清代中期才开始多少正规地有此提法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清代中期以前，长江以北地区是繁荣的，并无苏北这个通称。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苏北被描述成一个穷苦不堪、灾祸累累的地区，这就模糊了以下事实：它在经济上并不总是江苏省的劣等地区。实际上，它的繁荣堪与江南相媲美。人类学家费孝通指出：“大运河、黄河与由两河分流而成的分支水道一起，一度形成一个运河网，很像今日长江以南所见到的河渠纵横一样。”北部的淮阴市是清代漕运总督府的中心。大运河上的航运枢纽扬州一度被视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据薛爱华说，它是“18世纪中国的明珠，一个熙熙攘攘的资产阶级城市，金钱流通顺畅，……这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城市，衣着华丽的人出入的城市，一个随时随地可以纵情游乐的城市，这是一个由公园、花园装点的城市，一个真正的威尼斯，河渠纵横，船的数目超过马车。这里有月夜灯市，是歌舞之城、妓女之城”。在整个唐代，扬州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对外贸易口岸。在元代，它是马可·波罗惊叹的对象；它后来成为清初繁荣的最高象征，是江苏盐商的乐园，他们是当时全中国最富有的一些人。尽管最终导致扬州衰落的经济力量已经在清初起作用，但扬州依然是一个以其财富与声望吸引商人、艺术家、学者、旅游者的城市，就连乾隆皇帝本人也六次亲临。人们说它是“南方文化的缩影”“国内贸易的神经中枢”，那里的茶馆、酒楼、文学沙龙应有尽有，还有中国最有名的艺术天才。扬州的声誉和繁荣在以下事实中反映出来：清初上海的城隍原型来自苏北毗邻扬州的地区高邮。

只是在19世纪，即与上海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大致同时，江苏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声誉才式微。它的贫困化可以归因于19世纪中叶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第一，大运河被海运所取代，特别是取代了由中国南方运往北方的漕运。沿海航船首次在19世纪20年代启用，当时黄河泥沙淤积严重，阻碍了运河船舶通行，海船便成为19世纪40年代漕运的主要手段。这就意味着苏北的一些城镇失去了其作为交通

和商业中心的重要性。昔日是豪华繁荣象征的扬州到19世纪中叶成了明日黄花。1839年，士大夫阮元返归故里扬州，形容扬州“几乎已认不出他童年时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了，花园和图书馆已无人问津，或者弃之不用，已成废墟”。海运取代了大运河还意味着政府已不注意维护和修缮连接大运河的水渠堤坝，从而使苏北各地易受空前频繁的洪水和天灾之害。

促使苏北地区衰落的第二件事是1853年黄河改道：不再流入洪泽湖而后横穿苏北入海，而是从开封流向东北方向，再穿越山东。后来淮河流入洪泽湖，但再无流出通道，从而成为反复无常的洪水泛滥的渊藪。于是，从19世纪中期起，轮番为患的洪水、饥荒、贫困成为苏北大部分地区的特征。明代包括徐州、海州在内的江苏北部遭受洪灾的略少于江南（苏北88次，江南92次），而清代苏北灾难深重甚于江南（苏北82次洪灾，江南61次）。

同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苏北的贫困和衰落格外引人注目。江南经济的发展发轫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明清时期渐入佳境。江南的发展可归结于几个因素。它紧靠长江、大运河，又便于海运，有利于它逐渐成为扩大了的市场网络的中心。宜于棉花种植和养蚕缫丝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促进了江南的商业化。随着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必须输入大米，这就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成长。韩书瑞和罗友枝在其18世纪研究著作中指出。

到清初，长江顺流而下从内陆运载大米，同时，长江三角洲也开始成为消费品的加工中心，经由大运河从华北输入原棉，输出棉布和蚕丝。农村地区生产的手工纺织品经商人转手返销给农民，农民用出售粮食所赚得的钱购买棉布。早在西方人发现上海之前，上海就已成为兴旺发达的沿海贸易集散地。……成为国内集散地和制造业中心所带来的商业利润乃使长江三角洲具备了撑持其政治与文化显赫地位的经济基础。

江南与苏北之间不断拉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体现在清朝治国大员的政策中：他们鼓励把江南妇女的手工编织作为“穷苏北”妇女仿效的榜样。

到20世纪初，江南以富闻名，一如苏北以穷闻名。江苏两个地区间的差异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商业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印证了这种差别。

一位民国时期的作者描述了苏北相对于江南的贫穷和落后，她宣称，长江真正界分了富与穷。在长江北岸的靖江，她抱怨说：“如果你想买一磅小甜饼，那是难上加难。即使你想买白米，也得过江到江阴去买。”相对充裕的商品表明了以下事实：到20世纪，江苏的大部分商业财富集中在江南。当地的银行提供了资本配置的简要统计：1915年，虽然苏北号称拥有的本地银行数目多于江南（136:111），但北方的银行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资本（927715元），而江南（包括上海）的银行拥有将近四分之三（2791500元）。商会证实了类似的格局：1911年，江南（不包括上海）有39家商会，11981个成员，收入68676元，而苏北只有25家商会，5471个成员，收入35439元。江苏南北商业化水平之间的不均等不仅仅是统计数字上的不均等，而且也是观察力敏锐的旅行家目睹的，下列有关1930年沛县北部的描述如实反映了这一点：

进入沛县的县城就像踏进农村。人们全都务农。若有人在路边的一辆装载着粗布料的手推车上吆喝叫卖，那就是布店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店铺是类似于南方称为小摊点的铺子。……在整个沛县，只有大约30家店铺拥有资本投资超过1000元。把所有这些资本加在一起也仅仅达到上海一家小公司的水平——尽管事实上沛县地域三倍于无锡县的面积。

苏北和江南不同的商业化水平同两地城市化的迥异程度两相映照，江南城市化程度高得多。

江苏发展起来的那些近代工业也几乎完全集中在江南城市里。例如，1931年，江苏403152个产业工人中大约95%受雇于上海和无锡、常州、杭州等江南城市。在苏北，只有南通市才可能拥有数目可观的工厂工人；再往北的城市，如扬州、盐城、阜宁，每个城市的产业工人均少于100人。工业已是蒸蒸日上的江南经济的一部分，而苏北则仍依赖农业生产：它是原棉、盐、猪的主要产地。王南

屏在他的研究苏北农村的文章中指出：“在这广大的区域内，除去少数的资本家、大地主和官僚政客聚集于城镇或都市外，均为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农民。”

即使是农业生产，苏北亦无法同江南竞争，这反映在江苏两地区土地价值的高低上。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锡、常州一类的江南诸县的水田平均每亩以100至140元出售，而在苏北每亩只消花30至50元；一亩旱地在江南须花55至120元，在苏北只值20至40元。江南是全中国最富有的农业和商业地区，与江南相比，苏北的确贫穷和不发达。

这些经济数据昭示了苏北的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这些经济数据是据以界定苏北的另一种标准。除地理、语言和文化以外，苏北是由经济来界定的：穷者为苏北。这种标准同其他标准一样，同以长江为界的划分，不尽相关：人们发现，长江以南的贫困地区被视为苏北的一部分，而长江以北的富裕地区被认为是南方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所指出，南通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探讨20世纪80年代江苏的行政区划时指出，南通通常被视为苏南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在经济发展上有所雷同”。其实，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南通是江苏主要工业中心之一：它的棉纺业在规模上仅次于上海和无锡。费孝通因此建议推敲经济发展与地理认同之间的这种互联关系。他说：“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人们就会发现，南通市政区域的北部包括海安县和如东县，在经济上并没有受上海的很大影响。”根据他的建议，只有南通较富有的南半区才可以划入某个南部的行政区。换句话说，长江以北的较富地区在经济上说是江南。

上述经济发展所昭示的第二个含义是，一个名叫苏北的地方这一概念只是在江苏北部相对于南部变穷时期才出现的。政治史突出地表明，江南/苏北之分的信念只是在并不久远前的时期才出现的。尽管清初已将司掌财政和学政的官员分开，分别派往江苏南北两地，但只是到20世纪初我们才开始发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可等量齐观，人们便试图进一步区别对待江苏南北两地区。例如1905年慈禧太后提出将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完全单独建省，名曰江淮，据说是为了减少官方

对苏北遭遇的怠忽。但该计划仅仅执行了三个月便被撤销。此后于1909年，江苏被分成两个单独的行署区，一个涵盖长江以南地区，另一个涵盖长江以北地区。20世纪30年代，长江南北两地的一些人士不断吁请分省，不过他们对以何为界并不总是意见一致。最后，如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建立政权时，它在长江南北建立了各自完全独立的根据地，不过，它还把江苏淮河南北两区分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别在长江以北和以南建立了苏北和苏南行署区，而没有重新将其合并为一省，直到1952年。

对政治分省的关注，同对江苏南北之间差距的更清晰的感知如影随形。当年苏北繁荣时，绝不意味着长江是明显的分界线。只有在苏北经济衰落的背景下，苏北作为一个准政治单位的概念才出现。也就是说，苏北不是一个早就存在的、界定如一的地方，而是代表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形成的。

尽管经济发展的格局有助于解释对江苏南北差距的强化信念的出现，但不能彻底解释何以有一个同质的、名曰苏北的江北地区的概念。鉴于这个术语和常识风行一时，似乎淮河以北地区即淮北有可能被单列为与江南形成反差的落后、不发达和穷苦不堪的地区。

要弄明白苏北概念何以出现并最终弄懂苏北的含义，就得考虑最后一个因素：江苏移民的格局。随着19世纪江南商业和工业经济的拓展，随着苏北日益沦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大批农民开始南迁，在那里形成了一个下层阶层。他们讲一口同吴语不同的操北方口音的方言，被认为是准外来者。有些人来自盐城，另一些人来自南通，这种微妙之处对于他们在南方遇到的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在江南居民看来，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北方人。极有可能，只是因为来自长江以北的如此面广量大的移民人口涌入，致使南方的人如此关心把江南与“苏北”区分开——这是宣称二者身份各异的本质所在。

苏北人这个概念由于源于移民格局，因而实际先于有地名曰苏北之信念而存在。苏北人极有可能是一种标签，用以描述江南和上海的移民人口。一旦苏北人

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苏北作为一个地方的理念便产生出来，以界定他们的原籍。如果说苏北被界定为一个地方主要是为了描述移民人口，那么，地域只是含糊地被界定，在某些方面对定义满不在乎，用一连串往往是矛盾的标准来界定苏北，或者，苏北甚至可以包括安徽或山东的一些地区，这一切就不足为怪了。把一个象征清代繁荣的扬州同一个成为绝望和无法无天的缩影的沛县归为一类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一个名字已经被赋予那些“北方”的移民，他们已经愈益持久地扎根在南方了。

第三章 从移民变为族群

江苏北部的人南移至江南和上海，有个地方名叫苏北的这一信念便应时而生。只有作为移民，他们才遭遇偏见和歧视；只有作为移民，他们才第一次被贴以苏北人的标签。这个标签使南方当地人得以把自己和他们与之同族（汉族）同省（江苏省）的那些北方来的穷邻居区分开来。江南人和苏北人的这种面对面遭遇促使人类学家所谓界标的形成，从而开始了族群形成的过程。

苏北人试图在上海定居促发了立足于江南的中国精英集团和外国控制下的租界当局的抵制。苏北人对中国精英集团所企求的摩登高雅身份构成了威胁，上海工部局认为他们有害于这个通商口岸作为“模范居住区”的地位。对中外精英来说，苏北人是外人或客民。

从苏北到江南

到19世纪，贫穷成为大多数移民自北向南移居的背景。从苏北衰落时起，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成为来自江苏北部的难民的目的地。苏北仿佛是一块名声不佳的难民产地，他们逃离家园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仅仅是因为正值冬闲季节，农民们汇集在江苏的城镇里，以期利用救济施舍——粮食、衣服和药物。费孝通指出：“在洪水到来之前，（苏北）农家用泥巴封住家门而后逃离家园。有些地方，如里下河地区（靠近扬州），在整个洪水泛滥季节全村逃亡。”苏北地区的城镇是许多人的首选目的地。例如1876年，据报道淮阴有六七万难民涌入，扬州有4.2万人；1898年大约10万难民集结在淮阴，据说以每天2000人的速度抵达，4万人涌入扬州。

1912年的一期传教士办的期刊《教务杂志》说，一个苏北家庭的经历说明了这些难民的苦难。张姓一家有13口人：一位70岁的老祖母、她的儿子和儿媳、儿子的五个未婚子女以及一个已婚儿子、她的孙媳及三个孩子。全家有地14亩，在正常年景尚能生存。但在1909年，他们入不敷出，卖掉了2亩地。次年，由于饥荒，又卖掉了6亩：

上一个夏秋，他们种植的几乎全部小作物都被洪水毁了。大约11月1日，他们算一算省下来的和在其他田里拾得的全部谷子，发现如果他们吃“干的”（即吃馒头，不吃稀饭），那么他们的谷子只够全家吃六周，如果把现剩谷子同萝卜、萝卜缨子、山芋藤和他们能种或能拾掇的其他瓜菜藤蔓混杂着吃，而且要吃得很稀很稀，那么够全家生存三个月或再长一点。但是，到收成之前还有七个月又该怎么办？即使逢上好年景也找不到活干，奈何这是荒年，又逢革命。

于是，全家开了个“家庭会”。他们决定：张先生、他的大女儿（15岁）、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加上大孙子留在家里。已婚的儿子带着他妻子和两个幼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老奶奶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他们把少量存粮的大部分留在家

里。因为他们希望南下镇江或南京，在那里喝稀薄的残羹剩粥度日，如果他们找不到什么工作做的话。他们推着独轮车出发，男推女拉；推车上载着两个小孩、许多作燃料用的玉米秆子、一口锅、一张夜间用以盖身的大芦苇席。其余的人步履艰难，随后而行。他们日复一日地走呀走，脚底疼痛乃至抱病而行。他们沿途挨村乞讨。在清江浦，他们稍许安顿一阵子，试图乞得生计。但是他们失败了。同其他人群一道，他们挤上了一条发散着臭气的旧船，两三天以后漂泊在长江上。在这里，他们被官方的一纸命令驱赶回去。

那些前往江南农村的人也许比张家运气好些。因太平天国运动而人口减少的江南各地亟须招人垦殖，这就为19世纪后半期许多苏北移民提供了重新安置定居的机会。历史学家白凯在她关于江南农民的著作中指出，1866年的苏北逃荒难民是定居于江南劫后各地的第一批移民之一。19世纪80年代，另一波苏北移民重新落户江南。即使在太平天国之后的重建不再是一个问题时，循环往复的饥荒、水灾（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战乱）仍促使大批苏北人南渡长江去南方当农民谋出路。作为极端的例子，如在1931年的金坛和溧阳，将近三分之二的农户是落户于荒芜土地上的苏北移民。

在江南各地农村，来自苏北的移民都知道，即使是江南最差的环境也比他们故土的环境强，他们形成了一个次等阶层。费孝通追述他在孩提时期常常见到来自苏北的移民开垦太湖周围新生成的土地。这种土地每逢太湖水涨便容易遭受水淹，当地人视为非理想之地。村松祐次在他研究江南地主所有制的文章中进一步证实了苏北移民成为江南农民中的次等阶层的写照：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很差的条件下开始过佃农的生活”。并非所有去往江南的移民都落户在农村地区。尤其是由于工业化扩大了江南城市中的就业机会，大批人直接前往苏州、无锡、常州或南京一类的城市地区。在城市地区，同在农村地区一样，他们形成了一个次等阶层，住在棚户区，干苦力活，南方人认为这种苦力活是有损尊严的。男人通常拉黄包车或在城市码头拖运货物；妇女——其中有些是季节性移居——则寻找仆役一类的活儿干：据一份研究说，每年10月闲季，妇女们便过江寻工作当用人。

（然而，另一份报告指出，在江南城市中，苏北来的妇女很少能找到当用人的工作，因为她们难懂的方言使她们不合人意。）苏北人在江南城市里的次等地位是公认的，因而民国时期几乎每一份有关江苏的调查研究报告都重复以下看法：“在江南长大的男女目睹江北人每年来到江南的市镇。他们当小贩、工厂工人、黄包车夫，做一切最低级的工作。他们在破旧的小船上起居饮食和抚养他们的子女。”不论是在苏南的城市抑或农村地区，苏北难民，或者如人们通常称呼他们的，江北流浪汉，被认为是无序之源。早在1814年，来自江苏和浙江的官员向皇帝抱怨杭州、嘉兴、湖州、苏州和常州等江南地区的江北流浪汉造成的混乱。皇帝圣谕称。

每届秋冬之闲，有江北淮徐海一带游民，百十为群，或乘船只，或推挽小车，或结队步行，衣履齐全，不类乞丐。号称饥民，所过乡村，坐索饭食，铺户等敛钱资送。必须给其所欲始去，否则恃众强取，人皆畏其强横不敢较论……富民铺户，有畏其滋扰先期徙避者。

社会历史学家科大卫在他研究江苏的作品中指出，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不断有出事的报告——从小偷小摸到因“饥荒—讨饭”引发的冲突——涉及江北流浪汉。江苏北部某些城市的官员下决心处置这些“不良”分子，因而实际上是拿出钱把他们运往江南，在江南他们大概可以前往任何地方。江南城市里的官员，部分听任难民季节性涌入，等待冬季结束，然后发给难民“路费”，好让他们返回北方。这些努力并不总是奏效，正如上海报纸《时报》一篇文章的作者所抱怨的那样，“来自淮扬地区（淮安/扬州）的难民聚集在一起，向东而来。他们的首领是流氓恶棍……他们沿途闹乱子。去年我们给了他们钱，送他们去开垦新土地。但是现在他们回去了——他们约有7000到8000人”。

于是，在江南各地，苏北移民成为受鄙视、受侮辱的人群。正是这种特征产生了一种信念，以为来自“江之北”的人形成了一个内聚性的同质的社会类别，即“江北人”。那么，江南的这些江北流浪汉是否构成了一个族群呢？人们必须

进一步了解江南人与苏北移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才能确定这个地区名称是否承载着外在于上海的族群性。正如无数人类学研究所揭示，族群当然不一定要有城市背景。但是，即使苏北族群的建构源于农村，也没有像它在上海那样具有突出的含义。在苏南，苏北人和江南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本地人—移民的关系。江南人对本地人地位的诉求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上海，江南人和苏北人都是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江南人竭力要僭取本地人这个地位，宣称上海是他们的上海，因此他们夸大了自己和苏北人之间的区别。

上海的客民

正是在定居江南各地的种种境遇中，一个苏北人群体在上海形成了，这个群体历经民国大部分时期，大致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无法知道从苏北去上海的移民的确切数目，但大致可以弄清移民的几个主要时期。尽管从1842年这个通商口岸开埠到1949年，江苏北部的人一直在迁往上海，但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乱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如上所述，19世纪60年代晚期的饥荒，加上太平天国的影响，促使大批苏北人移居上海。早在1907年，众多的家庭因自然灾害而逃难，致使上海建立江北饥荒救济委员会来关注苏北难民问题。苏北移民人口众多，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一位日本观察者的注意，他描述了一个“江北人阶层”。1911年、1921年和1931年的洪水泛滥迫使更多的人离开苏北，到上海去谋出路。1931年的那次洪水泛滥最为严重，淹没了6100多万亩耕地（在某些地区水深20英尺），将近400万个家庭濒临饥饿的边缘。据政府估计，在那个时期大约有78045名苏北难民来到上海。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战乱更甚于自然灾害，成为难民移居上海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苏北广大地区为日本人占领，导致许多当地人背井离乡。例如，在1937年涌入上海的7.5万名难民中，来自苏北的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是最大的单股人流。将近10年以后，苏北（其中一些地区已成为共产党根据地之一）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场，有更大数量的苏北人离开家园去上海。1946年，将近5.9万名苏北老乡到上海的苏北难民救济会议办事处去登记，他们大多数来自盐城和阜宁。上海一家日报的记者报道说：“穷苦的苏北人在乡下活不下去，故扶老携幼来到上海乞讨为生。他们遍布上海各地，从北火车站到市中心，沿南京路、黄浦江边的外滩等一带。到了晚上，他们睡在街边。其境况实在悲惨。”

内战时期来到上海的移民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他们的先驱者。尽管先前的移民队伍里往往有一些富人，大多数是相对穷苦的农民。然而，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移民多半是地主、小工商业者或学生。在登记填写职业的难民中，21649人是农民，7059人是工人，13170人经商，4400人是学生，541人系（旧）政府官员。学生人数之大，足以促使苏北难民救济会议设立专门委员会来处理学生的苦难。来自苏北的地主数目相当可观，构成了对闸北棚户区共产党发展组织的一个障碍。虽然苏北人还没有在上海“精英集团”中构成重要存在，但20世纪40年代晚期移民的经济地位大不同于早先到此来的移民的经济地位。尽管如此，越来越多不是贫民的移民的到来并未改变苏北人贫穷落后的局面。也许后来的事态发展很少改变最初的成见。然而更可能的是，江南“精英集团”不断需要一个另类。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对苏北人的嘲弄在富裕移民到来之后也许加剧了，这些富裕移民的存在，对江南人群体自诩为上海精英文化代表的诉求构成了潜在挑战。

几乎从大批苏北人开始抵达上海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视为一个格格不入的集团。他们被认为玷污了城市景观，因为他们无知、不讲卫生习惯（有一篇文章抱怨“他们的小孩随地大小便”）和贫穷。上海居民不时试图阻止他们在该市定居，江南各地的农村居民也曾这么做。例如，1911年洪水泛滥时，上海近郊昆山、江湾的居民同数百名试图在那里安身的苏北人打了起来，想把他们赶走。江湾的官员给他们钱以便“把他们赶出该地区”。在上海的杨树浦地区，人们招来警察同苏北难民斗。差不多与此同时，大约200名在浦东“闹事”的苏北难民被当地民兵押到船上并遣返故乡。为应对每一次重大自然灾害后移民涌入而建立的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不仅旨在提供救济，而且也是为了协助难民返回他们的故乡。

不让苏北移民定居上海的尝试还涉及外国控制下的上海工部局。工部局极少像这样对待和诋毁苏北人。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有关上海一些中国居民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部局卫生处开展的接种牛痘运动，该处1917年的报告抱怨所谓“江北人”的抵制，他们“组成了这个数不胜数的阶层的大多数。他们的唯一职业似乎就是小题大做”。报告说，苏北人“是一个阶层，工作勤奋但生活条件

极为原始，没有什么家产，住在乞丐船、乞丐村里，拥挤不堪”。报告断言，这些人是“那么缺少文化，因而哪怕送上门去还是拒绝种牛痘”。

工部局并非针对苏北人本身，而是在促进这个社会类别的建构，因为他们把苏北人的从业和住处说成是应当予以消除的贫困的象征。拾破烂（传播灰尘、污物和寄生虫）、拣废棉（“引起灰尘”）、清扫羽毛（“引起灰尘”）和养猪——所有这些职业都同苏北移民相联系——被上海工部局认为是“不体面的营生”。养猪尤其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工部局官员有时抨击一些团体参与养猪生意。例如，1925年的一份来自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说：“工部局总董于12月4日发布命令，解散南市施家浜（音）平安里8号的一个会所，这个会所的成员全是做养猪生意的江北商人。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担心这些猪贩子可能利用这个会所的组织抗税，这些税是当局对所有进入上海的猪征收的通行税。”更令工部局不安的是以苏北人为主的拉黄包车职业。从19世纪晚期起，外国官员力图以更新式的电车来取代黄包车，但成效不大。1894年，一本上海旅行指南的作者指出：

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的苦力不会再浪迹街头，堵塞每一个通道，危害我们的生命财产了。行人不会再受到不断地拉住你要钱讨吃的烦扰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由于电车的引进，人们得到很大方便，得以乘坐干净、舒适、设备齐全的交通工具，而且各种天气都不在话下。

这些描述深刻地影响着江南“精英”对什么是摩登时尚的信念。外国人按职业论事，江南“精英”则按原籍语言说同一件事：在外国人看来是黄包车问题，对于江南“精英”来说则是苏北人问题。

涉及上海工部局和江南“精英”试图要把苏北人从上海风景线上赶走的最富戏剧性的例子是棚户区，那里生活着压倒多数的苏北人。尽管并非所有的棚户居民都来自苏北，但当时（中外）地方当局与棚户居民之间的争斗成为建构苏北族群的一个重要舞台。

棚户区的斗争

19世纪中叶，大批苏北人开始移居上海，许多人在临时的棚户区搭建住所。对一些人来说，搭盖或租赁一间棚屋，是跳出他们过去带到上海的“氍毹船”生活的一步。（在棚户区发展起来以前，纵横交叉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近郊的苏州河和其他河渠挤满了此类船屋。）在许多情况下，移民一直住在船上，直到船体开始崩裂，于是把船体搬到岸上，用以搭盖棚屋。或者，他们仅仅用帆篷搭一个低矮的、隧道状无窗滚地龙以便在夜间睡进去。只有干了几年活以后，大多数人才有能力买些毛竹或麦秆稻草，用这些东西和泥砖搭盖较为耐久的草屋。另一些人盖不起草屋，便以每月0.5—1.5元租一间草棚。草棚弱不禁风，墙洞权当窗户；一片旧布做门。如能搞到油毡纸，就做屋顶，若没有油毡纸，就用不大能防水的稻草盖屋顶。室内在砖上铺稻草便是床，旧的洋铁罐子作火炉。草屋内常建有阁楼以便容纳别的家庭；大多数草屋里住着至少两家人，有时住四家之多。草屋内用不上自来水。从当地井口里提取的少量井水通常很脏，故许多居民靠从街区消防水龙头取水，工部局每天早晨允许打开水龙头一小时。

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上海到处可见的草屋居民群逐渐演变成街区式的棚户区。查尔斯·尤尔特·达温特在他的《上海：旅游者与居民手册》里描述了这样一个社区：

在苏州河的高河段地区（虹口），从施高塔路往北，游客们只要愿意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乞丐村。这些人来自长江以北，江北是个贫困地区。他们的草房是用手脚边能得到的随便什么东西盖起来的——泥巴、芦苇、碎砖、旧木板、动物毛皮、麻袋布，还有宣传昂贵肥皂的涂瓷漆铁皮广告牌。那里有的是婴孩、癞皮狗和冬天穿衣、夏天光屁股的顽童。

棚户区是不同时期在上海不同地区出现的。在19世纪晚期，沿黄浦江两岸形成了第一批这样的居民点，大部分是苏北人居住，他们来到上海码头干活。到

1900年，浦东潮泥塘、白莲泾、洋泾港、老白渡、烂泥渡都有了棚户区。随着20世纪初在上海东区杨树浦、西区曹家渡和小沙渡（沿苏州河）盖起了工厂，来厂里和沿码头附近干搬运工的苏北移民在上述这些区域建立了棚户区。例如，在工厂建立之前，后来成为棚户区的药水弄原是苏州河沿岸的空地，只有十几个农民住在那里。到20世纪30年代，药水弄成为一个拥有1000多个草屋居民的居民区。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成为另一个大居民点。夹在两区之间的苏州河本身就是许多“浮动棚屋”的发源地，这些“浮动棚屋”建在小船上，小船是从苏北到上海跑运输的。与此同时，沿杨树浦路和平凉路一带的杨树浦，居民区一个接一个涌现。

1932年和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导致棚户区扩散，尤其在闸北，那里由于有火车站而遭到重创。闸北新民路、大统路、光复路一带、包括蕃瓜弄的棚户区，全都是这个时期在被炸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最后，到那时为止，新的一波46—47苏北移民在内战期间来到上海，棚户区开始在相对繁华的徐家汇区沿河边出现。例如，肇嘉浜就是在那几年里兴起的。到1949年，将近百万人住在草房里，上海约有322个棚户区，每区至少有200间草房。蕃瓜弄本身约有16000个居民。几乎所有这些棚户区都在大多数中国精英居住的外国租界之外，突出地表明了苏北人在地理上天各一方的处境。棚户区围绕租界形成了几乎完整的一圈。

差不多就是在棚户区出现的同时，工部局官员和房地产投资商就力图把这些刺眼的东西从城市风景线上去除。正如一篇有关试图铲除一个草棚居住区的报道作者简明扼要地说的那样，“租界是一块纯洁干净之地。”临时搭建的草棚被认为“有碍公共卫生和安全”“有碍观瞻”——明显与之格格不入。

自然力量经常促进摧毁草棚的努力。例如，大雨是草棚存在的经久威胁。M.T.邹（音）在20世纪20年代调查了上海工人的住房条件，他描述的情况正是暴雨期间草棚的典型遭遇：

因为该地坑坑洼洼污水满地，居民们最终不得不用泥土填高道路以确保某些通道。但这样一来使四周地势高于室内泥地面。于是，一旦暴雨倾泻，洼地污水泛滥，连泥带水夹杂沼气流进屋内，使之顿成一片汪洋。暴雨过后，笔者目睹男男女女在草棚内行走，污水齐膝深。小孩们被放在用床和桌椅搭成的岛状物上。往往好几天水势不减退。

毫不奇怪，许多草棚殊难幸存。

火是草棚的另一个频发的威胁。火灾经常发生，往往由油灯引起，或者是烧木炭的火炉惹祸。人们在寒冬的几个里把炭炉拎进屋内烧饭煮菜，并用其余温取暖御寒。在一次典型事故中，一位来自高邮的妇女一手抱着她的婴孩一面在自家的草棚里烧煮，她家住浦东。小宝宝一哭，她就步出户外把宝宝交给她丈夫。这时，靠近炉灶的墙着了火。他们的草棚和许多邻家草棚皆毁于大火，大约500人被火烧伤。类似的大火事件在草棚居住区里司空见惯，有时还毁了整个社区。例如，1949年1月闸北棚户区发生的一场大火烧掉了600间草棚，使2000多人无家可归。从1948年6月到1949年5月这一年之内，据日报报道，棚户区至少发生了37次火灾。

火灾的影响也许未必严重，因为当地的救火会对草棚救火往往不那么热忱。例如，1940年一个棚户区发生大火，法租界内离得最近的消防站的救火队员们断定灭火得不到什么好处，因而对呼救电话不作回应。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1月，消防队员对虹口区的火警电话作出了反应。当他们发现火灾发生在棚户区，便无心去救火，声称泥泞小路太窄，救火车进不去。

然而，火灾并不总是无意发生的。放火往往是竭力要铲除草棚的土地所有主的最后手段。例如，1936年闸北裕通路的土地所有者下令草棚居民迁走，那里建有好几百间草棚。居民向租界当局请愿，要求推迟迁出的截止日期。然而问题尚未解决，一场火灾突然发生，在烧了10间草棚以后，租界消防队员才到达。可以肯定，这火是有人纵火。大约400个草棚居民举着旗帜揭露火灾原因，他们游行

至巡捕房，要求公布真相。消灭草棚并不经常借助天灾人祸。相反，从19世纪中期起，租界当局就依靠法律程序来拆除草棚。在1845年土地法规生效时，就已经认定草棚足令外国人厌恶，因而该法规第33条禁止盖草棚——这条法规成为后来公共租界拆毁草棚的依据。从19世纪70年代起，报纸频频报道警方力图拆毁棚户区。例如，1872年的一篇题为《拆毁草棚》的文章描述了这种要消灭公共租界内苏北难民在空地上搭盖的草棚的令人沮丧的做法。巡捕房多次试图驱赶草棚居民，逮捕那些拒毁草棚的人，理由是他们违反租界的法律。该文作者抱怨道：“但这些客民——如果你驱赶他们到东，他们就迁移至西。很难摆脱他们。”20世纪初，草棚仍然令官方心神不宁；继续消灭草棚的图谋被记录在报纸的文章中，文章的标题如《客民占领土地，不欲搬迁》《驱逐沿浦江北客民》。1925年冬天，在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上海工部局用一夜时间拆毁了杨树浦平凉路一个棚户区的1000多间草棚。

正如上述报道所示，草棚居民并未逆来顺受地接受要拆除他们家园的做法。他们抵制这种做法，往往是以高度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抵制，开展斗争，这种斗争以往在有关上海民众抗议的史书中多半被忽视。草棚居民与租界当局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加剧，这也许是在1931年苏北洪水泛滥后草棚居民人数大增所致。上海工部局的年度报告如实报告了市政问题，尤其是巡捕房与草棚居民之间的准战斗。例如，1931年的年度报告得意扬扬地宣称大约4590间草棚已被清除。然而，次年报告的作者承认，“大批草棚即通常被称为‘叫花子’棚的存在，乃几年来焦虑不安的缘由”。

1931年决定登记现有草棚，意在逐渐消灭之，因为它们是公共卫生确定无疑的威胁，也构成了严重的火险公害。2041间草棚就这样登记在册。春季难民大涌动，由于紧急状态存在，日常监督放松，大批新的草棚又建起来，乃终于决定通知住户一个月后拆除这些草棚。

这些努力的结果令工部局失望。该年度报告抱怨称，擅自搭盖的草棚“在这一年（1932年）里一如既往添了不少麻烦”。接着报告描述了要拆除草棚的屡屡受挫的尝试：

拆毁未登记的草棚一事先是由公共工程处在10月初开始，后移交给公共卫生处于11月初接办。拆毁这些草棚的工作变成了擅盖草棚者与公共卫生处之间的一场消耗战，因为一间草棚刚被拆毁，马上又盖建起来。草棚居民持之以恒。例如在3月间，一个擅盖草棚的村庄毁于火灾，尽管警方提防，但这个村庄却在两个月内完整地重建起来。

租界当局与草棚居民之间的较量在1936—1937年间达到紧要关头。1935年，上海工部局决定下令租界区东部大约1万名草棚居民拆除他们的草棚。兰路以东的草棚须在1936年7月11日以前拆除；兰路以西的草棚则在8月8日以前拆除。截止期一过，余下的所有草棚将由巡捕房拆毁。同时派巡捕前往棚户区，在每间草棚的门上涂上绿色号码，要求居民向工部局交纳租金（大多数从未做到）。

第一个截止期限到来时，棚户区依旧草棚林立，下午八点钟，工部局派出50名中外巡捕去勒令居民离开。草棚居民表示无意服从；大约2000名居民发动抗议。妇女们拎着便壶作武器，男人手持扫帚，孩子们挥舞着平时用来清刷便壶的刷子，他们指责巡捕房行为“不得人心”。妇女们用便壶围成一垛包围巡捕的墙，巡捕房让了步，同意再宽限五天让居民迁出，否则将加派军队再来。

草棚居民加紧其有组织的努力：来自上海东部棚户区的代表前往上海北部和西部的棚户区，建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各处棚户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代表最终与工部局达成协议，把棚屋拆除推迟到秋天。棚户则答应建立责任制确保不再搭盖新的棚屋。

休战是短命的，9月初的一起表面看来不大的事件引发了新一轮冲突。一个人的棚屋坍塌朽坏，他决定修补他的住房以防漏雨。工部局认为此举违反了不得建新棚屋的暂时禁令，乃派巡捕拆毁了他的棚屋。邻居聚众抗议；巡捕用棍棒把众人打了回去，打伤了一些人。这就促使棚户的那些所谓的娘子军动员起来，她们用马桶刷子打巡捕，将马桶内的污物扔向巡捕。《申报》记者说：“臭气不堪！”许多妇女被捕，被押往杨树浦捕房，罪名是“妨害秩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其整修翻新而引发事件的那间棚屋在随后的骚乱过程中毁于一旦。

经此事件，棚户与工部局之间的冲突减少了，这多半是因为工部局明显地舒缓了它要消灭棚屋的决心。但是，在工部局于1937年春宣布拆毁棚屋的新的截止期限后不久，棚户居民再一次组织起来捍卫他们的住所。棚户居民在每条街道上集会，集会之后大约上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吁请保留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请求于4月遭到拒绝后，他们发动了示威。为同4000名示威者较劲，工部局不仅派出警力而且派了一个排的上海义勇队俄国团士兵，他们配有机枪。示威者于是撤退，派代表团会晤工部局助理秘书长T.K.何（音）。双方达成妥协，据此，代表们同意负责拆毁476间棚屋并清除残存的废稻草和竹棍。反过来，工部局提供被左倾的《密勒氏评论报》编辑们称之为“怜悯金”的费用，每个棚户14元（折合4.05美元）。只有在全部476间棚屋悉数拆除后才发钱。

这项计划的结果不得而知，也许落了空，因为计划执行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不管怎样，被拆毁的少量棚屋，同战时难民新盖的大量棚屋比起来，肯定相形见绌。战争结束时棚户数目是如此之大以致消灭棚屋成为国民党领导的市政府的重大项目之一。1945年底，市府颁布法律禁止搭盖新棚屋。政府官员解释说：“为确保大多数市民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牺牲少数集团的利益，尤其是考虑到夏季卫生问题和冬季火险问题，这些棚屋的确是全市市民的一个危险。……棚屋必须被清除！”该法律没有发生效力，仅仅过了一年又通过了一项内容几乎相同的法律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一次规定专门由警察巡逻负责执法。奉命巡逻的警察向棚户居民发表一项声明，称他们不会亲自动手，只是执行政府命令。这些

法律——即使加上警察巡逻——似乎很少对棚屋问题产生影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时期棚户数目有所减少；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倒是由于来自苏北的难民使棚户队伍膨胀起来。1949年中国共产党最终接管上海时，面广量大的棚户成为它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尽管它并未彻底清除棚屋，但由于建造了棚户居民租用得起的公共住房，同时禁止人们从农村地区移居上海，因而大大减少了棚户数目。

1949年以前的历届政府清除棚屋的尝试，不管多么持之以恒和坚决，都不曾取得哪怕是少许的成功。只要农村移民继续流入上海，棚户区的扩散就不可避免，就像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经历一样。从政府角度看，清除棚屋之战吃了败仗。然而此战仍然意味深长，因为即使它没有明目张胆地针对苏北人，但实际上是针对苏北人在上海的城市风景线上所占据的一席安身立命之地。这种企图是要把这同苏北人相联系的贫困清除出去，或者至少是迁往该市的边缘地区。

然而，不能把拆除棚屋的企图理解为江南精英与苏北移民之间的直接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受外国支配的上海工部局在袭击棚户区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间接地说明了外国在上海的存在促进了苏北人这个类别的建构。在外国人看来，至关紧要的事实是棚户区的扩散，给现代城市的形象抹了黑。至于究竟谁住在这些棚屋里则多半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对于观察和参与这场斗争的中国精英集团来说，出身原籍至关重要。一篇杂志文章写道：“南市、闸北、浦东、徐家汇和土山湾的贫民窟居住着江北穷人。”一家报纸的一篇有关闸北棚户区的报道称“江北穷人正在盖草棚”；另一篇报道提到“江北客人住进贫民窟”。把棚户区归结为苏北人并冠以江北棚户区的称号，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同如此冒犯外国精英的一种中国现象分离开来。于是，棚户区就成为苏北人这个类别被建构并充实以象征性含义的中心舞台。

在棚户区问题上的斗争，对于苏北人建构他们在上海的身份，具有不同的但很重要的含义。苏北人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住所时，他们是作为棚户居民而为之，不是作为苏北人这么做的。然而这些斗争极有可能在棚户区居民中输入一种在上海的新的群体意识。即使这些斗争并未导致苏北人身份的明确表述，但很可能锻造了苏北人之间的联盟，这些苏北人以前经历过并坚持更多以地方为基础的团结。

争夺的领域：争夺上海文化

屡次试图将苏北难民遣送回他们的村庄并清除他们在上海的住所，这是蓄意要把来自苏北的移民边缘化，不让他们成为上海大都市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也有其非蓄意的一面。这涉及苏北人在上海存在的文化方面。经过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捉摸的过程，由苏北移民带到上海并在上海重新界定的文化遭到诋毁，并被排斥在后来被称为上海文化的组成部分之外。各移民群体为界定新的城市文化而发生的争斗就像是一场未被意识到的争夺战。在上海，来自江南的移民，很大程度上把上海文化界定为源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化，而不是吸纳了苏北影响的文化。语言、娱乐、审美观、厨艺皆可为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上海精英集团中江南人的支配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苏北人放弃了他们在上海的文化，相反，他们和他们的文化习惯单独存在，处于边缘。

苏北地方戏的命运是苏北文化在上海坚持下来但被边缘化的例证。首先，苏北地方戏对主要以江南风格为基础的混合型上海地方戏沪剧的发展没有很大影响。其次，苏北地方戏的演出遭到贬损。从20世纪头10年起，淮剧和扬剧团在上海演出。但这两个剧团几乎从未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的大名鼎鼎的戏院里登台出演。在那里，以越剧（绍兴戏）和京剧的演出为主。例如，据1947年的一本旅行指南称，人们可以在六家戏院里听京戏，在二十六家戏院观看越剧演出。但没有一家戏院供淮剧或扬剧演出。而且，日报《申报》上的广告定期宣传绍兴戏和京剧的演出，却很少宣传苏北的地方戏。它不刊载淮剧的广告，只是偶有广告宣传扬剧团在大世界演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过这么一次，是扬剧团演出《江南美人》。（扬州花鼓戏在上海有过一次殊遇，那是青帮领袖、大世界的老板黄金荣的小老婆露兰春在杭州一个庙里烧香时喜欢上了花鼓戏。她说服黄金荣去物色演出团，于是扬州花鼓戏得以于1921年6月在大世界作为期十天的演出。）

就连天蟾舞台也不以苏北戏为特色，而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却是盐城人，强有力的青帮领袖，上海苏北人称他为“苏北皇帝”。一位上海负盛名的淮剧名角抱怨说：“我们甚至无法在顾竹轩的戏院里唱。”苏北戏最常见的不是在正规戏院里演出，而是在临时搭的露天舞台上或在苏北人居住区的茶馆里演出。如果说他们也在戏院里演出的话，那是在远离租界的相对不出名的地方：南市的民乐戏院、闸北的凤翔舞台、斜桥附近的黄山大戏院以及均位于上海西区棉纺工人集中地的上海大西大戏院和高升大戏院。

这些戏院是同上海苏北人渊源有瓜葛的人办的企业，反映了上海苏北人的经历。例如，民乐戏院的老板是有名的刘大麻子刘木初和他的老婆。他原初从淮安来，在上海先是拉黄包车；老婆到上海来是为了逃婚，靠为黄包车夫和码头工人补衣服维持生计。靠拜一位有势力的帮派头子做老头子，夫妇俩终于得以开一个茶馆。凭借他老婆做事八面玲珑的本领，刘大麻子招引了许多发誓效忠的干女儿。他老婆成为南市区相当有势力的女人。20世纪20年代后期，她和丈夫用节省下来的钱开了一家民乐戏院，到那里去听地方戏演出的苏北老乡更流行管它叫四十间。（同时夫妻俩拥有二三十辆黄包车，租给街区车夫。）

筱文艳是被卖给刘大麻子夫妇当童养媳的，正是在这家戏院里，筱文艳第一次学会唱淮剧并演出。她在上海的苏北人社群中扬名，博得了“江北梅兰芳”的诨号，表明她可与京剧名家相媲美。

当时苏北戏在苏北人中喜闻乐见，但从未成为上海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对于记者和旅行指南的作者来说，这几乎是视而不见的，甚至不值一提。这是边缘文化，同统治上海戏剧界的江南风格风马牛不相及。

苏北文化的边缘地位，在语言方面，特别是在上海方言的发展中一目了然。上海方言主要不是基于它的唯一真正的本地人即浦东人所讲的语言，而是移民讲的各种方言的混合。鉴于苏北移民先到，他们在上海人口中的人数相对众多，人们可能以为某些苏北方言已成为上海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不然，源自吴语

的苏州方言和宁波方言提供了重要影响。正如两位学者在说明宁波话中“我们”——阿拉——如何取代了我侬时所指出，“从宁波移往上海的大多数人是商人。……由于宁波商人的地位相对高些，所以人们乐于使用他们的语言”。

苏北文化对后来所谓的上海精英文化的微小影响在审美观方面也很明显，尽管是以不被轻易认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对女性魅力的信念是衡量流行审美观的一个尺度。尽管清代扬州素有美女摇篮之声誉，但在上海，却是苏州女子被认为最美最合人意。苏北妇女不仅被认为形体不妩媚，而且她们的语言也不如苏州妇女讲话悦耳动听。这种对苏北美女的蔑视仅限于上海，在广州和汉口，扬州妓女颇负盛名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衣着风格也反映了对苏北情趣的冷落。一份有关20世纪30年代晚期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型调研报告的作者们指出，江北妇女“喜欢穿红红绿绿的丝绸衣服、绣花鞋、粉红或红色长袜和其他色彩鲜艳的衣着”。相反，江南女子“总是穿着比较雅致的蓝色、黑色或灰色服装”。

饮食方面更清楚地说明了苏北文化的边缘化。在苏北各地区中，只有扬州菜能在上海厨艺界占有一席之地，纵然扬州餐馆在中国其他地区名气不小。上海旅游指南特地列举了上海的几种最有名的烹饪艺术。扬州/镇江烹饪是一类，通常出现在烹饪名单上的还有上海本帮菜、广式菜肴、京/津菜肴、宁波菜肴和四川菜肴。但是，仔细审视一下这张名单就会发现扬州食品的地位相对较低。例如，一本指南以一整页或两页篇幅来介绍北京、天津、四川、广东、徽州、宁波和上海本地烹饪，配以供应每一种烹饪菜的餐馆长名单。扬州/镇江烹饪只是一带而过，放在最后一部分，上面列入可以在上海品尝到的各式其他菜肴。《上海春秋》评估扬州/镇江食谱更为直率：它“一度在江南江北家喻户晓，但其烹饪方法保守，逐渐被人们看不上眼。在上海，除了扬州点心以外，很少见到扬州/镇江菜肴的广告。狮子头和熏猪肉是仅有的能被人称道的两盘菜。扬州/镇江菜肴比不上其他地方烹饪的成就”。

几乎所有的文化方面，从方言到食品，都表明要把苏北的影响或风格排斥在被认为是温文尔雅、真正的上海文化之外。这种排斥不应当解释为江南精英集团的蓄谋；他们并没有要密谋促使苏北文化边缘化。相反，这是他们竭力要把上海文化界定为他们自己的文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上海的时尚和温文尔雅反映了宁波、绍兴、无锡等地的风格。

苏北文化的边缘化，同企图摧毁棚户区一道，是将苏北人置于上海边缘的手段。同时，苏北（或江北）就成为预先被附着在上海生活中的所有不合口味的东西的代名词（“江北难民”或“江北棚户”），哪怕这些东西并不单单属于苏北人范围也是如此。因此，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这反映了苏北人作为一个集团无正当归属，作为移民则已成为族群。

第四章 上海劳工市场中的苏北人 族群因素的作用

较之任何其他经历，从业更能决定苏北人在上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可能谋得的工作影响到他们的居所、生活水准以及同其他移民群体的关系。他们的就业格局对于影响大众将苏北人当作一个下等阶层的认识至为重要。反过来，有关苏北人的流行看法又是界定他们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苏北人这个类别不仅说明了上海下层无产者的内部阶层，而且提供了有关它的组成成分的解释。换句话说，上海劳工市场产生了族群因素，同样地，族群因素反过来又影响上海劳工市场。

上海劳工市场的地区性质

移居上海的苏北人进入了一个大不同于，并且在某些方面更复杂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中国其他城市的劳工市场。上海的劳工市场受它作为工商业中心这种突出地位的影响。国内生产的手工艺品、机器制造品、工业生产的原料，以及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全都由上海口岸吐纳经营。上海也是中国无可匹敌的工业中心：1911年，全中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工厂位于上海，到1933年，几乎占了一半，到1949年，大约60%的工厂集中在上海。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而且也是在华带有殖民性质企业的中心。上海有着比中国其他城市比例大得多的为外国人所有的企业——从棉纺厂到黄包车公司。正是在这个复杂的千差万别的劳工市场里，才能描述清楚苏北人占据的一席之地。

同19世纪移居伦敦的爱尔兰人很相似，上海大多数苏北人干的是低技能、低薪水的工作。不论他们自己是从苏北移居来的，抑或是苏北移民的子孙后代，不论他们是逃荒而来的穷苦农民，抑或是逃避20世纪40年代土改的富裕地主，上海苏北人都集中于上海人视为低等的职业圈。民国时期有关上海劳动大军的调查显示了三大格局：诸如苦力劳工一类的粗活、力气活，几乎全是来自苏北的人干的。吸收江南人和苏北人的职业是分层级的，苏北人干的是工资低、地位低的活；要求高水平技能或教育的工作，苏北人很少谋得到。

拉黄包车较之任何其他职业更易于同上海劳工市场中的苏北人相联系，且更能象征苏北人在上海劳工市场中的地位。从19世纪中叶上海迅速发展之初起，依靠人力的运输工具就被认为是苏北移民的职业。19世纪60年代，即早在黄包车出现之前，独轮推车通常载物驮人，被称为江北马车，因为苏北移民占马车夫的多数。1875年黄包车开始使用时，苏北人立即接手拉黄包车。到1913年，上海大约有1万名黄包车夫，估计80%—90%是苏北人。到20世纪30年代，黄包车夫的人数飙升至80万，90%是苏北籍人，大多来自盐城和阜宁。苏北人拉黄包车的局

面如此登峰造极，以致民国时期一位研究者抱怨说，黄包车夫中盛行的苏北方言是他的研究工作的一个障碍。在上海精英的心目中，拉黄包车集中体现了苏北人的低下地位。一位记者指出，只有在他们的农村老家饱经自然灾害和经济毁灭之苦的苏北人才会屈尊去干这种“走兽般的”和“非人的”活。拉黄包车不仅强化了苏北人与干力气活的劳动的联系，而且确认了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在上海干这种工作的人是无文化的。一位评论者开宗明义：“几乎所有上海的黄包车夫都是苏北兄弟，这些江北人能吃苦耐大劳，是这个苦苦挣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几乎全是文盲，因此他们知识浅薄。”

这种半同情式的语调很快就让位于讽刺挖苦和嫌弃憎恶。

在精英集团的眼里，拉黄包车也许是最低级的生计，但对某些苏北人来说，谋得一份拉黄包车的工作就是一种升迁了。例如，盐城人陈财土（音）追述了他为自然灾害所迫，在1900年前后背井离乡以来所取得的进展。他先是到扬州靠卖蔬菜水果养活自己，在攒够钱之后，他在22岁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就难以在扬州谋生了，因此迁往上海。“起初我在浦东搬运石头，”他回忆道，“但这活太苦，工资微薄。一位朋友介绍我去拉黄包车，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两三年以后，我攒够了钱把我老婆接到上海。”

许多黄包车夫从未摆脱他们的农民身份，到上海打工只是季节性的。许多来自盐城、阜宁地区的车夫每年春天农忙季节回老家，只是在秋收以后才到上海来。少数来自崇明和泰州的黄包车夫多半是种花生的，他们移居的季节正好相反，春季来上海，秋季回老家。

尽管拉黄包车是最直接地同苏北人相联系的工作，但货物搬运工也是以来自苏北的移民为主。20世纪30年代，大约有5万名码头工人是以所谓苏北帮为主的。上海码头的搬运工中，人多势众的苏北人几乎无以复加，如同拉黄包车行业一样，苏北方言成为这个搬运行业的语言。也同拉黄包车一样，码头工作并不提供稳定的就业。尽管许多码头雇用少量长期稳定的水手，但这些水手主要由来自

宁波的工人组成。来自苏北的雇员是临时受雇的，通常是一个月受雇15至20天。在上海火车站拖货的工人大多数也来自苏北。

最后一类以苏北人为主的工作属于服务行业。例如，压倒多数的理发师是扬州人，1920年大约有2.4万人。有些人在正规理发店工作，但多数人在街头执业，一条扁担上，一头是顾客坐的板凳，另一头是一只洗脸盆、一条毛巾和理发工具。

少数理发师在里弄口临时摆摊：一个布制的帐篷，里面有一把椅子和一面镜子。澡堂工人也绝大多数来自扬州。1920年，上海60多家澡堂估计雇用了2000名工人，在客人洗澡时为之修脚、捶背，在客人浴后休憩时为之端茶送水。

很多小皮匠、拉粪车工、扫垃圾工也来自苏北。一份描写上海市政府雇员的研究指出：“来自江北的乡下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当一名扫垃圾工的地位如此低下，所以一位来自盐城的人宁愿失业苦熬也不愿干扫垃圾工。当他为了生存别无选择只能去当一名扫垃圾工时，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追述说：“市里雇用的扫垃圾工必须穿红布衫，我恨穿着那件红布衫，因为那样一来人人都可以看到我是谁、我干的是什么。所以我每天一干完活就脱下那件布衫！”

服务行业中并非所有的职业都以苏北人为主。少数职业实际上是江南人的天下。例如，大多数裁缝来自宁波、常州等江南地区。而且，江南裁缝的生计与从事服务行业工作的苏北人的生计之间有着天壤之别。1920年裁缝一天挣3—7元，理发师只能指望挣2—3角，而理发师挣的收入要比服务行业大多数苏北工人所挣多一些。

还有许多产业既雇江南人，也雇苏北人。几乎所有此类产业都有岗位等级，江南人占有高层次岗位，苏北人则在底层。此类最重要的例子是工厂的工作，因为工厂里雇员人数多。对他们来说，在工厂谋得工作是他们所向往的。一位当扫

垃圾工的盐城人追述道：“我们真的希望到厂里工作，我很羡慕我的几个亲戚，他们在工厂工作。但我就是进不了厂。”另一位在市环卫部门工作的人毋庸置疑地说：“没有哪一个出生在苏北的人能进棉纺厂工作。能进棉纺厂工作的苏北人只有那些在上海出生和长大的苏北籍人。”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在苏北出生和长大的妇女进入上海的棉纺厂工作。男人的被扭曲的印象突出地说明了如下事实：谋得一份工厂的工作对苏北人来说是上升了一步。

上海产业工人阶级的精英——从事高度熟练工种，以最高工资级别受雇——主要来自广州和江南。有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工厂工人籍贯的现存资料很少，这表明苏北人很可能是在上海工厂工作的后来者。最早的工厂工人群体来自广州、宁波和上海本埠。例如，19世纪50年代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建立时，技工是从广州招聘来的，广州的外资造船厂早已开工。来自宁波和上海的农民受雇从事非技术工作。根本没有提到有任何来自苏北的工人。

20世纪20年代初，苏北人开始出现在工厂工人的档案里，他们集中在一般只需起码技能、提供最低工资的行业里，如缫丝、纺棉等。例如，1934年机器制造业工人平均一天挣0.85元，造船业工人1.24元，缫丝厂工人一天只挣0.31元，棉纺工人一天只挣0.47元。这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工人收入的差别，因为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以男工为主，而纺织业主要雇用女工。而且，即使在女工为主的纺织业内部，以苏北人为主的行业——纺棉和缫丝——开出的工资大大低于来自江南的工人居多数的行业。内衣针织厂工人在1934年平均一天挣0.79元，丝织厂0.90元，棉织厂0.61元，烟草业0.57元。——全都高于上述提及的棉纺、缫丝业的工资数。

甚至在棉纺厂和缫丝厂内部，工资相对高一些的岗位也给了江南人。在苏北工人的最大雇主之一的棉纺业中，被认为强壮、有力气、不怕灰尘的苏北女工被分配到工作脏苦的车间。20世纪30年代，纱厂经理们开始雇用女工代替男工进入粗纺车间，他们就招聘苏北妇女来干这些活。“这是因为上海本地人不愿意干这

个工作，”一位纱厂经理解释说，“工资未必是最低的，但这是粗活。在粗纺车间里，灰尘多，空气不太好。”来自江南农村的妇女集中在织布车间，那里的工作一般需要有点技能，工资也高些：1934年，织布女工平均一天挣0.64元，而纺纱车间女工挣0.46元，粗纺车间0.53元，缫丝车间0.43元。而且，许多在纱厂工作的江南妇女最终成为厂里的主管、秘书、会计，这样的提升对于苏北妇女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在缫丝业里，明显存在着江南工人和苏北工人之间的类似分工。（有独立性的并更有名气的丝织业以浙江、常州、苏州来的工人为主。）20世纪20年代晚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访问了上海一家缫丝厂，她被苏北妇女做的糟糕工作所震惊。这些工作往往包括来回翻搅沸水中的抽丝蚕茧那样的苦活。相反，来自江南的女工同厂里的管理部门有私交，她们受雇工作的条件要好得多。同样地，在烟草业，大多数工人来自浙江，少数受雇的苏北工人只做非技术性工作。来自苏北的女工集中在烟叶车间，工作繁重，工资低于包装车间，包装车间多是来自江南的女工。裴宜理在她研究上海劳工抗议的著作中指出：“该厂各个车间的工作环境大概没有比烟叶车间更难受的了。”

一位前工人追述道：“烟叶车间的生活就像童养媳的生活。只有拿摩温才可以谈笑。很少允许我们歇口气。为防止烟叶破损而保持室温高、湿度大。冬天，室外寒冷天气与室内高达80华氏度的高温引起许多工人的慢性支气管炎问题。这种情况由于灰尘而加剧，烟叶去梗切碎成小片时，空气中布满了尘埃。黄色蒸汽充斥于车间，使工人们的汗液都变成黄颜色。处理炽热潮湿的烟叶使为数不少的工人们衣服湿透，手上起泡。”

据报道，由于是临时受雇，许多来自苏北的男工“实际上经常受到凌辱，有时甚至遭到拳打脚踢”。在以来自宁波、无锡、常州的工人为主的面粉业里，来自苏北的工人主要干重活，扛沉重的面粉袋以便装运出去销售。在上海造船厂，

多种工种的技能要求要比纺织业和烟草业高得多，报酬也高得多，只有少数苏北人受雇当铆工。

上海的有轨电车工业也说明了江南出身和苏北出身的雇员之间的等级分野。上海所有三家有轨电车公司（法商有轨电车公司、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和华商电车公司）都由两大部门组成，一个是机务部，另一个是车务部，机务部雇用一小批熟练技师，车务部雇用大批驾驶员和售票员。机务部的多数技师来自宁波和上海，而车务部的非熟练雇员主要来自苏北；有些人来自湖北、河北和山东。20世纪20年代末，大批人受惠于徐德金（音），他是一个“江北佬、高利贷者”。不足为奇，江南技师挣得比苏北驾驶员和售票员多。而且，电车售票员是被人鄙视的一族。

就连娼妓界，也分江南和苏北，观察者对此一目了然。最高等妓女（长三）来自江南，住在奢侈华丽的妓院里，要求能歌善舞，只迎合富商和官吏。次等的妓女（么二）大多来自扬州，她们不善歌舞，主要提供性服务。来自苏北的妇女（通常为少女）中，许多人从她们的农村老家被绑架而来。她们组成压倒多数的“野鸡”，在上海红灯区招摇过市，招徕顾客。有些苏北妇女专门给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舢板船水手提供性服务，划着小船出去招徕她们的生意。

苏北人在非技术性、低工资职业中的人数优势可能模糊了苏北人在上海从业经历中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许多人根本从未进入正式的劳工市场，或者说，长时期在这个市场之外干活。大批苏北移民靠沿街叫卖小吃、收集废纸卖钱、碾米、卖煤球，或为别人洗衣服来弥补生计。扫垃圾工周国珍花了好几年时间靠叫卖蔬菜度日，在这之后才在市环卫部门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一个最终当了黄包车夫的人在1925年初次来到上海时靠捡、卖垃圾为生；另一位做鞋修伞；一位妇女靠做煤球、卖菜卖鱼贴补家用。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模范程德旺追述说，他于1944年从海安来到上海，同一伙黄包车夫一道住在南市，他们全是从苏北来的，都是只身来上海的。“那时我没法拉黄包车，因为我太矮小，大家都为我难过，

因为我没有父母，所以他们让我为他们洗衣洗菜，帮他们烧饭煮菜。”他最后身高长到可以拉黄包车了，但仍付不起租金，所以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趁别人轮替倒班间隙拉别人的黄包车。只是在这之后，程才得以借钱凑足数，同其他三人一起租了一辆黄包车，开始正规上班拉车。

苏北妇女除了已在缫丝厂和棉纺厂找到工作的以外，更可能的是在正式的劳工市场之外打工。一大批妇女靠“缝穷”拾几个现钱（分穷包），为商店店员、工厂工人、学徒和求职者“缝缝补补”，因为这些人的妻子仍在乡下。这些妇女挎着竹篮子在街头徘徊，篮子里放着剪刀、针线和干活时坐的小板凳。另一些妇女为上述顾客洗衣服。还有一些妇女挎着米簋和腌菜筐卖给苦力吃。尽管这些女小贩中有些是在上海做工的苏北人的妻子，但另一些人是农民，她们过江来只是为了在农闲时节打打工，之后仍回苏北老家。

苏北人的孩子也有可能在正式的劳工市场之外打工。从七八岁开始，除非能在棉纺厂或缫丝厂当童工，否则苏北人家的孩子靠沿街叫卖瓜果蔬菜、棒冰等以期贴补家用。

20世纪30年代初，约有2万人在上海行乞为生。然而，想当乞丐就必须加入由一位长者统治的同乡帮会。然后乞丐被要求将他们每天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给这位长者，反过来，长者照料他们，负责被看管人的福利，例如，在他们生病时帮助他们。行乞在上海殊非易事，因为大约25个区的做法各异。例如，有些乞丐用粉笔在地面上书写一句话昭示其可怜境况，而另一些人帮黄包车夫推车过高斜坡桥，然后求车夫给几个辛苦钱。苏北人以专门“耍青龙”闻名——手抓一条大青蛇，过往行人若不肯给钱就用蛇耍他们。

在正式的劳工市场边缘打工的是另一个苏北人集团，虽然人数少一些，这些人靠加入地下犯罪团伙谋生。一些人参与图财营生，从苏北招徕姑娘卖给么二或野鸡窑子。例如，一个来自扬州的女人，人称洪老五，其父在小东门外经营野鸡营生。其父死后，她从事“开票子”营生，也就是贩运少女。流氓阿飞到苏北去

绑架少女，把她们带到洪老五那里，洪老五再把她们卖到窑子里去。随着对妓女的需求增加，洪老五亲自跑苏北去绑架少女。对某些女人来说，加入地下犯罪团伙有升迁机会。例如，沈扣珠从泰兴到上海，先当用人后做妓女。同青帮头子冯子宝同居后，她搭上关系，得以成为从苏北绑架儿童的人贩子，最终成为赫赫有名的女流氓。她把少女卖到窑子里，把男孩卖给包工头。洪老五和沈扣珠同属青帮“十姐妹”。同大多数女拐子一样，这两个青帮女头子都是来自苏北的青帮头子顾竹轩的拜师效忠的门徒（见下文）。

换句话说，许多来自苏北的人长时期在正式劳工市场以外或在其边缘谋生，有些人从未谋得正规工作。对他们来说，正规工作如当黄包车夫、拉粪车工、扫垃圾工是一种进步。苏北人在上海劳工市场的地位也许最好用次无产者来形容。以他们为主的职业从拉黄包车到扫垃圾和卖菜，其地位均低于在工厂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他们靠补衣服洗衣服谋生时，苏北人为工业无产者提供了服务，其模式类似于现今美国西南部边界城市工厂里的奇卡诺女工人雇用墨西哥妇女当女仆。而且，如前所述，即使苏北人得以找到工厂工作也一般是低工资、卖力气的活计，而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人是不愿意干这些活的。如果说经济地位有助于解释对苏北人的偏见，那么，必须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苏北人集中在劳工市场的非技术行业？我们有必要理解为什么他们在低收入的劳工队伍里成为主力。

籍贯等级结构的根源

要解释苏北人何以集中在上海劳工市场的非技术行业，必先探究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到上海找工作的。一如第三章所述，大多数移民是饱受自然灾害或战乱之苦的贫穷不堪的难民，对他们来说，上海城市里的任何工作较之他们已经逃离的生活都是一种改善。按照江南或上海的标准，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看来也许是不能容忍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离开盐城到无锡码头打工的人解释说：“在无锡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在苏北的生活。我自己认为，在苏北的生活艰难困苦。我们吃萝卜和红薯。实际上红薯在苏北被当作真正的好口粮。但我来到江南就吃大米。大米是体现江南的最好东西之一！”当问他是不是必须做苦力时，在无锡生活的那种惬意感就减轻了。他强调说：“当然，无锡还是好一些——我在那里吃大米！”即使他移居上海，干拉粪车工，住在一个棚户区内，却还是肯定比他在苏北的生活好多了。“至少我们能在棚户区内挣几个钱，”他解释道，“在乡下，我们一分钱也挣不到。”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整个江南地区，不论是季节性还是永久性地移居南方，苏北难民都接受了一种比江南人低得多的生活水准，从而也接受了比江南人差得远的劳动条件。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苏北人何以集中在上海劳工市场的非技术行业。常识告诉我们，他们是要逃离贫困，逆来顺受做别人不愿做的活计，颇似19世纪初逃荒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而且，苏北人移居江南的经历表明，说他们乐于干最低等活计的这种成见也许早在上海近代发展之前就有了；移居上海的江南人最有可能带着某种印象而来，即认为苏北人就是苦力仆役，因为这是他们在乡下所见到的现象。

不过，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解释苏北人何以集中在上海劳工市场的非技术行业或他们何以成为此种行业的主力。苏北并非移居上海的穷苦不堪的农民的唯一来源地。来自江南的无锡、常州、宁波、绍兴等地区的人又怎样呢？尽管这些

地区相对繁荣些，它们也是许多贫苦农民来到上海求职觅饭碗的发源地。但他们找到了不同于苏北穷苦农民的工作。1932年的一份关于来自无锡乡镇的400名移民的调查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一到上海，就在纺织厂、机械制造厂、面条店、食品店工作。为什么我们在上海非技术苦力劳工队伍中找不到有这些江南移民的证据呢？

试图解释美国历史上不同移民集团经历的学者们建议将移民本可在母国找到的工作类型同他们在美国的就业格局联系起来。例如，一份有关19世纪费城德国移民和爱尔兰移民的研究表明，来自不发达的农村经济的爱尔兰人来到美国时并没有带来工业经验，因此被集中在劳工市场的非技术行业。相反，德国人来自工业化国家，能利用他们往日练就的技能在费城找到较好的工作。

至少有一位学者揭示了农村手工业与上海不同原籍人所从事的工作类型之间的类似联系。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江南以其手工艺品驰名，苏北则以不产手工艺品著称。来自以产锡闻名的无锡的人主导了上海的锡加工品工作，这不足为奇。同样亦不必惊讶，来自以手工织布闻名的无锡、常州地区的妇女在上海纺织厂的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同样地，对许多观察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扬州人何以成为澡堂工人的主力，因为他们来自以澡堂出名的地区。

不过，仔细研究一下，这种解释是成问题的。第一，苏北并非完全没有手工艺品，尽管其发展不如江南先进。例如，苏北的泰兴、泰县地区手工织布很出名。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纺织厂的织布车间里找不到更多的来自这些地区的女工？第二，一个地区的手工艺传统与从该地区移来的农民带到上海的具体技能之间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在受雇于上海纺织厂织布车间的无锡妇女中，没有什么人在离开乡下之前亲身从事过手工织布。尽管扬州作为消费中心的历史似乎可以解释受雇于上海理发店和澡堂的扬州人所占的人数优势，但是，没有什么人来上海之前曾经当过理发师或澡堂服务生。相反，他们多数是农民。

要解释原籍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必须考量上海劳工市场是怎样运作的：如何招聘劳工和个人如何谋职业。以往的研究已经用很多材料证实了私交和同乡关系对求职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上海最新式的企业里亦是如此。管理部门的人往往雇用亲戚、朋友或同乡人。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同来自江南的人的关系相比，苏北人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利用。

对上海企业界——包括从工厂到银行的企业所有者、董事和经理们——的原籍的研究表明，苏北人在求职时可利用的私交或同乡关系有限。20世纪40年代公布的列入商业董事名单的2080名来自江苏、浙江的人（占总数的90%）中，只有175名来自苏北（占8%）。这些苏北人中，多数来自最南部的南通、海门和如皋地区，只有88人（占总数4%）来自扬州北部至阜宁地区。对列入董事名单的来自苏北的人所作的进一步检视表明，大多数人涉及黄包车公司、理发店、澡堂和建筑业；只有少数人染指工业和银行业。典型的精英人物如徐宝琨、王炳炎、于连金、葛金标、邱金声，他们全是阜宁人和盐城人，在上海经营黄包车业；关子和、赵德高、居永山，他们是扬州人，在上海经营理发店；康庆财、金春华、朱国勋，他们是江都人，在上海拥有澡堂。因此，苏北移民集中在这些行业里，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上海实业界精英的这种布局可以解释为什么来自无锡的农民，虽然至少当时可能会像苏北农民那样穷苦不堪，但最终不会身陷上海劳工市场中的非技术行业。他们在别的方面有关系。正如一位来自余姚的工厂女工所说，“我们这些浙江人有时能在银行里找到工作，因为有许多来自浙江的银行家。但如果你来自苏北，你就可能得不到银行的工作！”这也许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来自江南地区的贫苦农民不会成为偏见的对象：他们来自同上海精英有联系的地区。

人们只能猜测为什么来自苏北的商人未能加入上海实业界精英的行列。很可能，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本像江南商人那样广泛地上海投资，只能利用他们拥有的少量资本投资于黄包车公司或澡堂一类的行业，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大量资本。然而，人们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扬州的富裕盐商不利用他们的资金在开发上海所

带来的利润中分得一杯羹？也许，诚如历史学家何炳棣所说，挥霍浪费使他们没有什么资本用于可能的投资。虽然如此，这些商人在19世纪的汉口经济中还是成功地割取了一块势力范围。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部分来自江南的人由于太平军占领所迫先到上海，确立了对有利可图行业的控制。如果说在上海的早期发展中存在财富上的竞争，那么就是广州人和宁波人之间的竞争。苏北人似乎没有进场相争。

政治可能促进了广州人和江南人的经济统治。“回避规则”使苏北人没有资格供职于上海道台府。来自广州和江南的浙江地区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江苏本地人——乃得以而且确实占据了政治职位。实际上，他们竭力控制道台府，因为政治权力可被用来贯彻有利于其同乡商人的经济政策。例如，1851年被任命为道台的吴健彰因其亲广州人政策而臭名昭著，他“既不装腔作势隐匿其地区偏见，也不（试图）将政治与商业利益分开。”后继的道台来自宁波，其行为也类似。然而，这是权力的王国，苏北人进不去，这也许加重了他们本已不利的地位。

上海的经济界精英明显是按照籍贯来划分的，江南人的地位大大优越于苏北人。后来的移民集中在和他们有关系的地区；苏北人做的工作正好就是他们可称同乡关系的人所拥有和管理的行业。

除了个人以同乡联系为基础的关系以外，还有两类机构在确保人们求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青帮和同乡会。自20世纪初以来，青帮领袖们已在上海割据了势力范围，青帮所属的小集团往往控制整个行业。同青帮领袖们的关系往往与同乡关系相互交叉，于是在求职方面有了分量。目前有关青帮的不完整资料表明，在青帮里，苏北移民的资源没有江南移民那样充裕。尽管事实上苏北本身常被说成是青帮活动的一个中心，但上海青帮三大领袖没有一个来自苏北。杜月笙是浦东人，浦东是上海的一部分；黄金荣来自苏州；张啸林来自杭州。即使是在青帮的女强人行列中，来自苏北的也只占少数。青帮“十姐妹”中只有两人来自苏北；其余都是宁波人、常熟人、苏州人和上海人。青帮内部有一个所谓的江北帮，为

首者是顾竹轩、金九林。他们从不像青帮三大领袖那样有势力，这三大领袖在上海几乎每一个行业里都有“门生”。如前所述，顾竹轩被上海的苏北人称为“苏北皇帝”；他被形容为“一座人体大山”，由他制定法律，由对他唯命是从的枪手强制执行。他是黄包车业界的强人，数千名黄包车夫宣誓奉他为师父。换句话说，江南移民有一个同乡人之网，这些同乡人在帮里的地位使他们得以找到范围广泛的工作岗位。虽然，苏北人可以利用的青帮关系只能提供有限的机会，但实际上有助于苏北人流向拉黄包车一类的岗位。因此，地下犯罪团伙往往是移民次等阶层（例如美国的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的一个自然通道。但对上海的苏北移民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除了青帮以外，江南移民还可依靠同乡会提供的影响和服务。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宁波帮会积极帮助来自宁波的非精英人士在上海找工作。在上海发展的早期阶段，帮会从宁波招引工人和学徒供上海外资船厂雇用。以往学者认为，上海没有苏北同乡会。诚果如是，苏北移民显然缺乏为江南地区的人谋利益的那种资源。然而，初步研究表明，好几个苏北居住区有同乡会。1910—1919年间，上海有了旅沪扬州人同乡会，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上海大多数苏北居住区都有了同乡会。不幸的是，这些同乡会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许多苏北同乡会似乎是在1931年洪水泛滥时建立的，这场洪水洗劫了苏北大片的土地。苏北同乡会筹款帮助难民重新安家。除了救济工作以外，我采访过的苏北移民没有哪一位能回想起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曾经同自己区里的同乡会有过任何接触。他们认为这些同乡会组织主要是迎合有钱人的。这表明，苏北同乡会并没有像更大更有声望的江南帮会那样成为一个准雇佣机构。

于是乎，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苏北人何以集中在上海劳工市场的非技术行业。这些苏北人往往是来自穷苦不堪地区的移民或难民，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上海最差的工作也比在苏北生活强。大多数人来到上海时没有一技之长，这使他们难以找到需要技能的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以同乡纽带为基础的

私交和组织关系，而若有这类关系就会使他们有机会找到这些技能活，使他们脱离非技术行业，就像江南移民能做的那样。

关于以苏北人为主的工作，依然还有一个问题存在。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许多苏北人，尤其是妇女，在工厂打工，好几个行业倚重苏北工人。然而，在厂里干活是苏北人在上海的职业等级结构中所上升到的较高等级；而且，他们似乎从未成为工厂工人的多数。我们如何解释苏北人从未成为上海工业无产者队伍的主力这一事实呢？大多数工厂主和经理们都来自江南，这个事实只是答案的一部分。鉴于廉价的劳动力，人们本可以认为苏北人已捷足先登当上工人。这种料想何以未成现实呢？人力的供应来源当无可争议，特别是在1911年、1921年、1931年的大水之后，大量的苏北人来到上海，其中许多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苏北人之所以未成为工厂工作主力的问题，需要考察某些因素，这些因素一向被用来解释19世纪中晚期加利福尼亚的工厂里中国工人稀少的原因，也用来解释美国东北部工厂里起初没有爱尔兰移民，以及整个美国的工厂里长时期没有黑人工人的原因。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工厂主都选择不吸纳最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历来提出的最重要解释是工厂经理们和工人们流行的偏见。

如果说对苏北工人的流行态度和信念是一种象征，那么，他们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合心意的工人。如上所述，苏北人通常被认为穷和没有文化。

尽管难以确定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雇佣决定，但这类观点最有可能造成来自江南的工厂经理们对苏北工人的偏见。他们宁愿出高一点价雇用他们熟悉的工人。一位棉纺厂工程师追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雇人的做法，明确地讲到这一点。他说：“在棉纺方面，我们竭力使用尽可能多的同乡人。很难说这是为什么。不好说苏北人就是不好的工人。只不过是有一定的社会态度。与同乡人比较谈得来。”试图在棉纺厂里打工的苏北妇女往往要有能掩盖其原籍的穿着，使她们得以像江南人一样通得过。棉纺业是少数几个雇用大批苏北人的行业，但这

种情况最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约有半数的棉纺厂是日本资本家所有的，他们对苏北人没有同样的偏见。

工厂主和经理们对苏北人的偏见可能是普通工人共有的。尽管这种偏见未必对雇人决定起重大作用（经朋友和熟人介绍谋求新职除外），但成群结伙的工人们使其他人难以保住饭碗，特别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新来者威胁到他们饭碗安全时。由于苏北人在江南人之后加入工厂劳动大军，江南人可能积极抵制招聘这些北方人。例如，在江南造船厂里，广州人和江南工人使苏北人难以成为技术工种的学徒。1920年一家棉纺厂发生的事件表明了类似的现象。一个来自苏北如皋地区的人好不容易在上海一家棉纺厂里谋得一份工，当机修工学徒。其他工人怒其干活太卖力，担心其最终夺了他们的饭碗，于是在身体上言语上折磨他，直到他终于辞工回到乡下。此类事件表明，工人中的地方性、偏见和族群冲突致使苏北人不能成为工业无产者队伍的主力。这很像19世纪美国城市中本地工匠强烈抗议使用移民工时所做的那样。此类事件表明，对稀缺经济资源（就这个个案而言，就是工厂的岗位）的竞争可能促使把苏北人界定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族群，其界定方式类似于马克·格兰诺维特和查尔斯·蒂利所说的那种方式。两位作者评估了以下说法：在黑人或其他种族集团对居支配地位的白人居民构成经济威胁时，美国国内的种族敌对就最激烈，他们推测道：

如果这个麻烦集团在种族上是绝对同一的，只是原籍地不同……这些差异就会被放大到足以使他们成为准族群，成为敌对的聚焦点。例如，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量涌入的不是黑人而是南方白人，他们在种族背景上与北方白人新教徒十分相似，那么，北方人几乎肯定会建构这些幼稚可笑的类别，或者利用现有的类别名称——“破落户”，或者“白垃圾”——来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经济地位。类似的建构“族群”敌意，可小规模地见诸芝加哥对白人“乡巴佬”或洛杉矶对“俄克佬”的敌意。

正是这种“族群”敌意在上海被建构起来：江南工人为保护他们的地位，可能大大地促进了或者至少是强化了那种认为他们自己与苏北人之间存在明显区别的信念。

因此，歧视加上其他因素可以解释苏北人进入上海劳工市场非技术行业的轨迹。我们已经看到，苏北人最初来到上海是因为他们老家农村贫穷和自然灾害，因此干最卑微的工作以贴补生计。因为同乡关系对在上海求职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因此后来的苏北移民浪潮便顺着这条道去干同样的工作，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关系。最后，随着上海工业化和更加复杂以及千差万别的劳工市场的发展，苏北人所从事的工作，地位更显低微。正如对黄包车夫的态度所示，苏北人与非技术力气活之间的联系被建构起来。

若想说偏见与苏北人在劳工市场中的地位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关系，说先有偏见而后才有低下的经济地位，那将是有误导性的。对苏北人的流行信念很可能阻止他们进入更好的劳工市场，但劳工市场内部的划分本身也促进了这些信念的建构。对苏北和苏北人的成见部分是上海劳工市场细化发展的产物，它有助于证明不同人群获得机会的不平等。尽管苏北人都是汉族身份，但把他们界定为具有族群特性，给江南人提供了关于这些来自北方的移民为什么适合干艰苦活的一种解释。劳工市场既要求建构苏北族群，又受这种建构的影响。

第五章 苏北人的自我认同 有争议的族群

苏北人自己是否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内聚力的同质同身份的集团？诸如南通、扬州、盐城等地来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认为他们在上海有着共同原籍地、传统、文化和经历，从而可以用苏北人这个称号来表述？苏北人是否想到过他们是苏北人，抑或苏北人这个称谓只不过是他人用来描述他们的一种社会类别？简言之，他们是否感知到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族群？

既然苏北作为一个地方和苏北人作为一个类别的概念只是伴随着江南和上海的发展才出现的，那么，任何有关苏北族群的身份认同，只有通过移居和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大多数苏北人来到上海之前很可能从未听说过苏北这个术语。进一步说，他们到上海时似乎并没有认同为苏北人，而是认为自己是他们出来的那个地方的人，颇似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自己是热那亚人、威尼斯人、那不勒斯人、西西里人、卡拉布里亚人，而并不认同为意大利人。研究赴美移民的埃里克·沃尔夫指出：“族群很少同新劳工最初自定的身份相吻合，这些新来者最初认为自己是汉诺威人或巴伐利亚人，而不认为是德国人；认为自己是他们村庄或教区的人，而不认为是波兰人，是通加人或尧人，而不是马拉维人。”因此，苏北人最初也认为自己不是苏北人，而是扬州人、盐城人或南通人。他们的身份意识是否因时而异了呢？

乍看起来，移居上海的苏北移民似乎逐渐地接受了如下信念：他们形成了一个有内聚力的集团，20世纪10年代后期，地方身份逐渐让位于愈来愈强烈的苏北身份意识。如果我们用他们形成的组织，特别是同乡会作为他们自定身份的标志，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幅图景。

同乡会

如前所述，苏北同乡会绝没有来自江南各地的移民组织起来的同乡会——尤其是声势显赫的宁波同乡会那样强大，不过大多数苏北居住区都有同乡会。最引人注目目的是代表苏北这个整体的同乡会数目。20世纪20年代初就有了江北同乡维持会和苏北联善会；1936年，江北各县旅沪同乡会联合办事处成立。20世纪40年代晚期，上海的苏北大区组织的数目增了几倍。其中有：江北旅沪同乡服务社、苏北各署旅沪同乡救济委员会、苏北难民收容所、苏北养老院、苏北义务小学校。除了这些组织的存在这个纯粹的事实以外，人们对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其成员或其寿命，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些组织的成立表明，苏北身份正在取代或补充小地方色彩的扬州身份或盐城身份。例如，江北旅沪同乡服务社的章程宣布该社的目标是帮助苏北同乡赢得他们对上海发展的贡献所应得的尊重。

然而，对同乡会的考察使人对它们的存在本来似乎可以代表的苏北身份产生了怀疑。第一，这些组织并不总是苏北人建立的。例如，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于1946年，它是由浦东人杜月笙、几个浙江人和安徽人以及来自苏北的有势力人物如青帮头目顾竹轩发起和指导的。同样地，1947年8月一次严重洪水泛滥毁了徐州和海州大片地区，在此之后成立的苏北洪灾救济协会是“上海市民”组织的。因此，有些组织挂名苏北是代表非苏北人关心这个贫民群体苦难的一种仁慈情怀。尽管有些组织的花名册显示，这些组织的创始人和会员全是苏北出身，但上述例子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挂有苏北其名的组织天生代表苏北人的努力或身份。

第二，大多数涵盖全苏北的组织似乎是短命的。例如，1925年以后，江北同乡维持会就不被提到了，这表明它也许已经解散。同样，起初成立江北各县旅沪同乡会是为了回应1936年黄包车夫大罢工（黄包车夫大多来自苏北），似乎罢工一结束就解散了。

除了这些组织短命这一事实以外，它们的成立所代表的联结基础似乎是脆弱的。1936年江北各县旅沪同乡会联合办事处的第一次会议主席的评论就表明了这一点。他抱怨说：“各县的团体毫无团结精神，苏北各县的移民与日俱增，但是不可能把他们统一起来。”东台人、江北旅沪同乡服务社的创始人朱华（音）哀叹苏北人的孤立：“（上海）多数人是江北来的乡下人，（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联系很少。这是一个遗憾。”因此，毫不足怪，许多此类组织和同乡会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如救灾或罢工而成立的，问题一解决就解散了。

这些组织所体现的全苏北身份的最后一个特质是，这些组织由于一些代表上海具体苏北县份人的同乡会的存在——即使还不足够多——而相形见绌。例如，至少从20世纪头10年起，扬州移民有了自己的同乡会即扬州行会，后来又有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自独树一帜的东台、兴化、淮阴、海门旅沪同乡会也相继成立。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阜宁、盐城、淮安、南通、宝应、启东、泰兴、泰县、高邮和如皋等同乡会也加入这一行列。苏北几乎每一个县都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同乡会。

不仅多数同乡会是以地方为基础的，他们关心的问题也往往因地制宜。只有极少的同乡会关注苏北另一个县份移民的有关问题。也许最富戏剧性的例证是1934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它吸引并激怒了上海的扬州人社群，这就是易君左《闲话扬州》一书的出版，该书主要述说扬州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在某种程度上说，易君左的书读起来像是宣传扬州及其著名文化的广告，它赞扬扬州人精明老练，胜于其粗俗的苏北兄弟。尽管有这些赞美的话，扬州籍人却觉得该书中伤了他们。

该书一问世，上海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筹划抗议。同乡会领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该书是“对所有扬州人的侮辱”。他们要求易君左辞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职务，后来又状告他。同时，他们要求书店拒售（最后是焚毁）该书。

他们努力的结果不清楚。然而，这件事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这是上海的一桩严格限定于扬州的事件。扬州社群受到冒犯，扬州社群作出回应。意在纠正该书之侮的种种尝试全是上海的扬州同乡会组织的。其他苏北同乡会都没有前来驰援或卫护。反过来，扬州同乡会也不卷入与苏北其他县份人有关的问题。因此，譬如来自阜宁的棉纺工人顾正红在1925年被日本商人枪杀时，扬州同乡会没有参加江淮旅沪同乡会发起的追悼会。这就突出了以县为基础的同乡会所体现的地方身份。

若不提及江淮旅沪同乡会，则任何有关苏北同乡会的讨论都将是不全面的。在所有的同乡会中——无论是全苏北的，抑或是以县份为基础的——江淮旅沪同乡会是上海最持久、最强盛的一个苏北同乡会。该同乡会成立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直存在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时它在上海苏北人居住的大多数区里设有分会办事处，还开办了一所学校。该同乡会体现了一种超越具体地方的认同：据其1947年章程，它包括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盐城和阜宁等居住区，其成员多数来自这些地区。不过，该同乡会并不为所有苏北同乡服务，苏北南部地区如扬州、泰兴或南通等地的移民同乡会与江淮旅沪同乡会没有交往。换句话说，尽管江淮旅沪同乡会可能体现了江淮移民经历的共同性这一信念，但它也表明了苏北南北两地移民之间深刻的差别感。

代表苏北几个居民区的其他同乡会证实了这种分隔，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同乡会不是代表苏北南部地区的便是代表苏北北部地区的同乡会。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旅沪同乡会为苏北最南部的移民服务，而盐（城）—阜（宁）旅沪同乡会代表苏北北部地区的移民。

因此，若干全苏北同乡会的存在不能直接等同于江苏北部移民中出现了苏北的认同。如果同乡会就是认同的标志，那么，它们显示了地方主义的持久性，也许表明了苏北特定地区如江淮地区移民中日益增长的共同性意识。上海精英集

团持有的信念认为，苏北人是一个有着苏北人自己共享共同传统和经历的有内聚力的集团，这种说法看来不切实际。若联系到移居上海的苏北移民的信念和经历这一点就极其明显了。

自我认同

我们无法知道苏北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的身份，个人的自我认同怎样因时而异，或者说，19世纪70年代一个苏北县份的移民的自我认同怎样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同一县份的移民的自我认同。同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移居的人士进行访谈所提供的证据及有关他们文化习俗、工作和居住格局的资料尽管零碎，但还是勾勒出他们持久不化的地方主义和苏北南北两地的裂痕，一如上述。

苏北移民对属地的认同，首先反映在对待彼此的态度上，因为来自苏北不同县份的移民往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他们自己区分开。例如，上海扬州餐馆的一位厨师坚持说：“我们的习惯完全不同于盐城人的习惯。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吃的也不同。盐城人吃薯类，而我们吃大米。我们不认为盐城人是我们的同乡。”苏北一个县的移民并不认为另一个县的移民是同乡人，这一点得到夏克云的证实，他本人是淮安人，他承认，“如果有人从淮安来到上海，我们会帮助他，但如果他来自扬州，我们就会不理他”。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享有共同的苏北身份。

苏北不同原籍的人所表明的分离感往往延伸至对立态度。更为经常的是苏北比较繁荣的南部地区来的人对他们的北邻表示轻蔑。例如，扬州人经常对盐城人表示轻视的态度，恰恰同江南人通常对苏北人作为一个集团所表示的态度一模一样。他们的优越感有时走到极端，以致坚持扬州根本不是苏北的一部分。例如，在解释为什么澡堂老板只雇扬州人时，一位本身就是扬州来的修脚工说：

那是因为我们扬州人知道怎么好好说话；我们讲话相当文明。对于服务人员来说重要的是要好好说话，否则顾客就不会来。我们讲起话来谨慎温和，而他们盐城人很不礼貌，“哇哇”地说。我们更加文雅精致，江北人则很粗俗和贫穷。

虽然我们来自扬州，但人们仍然常叫我们“江北人”，这种行为是对我们的贬损，让我们感到难过。我们知晓自己来自扬州，并非真正的“江北人”，但别人并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区别。

19世纪晚期的改革家张謇表达了一种类似愿望，即把一个人的原籍排除在苏北定义之外，从而否认其苏北身份。他本人是南通人，他宣称，苏北只包括紧贴淮河以南的地区，如盐城、阜宁、淮安。言外之意，扬州或更往南的海门或南通地区都不是苏北的一部分。就他而言，这两个地区的人不享有共同的苏北身份。

苏北移民的属地身份不仅仅是心态上的，而且也反映在他们各自的文化活动中。反映在地方戏上尤其明显，地方戏是苏北人最中意的娱乐形式之一。尽管苏北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特色的戏剧，但扬剧和淮剧是上海最经常演出的两个剧种（见第二章）。苏北这两个地区的人偏爱他们各自地区的戏剧演出。扬州理发师周殿元（音）追述道：“1949年以前，我们到太原坊去听扬剧，听众全是扬州人，特别是理发师。但我们从不去听淮剧！”另一方面，苏北码头工人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来自扬州，他们喜欢在他们街区茶馆里演出的淮剧，如浦东的开天茶馆或所谓的南市四十间。淮剧不仅从码头工人中而且从盐城、阜宁、淮安等苏北北部地区来的几乎所有移民中吸引听众。原黄包车夫章荣华回忆说：“（1949年）以前我们常常全都喜欢去听淮剧，我们喜欢筱文艳。还有扬剧，但我们喜欢看江淮戏。”居住格局是苏北人在上海主要是属地认同的又一个标志。尽管大多数上海人把所有苏北人同棚户区联系在一起，但苏北人自己却辨认出所谓苏北村内更为微妙的格局，因为不同地区的同乡人聚居在特定的里弄里。夏克云回忆道：“1949年以前，我们会说那是湖北弄堂，那是扬州弄堂，那是淮安弄堂。”码头工人程金范（音）认为，浦东杨家渡区主要是泰州人居住的；原黄包车夫章荣华回忆说，住在闸北中山北路界边的棚户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同他一样来自盐城；据一位来自扬州的鞋匠说，闸北沈家陀（音）区是扬州同乡的居住区。

户籍登记档案可使我们对原籍和在上海的居住格局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可惜找不到这种档案资料。不过，同乡会会员名单可以对上述关于苏北人的印象提供某些佐证。尽管多数下层苏北人并没有加入同乡会，但加入者的居住格局表明来自特定地方的人怎样在上海聚居在一起。例如，相当规模的江都人群体都住在胶州路68弄和82弄；盐城人和阜宁人都住在余姚路42弄、51弄、162弄以及平凉路793—795弄；大批淮安人住在长寿路68弄。若以为这些格局是绝对的，以为所有苏北移民都住在周围都是他们小同乡的里弄里或棚户区内，那将会被误导的。这些格局极有可能因阶层而异。苏北群体中的较富裕成员散居在上海各地，因为他们支付得起较为合意的住房费用。实际上，同乡会档案表明，各同乡会的理事全是相当富裕的人，他们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与江南人居住区毗邻而居（尽管他们有钱，但仍被视为苏北人）。压倒多数的苏北移民是穷人、工人阶级，他们依靠私交和同乡关系觅地安身，因而往往聚居在一起。要确定同乡聚居者与同苏北异乡杂居者的百分比是不可能的。不过，与江南人认为所有苏北人都聚居在所谓江北村的棚户区的看法相比，还是有相当数量各按特定同乡关系分隔而居者。这种居住上的分隔既反映又强化了上海苏北人的属地认同。

居住格局表明，他们在上海的某些方面的经历使苏北移民中的区别和分隔变得持久，妨碍了更大范围的苏北认同的形成。这在就业格局上更加显而易见，就业格局表明，不存在共同的苏北人工作经历。相反，就业格局往往强化了并且再生了苏北移民的属地认同。

尽管非苏北人把苏北人同苦力活联系在一起，但苏北人自己却意识到分工要复杂得多，每一个苏北人居住区里的移民都集中于特定类型的活计。最重要的分工是来自扬州的人与来自更往北地区即盐城、阜宁、淮安等地的人之间的分工。一般说来，在技能要求上，扬州人干的活要比那些以更北地区的人为主力的活稍高一些，提供的工作条件也比后者好一些，这也许反映了扬州比盐城、阜宁和淮安更繁荣。他们尤其以在所谓“三把刀”职业里独领风骚而闻名：理发师、澡堂修脚工和厨师。扬州是有名的理发师输出地，特别是输往上海，1920年理发师行会的首领陈四海（音）是扬州人。相比之下，盐城人和阜宁人可以以独揽拉黄包车职业自诩。1934—1935年的一份有关黄包车夫籍贯的调查表明，大约53%的人来自盐城和阜宁，只有17%的人来自扬州附近地区。

以扬州人和盐—阜人为主力的职业所构成的等级结构由于来自各自地区的人的自豪和愤懑而得到巩固。来自盐城的人知道他们无法企求进入扬州帮控制的职业领域。一位建湖（隶属盐城）人激动地说：“扬州人干的活比我们干的活好得多。他们的工作轻松轻巧些。当理发师比拉黄包车好多了！最差的工作是拉大粪车、收集垃圾和扫马路。没有多少扬州人干这类活。他们多半在理发店和澡堂里。”

比这类分工的精确性或持久性更为重要的是，苏北人意识到这些分工的存在，因为我采访过的几乎所有苏北人都能指认不同职业的工人的籍贯。例如，前码头工人夏克云解释道：“扬州人做服务工；盐城人拉黄包车，南通人拉大车和老虎车。泰州人喜欢卖东西，所以他们卖花生和小吃给我们淮安来的码头工人。”另一位来自扬州的苏北人这样描述分工：“修锅匠来自高邮县；小皮匠和环卫工人来自江都县；理发师、修脚工和厨师来自扬州城。”这些说法或确切或不很确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由于没有有关这些职业的工人的调查报告，只能倚重人们的回忆和信念。而且，这些信念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些信念提示了一种方法，即在不同的苏北区域中人们是如何在差别与界线日益永久化中去体验工作的。

这些差别，同居住格局一样并不是绝对的，可以肯定，许多苏北人干的职业雇用了好几个苏北人居住区的人。例如，棉纺厂和缫丝厂雇用了苏北几乎每个地方的妇女。尽管这不总是促进苏北身份的扩大，但有时会把几个居住区的人聚集在一起。20世纪20年代初，一份有关缫丝厂罢工的报告，既强调了属地认同，又说明了这种认同至少暂时被克服的一个实例。该报告的作者说：“在过去，人们常说盐城和泰兴是‘小脚’和‘大脚’（指缠脚或不缠脚）。但在这次罢工中，两大帮却能够合作。属于盐城帮的女工前往同乡泰兴帮女工处请求支援罢工。”很明显，在平常情况下，两个居住区的妇女并不融洽相处，她们自己更不会认为有着共同的苏北身份。盐城籍女工和泰兴籍女工之间通常互不相干，泰兴帮女工特别办事处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在罢工一类的紧急关头才打破隔阂。

码头工人也来自许多不同的苏北人居住区：泰兴、南通，以及盐城、阜宁和淮安。虽然每个区的工人们总是做某一特定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互动，他们的劳动号子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来自苏北各地区的工人们都带来了他们家乡的号子歌。南通号子、扬州号子、淮安号子彼此全然不同。另一方面，上海码头的工人们采纳了他们本区以外地区的号子，使之哼唱起来最适合于他们所干的活。例如，扛大包的工人唱南通号子，因为南通号子有强烈的节拍，而一肩挑两人抬的搬运工则喜欢扬州号子的韵律。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什么人来自扬州。不过，这种习俗上的融合也有局限性。例如，尽管同来自湖北的工人有所接触，但苏北人不愿意采纳湖北号子。夏克云模仿了一个号子后解释说：“湖北号子听起来像小孩子在对我唱歌。”在号子上的不合反映了苏北移民对来自湖北的工人弟兄更为广义的鄙视。1926年，苏北工人与湖北工人为卸货问题发生了一场争吵，导致两名湖北人溺水身亡。

虽然在一起干活促使苏北人去适应他们本区以外的苏北其他地区工人的号子，但对于哪种号子来自哪个地区，却始终耳熟能详。因此，这不等于码头工人中形成了更大范围的苏北认同。

在来自不同原籍的苏北移民中似乎有继续坚持他们之间区别的倾向，这往往是阶层差别的反映。换句话说，把阶层与原籍身份区分开的界线往往很模糊，因为就江南精英对苏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态度而言，籍贯往往是作为阶层的一个隐喻在运作的。许多上海的苏北人所维系的属地认同的阶层性反映了上述许多态度和做法背后的主题：苏北南部地区的人蔑视往北地区的人。最为常见的是，来自南部的南通、海门、扬州等地的人希望自己同更北部的盐城、阜宁和淮安等地的人脱离关系。

因为苏北南部往往比北部各地繁荣些，因此常常成为较北地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对于20世纪30年代在扬州长大的人来说，盐城、淮安难民以捡垃圾为生的景象是熟悉的，我们已经看到，苏北南部的移民在上海能找到好于他们的北部同胞的工作。来自这两个地区的同乡会成员的形象进一步证实了上海这两个移民群体之间的经济差别。我们首先可以审视一下北部的淮安和南部的南通同乡会成员的受教育经历。

表1 淮安和南通旅沪同乡会受教育程度 单位：人

受教育程度	淮安	南通	
大学	3 (0.9%)	10 (3.3%)	
法律专科	1 (0.3%)	7 (2.3%)	
技术学校	2 (0.6%)	18 (5.9%)	
师范学校	2 (0.6%)	5 (1.7%)	
高中	2 (0.6%)	65 (21.5%)	
中学	12 (3.8%)	68 (22.4%)	
初中	16 (5.0%)	109 (36.0%)	
高小	8 (2.5%)	0	88
小学	17 (5.3%)	0	
私塾	91 (28.4%)	18 (5.9%)	
识字	21 (6.6%)	0	
基本不识字	27 (8.4%)	0	
文盲	53 (16.6%)	3 (1.0%)	
未列教育经历	65	0	
总计	320	303	

最引人注目的差别是南通同乡会成员高学历多（总计为13.2%，相比而言，淮安同乡会成员为2.5%）；南通同乡会拥有中学学历的百分比大得多（南通同乡会为79.9%，淮安同乡会为9.4%）；淮安同乡会成员文盲或半文盲的数目大大超过南通同乡会的数目（淮安为25.0%，南通为1.0%）。

苏北南北两地区移民群体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别在职业格局上也很明显。20世纪40年代晚期北部地区淮安和南部地区扬州和海门的同乡会成员职业状况的数据如下：

表2 淮安、扬州、海门旅沪同乡会成员职业状况

单位：人

职业	淮安	扬州	海门
政府雇员	2 (0.6%)	4 (1.0%)	18 (8.4%)
律师	1 (0.3%)	20 (5.0%)	5 (2.3%)
教师	2 (0.6%)	2 (0.5%)	26 (12.2%)
会计	0	0	0
医生	1 (0.3%)	1 (0.3%)	21 (9.8%)
生意人	18 (5.1%)	355 (89.2%)	80 (37.4%)
记者	0	13 (3.3%)	0
工程师	0	0	2
工厂主管	9 (2.6%)	0	0
公司雇员	3 (0.9%)	0	0
店员	6 (1.7%)	0	0
工厂工人	93 (26.5%)	3 (0.8%)	8 (3.7%)
码头工人	18 (5.1%)	0	0

(续表)

职业	淮安	扬州	海门	
黄包车夫	8 (2.3%)	0	0	
环卫工人	4 (1.1%)	0	0	
服务业员工	6 (1.7%)	0	0	
仓库工人	31 (8.8%)	0	0	
放债	20 (5.7%)	0	0	89
工匠	1 (0.3%)	0	1 (0.5%)	
小贩	5 (1.4%)	0	0	
未列 / 不明	123	0	53	
总计	351	398	214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扬州同乡会和海门同乡会的成员就业于较能赚钱、声誉较好的职业者多于淮安同乡会成员。生意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扬州同乡会成员的98.2%，占海门同乡会成员的61.7%，而只占淮安同乡会成员的6%。淮安同乡会成员的42%是工人，而扬州同乡会成员只有0.8%受雇为工人，海门同乡会成员的3.7%受雇为工人。

这些同乡会成员资格未必反映出他们所代表地区的移民的侧面。大多数移民从未加入过同乡会，有些人的成员资格鲜为人知。尽管如此，作为苏北各种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大略指数，这些数据还是说明了苏北南部移民群体相对于苏北北部的移民群体而言，要兴旺些。因此，当来自南部地区的移民把他们同北部地区的人区别开来时（例如，那位修脚工坚持说像他那样来自扬州的人不是苏北人），他们并不是要表达原籍认同本身，而只是坚持阶层差别，即使是在立足于江南的精英看来是清一色穷人的苏北人之间也存在的阶层差别。

尽管苏北人在江南人眼里近似于一个族群，但对那些实际是从长江以北各市县移居而来的人来说，大苏北的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微弱的，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可以肯定，他们从未在某种形式的苏北权利运动中团结起来，抗议对他们的歧视待遇。他们也似乎不同意“精英”集团的那种信念，即认为苏北人在上海有着共同的传统或经历。对他们来说，同乡是指来自同一个特定市县的人（如扬州或盐城），而不是作为整体的苏北。因此，属地归属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中仍

然是最重要的。这就证实了人类学族群研究的结论，人类学的族群研究总是指出，外部人强加给一个集团的定义与集团内部人关于他们自身的定义之间是有差别的。例如，人类学家罗纳德·科恩在一份关于博尔努平原族群的经典研究中说，卡努里人的信念：东南部的非穆斯林人集团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族群，叫作基尔迪人，而基尔迪人认为自己属于许多特定族群中的一族，两者形成鲜明反差。科恩指出：“这个问题就愈加复杂化了。据认为在卡努里人占优势的城镇里，这种人往往接受占优势集团的说法并自认为他们是基尔迪人。只有更进一步质疑时才会引出他们的以故乡为基础的主观认同。”同样，尽管西柏林的所有客籍工人都被当地德国人称为土耳其人，但不是所有人都来自土耳其。就连来自土耳其的人也不认为他们自己有一种共同的土耳其人身份。正如露丝·曼德尔所指出，“来自土耳其西部的土耳其城里人往往认为他们同农村的穷同胞几乎没有亲缘关系。自认为‘西化了的’土耳其城里人对他们那些‘落后、烦人的’同胞感到无比羞耻和愤慨，他们说，这些人给所有土耳其人，甚至已经完全是现代型的土耳其人‘带来了’一个坏名声”。

不过，属地认同的持久性常见于族群研究和移民文化研究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理所当然的。不应当把苏北人看作是上海族群身份建构中的被动参与者。尽管属地认同现象突出，也不存在大苏北隶属现象，但苏北人的确建构了某些形式的身份。相信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江淮地区的信念——强大的江淮同乡会及淮剧的兴起和流行证实了这一点，它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别的形成。换言之，江南精英建构了苏北这一类别，而上海的苏北人却表达了江淮类别的声音。这两者并非同义。

不论是适应江淮身份，还是坚持属地原籍身份，苏北人在上海对阶层认同与原籍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有所回应。正如苏北身份的表述对于江南精英来说是有关阶层话语的一部分，苏北人所作的对盐城、扬州或南通各自身份的表述也是说明阶层差别的一种方式。

但是，属地身份的持久表述不仅仅是苏北人中有关阶层差别的表述。坚持属地原籍本身很有可能是抵制上海精英强加的充满否定性情感的苏北人类别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人希望承认、更不消说自己声明苏北身份。同美国西南部移居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坚持得克萨斯或密苏里原“籍”以避免俄克佬称号一样，苏北人表明属地身份，意在避开苏北这个丑化的称号。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坚持地方主义，而且是一种重新创造和精心策划的抵制行为。

第六章 偏见政治

从1842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整个时期里，只有一次，苏北人的地位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问题。那是在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这个从另一角度来看来不大的事件，由于日本1937年大规模进攻上海和1941至1945年间占领上海而更不起眼。但这个事件却是苏北族群建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前几章所探索的所有问题——苏北人在棚户区的聚居、在劳工市场中的地位以及在上海的身份建构——的汇合点。

在1932年春季的几个里，苏北人史无前例地成为被公开辩论的引人注目的对象。公众对以日本进攻为中心的事件的回应，既反映了那种认为苏北人是一个同族同质集团的信念，又强化了对苏北人的偏见，因为一些苏北人被认定勾结日本人。与此同时，苏北人在对把他们当作苏北类别问题上的抗争和抵制比以往更加明确和激烈。

“江北通敌者”

中国人称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的事件为“一·二八”事变，只有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在上海迅速扩张的背景，才能理解“一·二八”事变。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人在许多方面已成为该市居支配地位的外国居民。他们取代英国人成为公共租界里最大的外国人群体。日本人的数量从1890年只有区区800人，到1920年膨胀到1万人，1930年达到3万人，是当时英国居民的三倍。原是美国租界的虹口已成为几乎全是日本人的居住区，通常称为“小东京”。而且，日本的公司控制了大部分上海的经济。上海最大的产业棉纺业是日本资本控制的。日本人还拥有许多码头和银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发生了。为回应1931年日本夺占东三省，全中国组织起来抵制日货。中国厂商拒绝经营日货，中国的银行拒绝兑现日本的船货期票，码头当局拒绝允许日本货船卸货，这严重加剧了上海的中日官方之间的紧张关系。1932年初，日本海军发起了进攻。中国十九路军拒绝撤出闸北，即北火车站周围地区，日本便于1月28日“不宣而战”。欧内斯特·O. 霍塞指出，“机关枪日夜扫射”：

从街垒和窗帘后面，枪响人亡。恐怖笼罩闸北街头。……轰炸机咆哮着掠过头顶。……从300英尺的高空投下炸弹。炸弹击中处火光冲天。闸北人口稠密区大片大片被毁。巷战异常激烈……住房被焚毁或在弹火纷飞中倒塌。工厂被炸成碎片……难民川流不息地涌入租界。他们惊恐万状，急匆匆乱窜过桥，越过铁门。他们双手提着行李。有的人设法把他们可怜的“家小”扔进黄包车或手推车上。有的人用竹扁担挑着大包小包。妇女们用绳子把她们的哇哇尖叫的小宝宝系住，驮在背上……他们来了60万人。

到5月初，据魏斐德说，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整个中国管辖地区——他们的6万至7万名士兵占领了47幢公私建筑，所有还耸立着的市政和行政大楼，以及110

所中小学”。同时，尽管他们说的是另一套，但日本人还是建立了一个傀儡市政府，即“闸北地方市民维持会”，由宪兵队治理闸北区。

在1932年春季期间，日军进攻上海并策划僭取上海行政权力，一些苏北人因一大堆问题而受责难。第一，他们被当作日军进攻期间滋扰上海许多区域的犯罪活动的替罪羊。当地报纸几乎天天刊登文章，标题如“江北流氓抢掠闸北人民”。据一篇报道说，随着许多中国人撤离闸北，“人们看到一些江北人忙着在闸北各地撬门潜入撤离的民房盗窃”。在毗邻的江湾区，一些苏北人据说“极其活跃，强行进入民宅偷取贵重物品。他们拿走了所有珠宝，现在又在搬家什”。换句话说，也许早已存在的对苏北人的不良印象更加深了。

较之把苏北人同犯罪相联系更为严重的是认为他们中有人巴结日本人。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在（‘一·二八’事变）战后，一个新术语出现了：‘江北汉奸’”。所说的巴结表现为几种方式。第一，1932年4月日本人在上海闸北区建立的傀儡政府被说成是“江北司令部”。平常闲言碎语——虽不完全确切——但都认为傀儡政府的领导人里有苏北人。维持会干事汪度来自阜宁。他以前是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职员，据说会讲日语。警察首脑常玉清是来自苏北的著名帮会领袖，人称“江北杜月笙”。他以“常二吨”闻名，因为他体重超过300磅。常氏当过屠夫，后成为南京路上一家澡堂的老板。他是上海苏北居民行会的会长，这就巩固了他的苏北关系。他投靠傀儡政府以致报纸称他是“粗壮的前屠夫和亲日匪徒”。首席侦探姚五“有四名日本兵随身保护”，他以每天光顾鸦片馆和赌坊闻名，日本占领期间这两业在闸北十分兴旺。

除了在傀儡政府担任正式职务者外，一些苏北籍显赫之士也投靠傀儡政府。最著名的青帮头子、在上海苏北同乡会里亦十分活跃的顾竹轩，原籍苏北，虽未出任官职，但在傀儡政府的施政中势力很大。他的弟弟顾三（又名顾松茂），是明星人力车公司的一名工头，闸北的所谓江北戏院的老板，他也与傀儡政府有

染。有几份报告指控他是傀儡政府主要的金融骗子。还有一个韦钟秀，苏北人，公安局的首席侦探。

尽管有苏北人在傀儡政府里占据高级职位，但并非所有的傀儡政府成员都来自苏北。交通督察程希之是宁波人，警署首席督察李飞是天津人。还有，行政首脑胡立夫是安徽人。事实上，有些观察家似乎根本无法断定他是不是苏北人。法国警方的密探有时指认他是安徽人，有时又说他是江北人。在胡立夫问题上的混乱可能是由于苏北定义不一致，一如第二章所云。在许多上海居民看来，凡来自长江以北、说话像苏北方言者，都是苏北人。胡立夫说话带安徽口音，因此也许可以称作苏北人。他在上海经营一家澡堂，这一行业同苏北人是有联系的，这一事实也可能有助于解释如下信念：这个最臭名昭著的汉奸是苏北人。

傀儡政府的多数领导人是否来自苏北是无法断定的。问题是，一批苏北人，或据称的苏北人，如胡立夫是众目睽睽地被牵连进去的。这个证据足以说明一种尚在流行的先入之见，即傀儡政府在上海是最被鄙视的集团。

除了把显赫的苏北人同傀儡政府的领导集团相联系外，许多上海市民还认为，上海确有大批的普通苏北人积极协助日本人。一篇文章的作者声言：“他们看上去那个样子很难看，但在日本人的卵翼下，他们倒真的神气活现起来了。要注意，对日本人态度友好的中国人多为戴袖章的人，也就是江北人。”另一篇文章指责一些苏北人被日本人“收买”当密探。在江湾，人们看到日本便衣领着手执利斧的苏北人。

一些苏北人被斥为受日本人雇佣充当“老板”去招募工人队伍。例如，一篇报道说一个江北“小工头”领日本人的薪水，招募了1000多名工人到闸北、江湾和吴淞，去为日本人干活。另一份报告披露，棉纺厂里的日本雇员收买了来自苏北的失业工人，让他们回老家，借口招募亲戚朋友去工厂做工，物色人员带到上海去为日本人干活。

关于苏北人通敌的报道并不局限于报纸。在公共租界街道上售卖的图册上配着像“被日本人雇为狙击手的江北人”“为日本人带去矿石，每天可赚30美元的江北人”“江北人在大阪商船会社码头附近的二三十艘舢板上进行走私军用汽车的活动”一类文字的插图。

公众对于通敌者的愤怒演变成对苏北人的公开袭扰事件。例如3月底，失业的工人们在日本棉纺厂见面，坚称原籍江北、在小沙渡路开棺材铺的老板、别名“鲍老子”的鲍文曾（音）是日本人的走狗，需要被严厉对待。在集会次日，工人们在他的店铺前组成了纠察队伍，“目的是袭击日本走狗鲍老子和他的江北拥护者”。

很难知道多数通敌者实际是否来自苏北，或者是否只是拿苏北人当替罪羊。可以肯定，在上海，许多为日本人干活的苏北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例如，中国报纸报道说：“从闸北逃入租界地区的难民昨天说，他们目击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强迫江北人引领他们去搜索闸北各居民区的每一所房子。”还有，如果说有关1937年日本进攻和1941年占领的实录完全是1932年事态发展的见证的话，那么很可能许多苏北人为日本人干活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为之，下列实录是那个时期的典型报道：

我现年43岁，M/P.W.D公路苦力第524号，江北高邮人，现住平凉路隆义里58号。我干公路苦力10多年。1941年2月14日早晨6时，我离家到沙泾路仓库去报到。上午7时，.....我被分派同其他11人一道去杨树浦和贵阳路拐角处干活。我们是经鸭绿路、周家嘴路、茂海路和杨树浦路到达上述地点的。这些苦力中的10人离开去吃早饭而我同P.W.D公路514号苦力继续前往前述地点。在去松潘路市场途中，我们遇到了6名日本兵，两名站在路的一边，其余站在路对面，他们止住了我们，把我们同其他8个人一起带到杨树浦路上的永安纱厂仓库，在那里的一楼我们遇到了大约300至400名中国男工，他们也是被日本兵强行带到那里去的。日本兵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块长黄布，命令我们系在右臂上。

假如这样的事——这是1941年日本占领期间苏北人和非苏北人复述的——发生在1932年日本进攻期间，那么，被迫佩戴袖章和为日本人干活的苏北人，就根本不是热情的乃至心甘情愿的通敌者。

有时，对苏北人通敌的偏见会危及个人的职业生涯。例如，1936年，法国警察的中方首席侦探程子卿被指控替日本人做间谍，而实际上他是在为法国警察收集中国军队在各地的调动信息。新闻报道总结道：“这引来了一次误解。尤其是由于这名官员是江北人，而国人普遍认为多数江北人都是日本间谍。”对程的指控随后被撤销。

评估一些苏北人通敌的程度时，最后一个问题必须加以考虑：报纸记者（或这件事的普通目击者）如何能肯定他们所看到的那个帮助日本人的人就是苏北人呢？他们也许看上去穷苦，穿得像农村移民，但其实并没有听到他们讲方言，而在那种情况下要听到他们讲方言是不可能的，不清楚人们怎样断定谁是苏北人谁不是苏北人。更加不大可能的是，日本入侵者能把苏北人同中国其他汉人区分开来，单独把苏北人挑选出来并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去招聘他们。因此，说大多数通敌者都是苏北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预设——这种预设反映了先已存在的对苏北人的蔑视，也反映了要把通敌归咎于某种人的需要。

鉴于1932年的遗产，人们可想而知，后来日本进攻并占领上海更加深了关于江北人通敌的信念。然而，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此情属实。许多苏北人实际上只同当时的傀儡政府有染。常玉清，人皆以为他是1932年的通敌者，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其与日本人有染而名声更大。此外，高邮人吴世宝，据称因相貌丑陋，身材怪异而得了个绰号，叫“烂冬瓜”。他是日本统治下的警察部队的重要人物。尽管如此，苏北人作为一个集团似乎并没有被单独列举出来或充当替罪羊；也许是最臭名昭著的通敌者汪精卫是广东人，这一事实使人难以认定苏北人是问题的根源。也有可能，由于后来的进攻火力更猛，地域规模更大，这一时期出了更多的

江南出身的通敌者。如果更多江南人联日，就更加难以单指苏北人为坏蛋，即使先前一个时期也有这么多人通敌。

尽管1932年的日本进犯同1937—1945年的战争相比为时短暂，但它对建构和丑化苏北人这个类别的影响却要深刻得多。后一个时期的苏北人不再被认为更倾向于当通敌者这一点并不能消除前一个时期已经形成的看法。

苏北人的团结

1932年日本的进攻是否促使苏北人接受了苏北这个类别了呢？它是否在他们之间构建了一种团结意识，即使仅仅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而团结？乍看起来，日本的进攻似乎是为数不多的可被认为有明确苏北意识记录的例子，这种苏北意识就是苏北人公开宣布苏北身份的意识。为反驳对苏北人的有关指控，淮安、扬州、南通这三个苏北居民区的同乡会成立了联合办事处。联合办事处的成立公告对不公正地责难这三区的人表示悲哀：

这些人竟敢照“上海习惯”行事，指责不讲上海话的人是“江北汉奸”。例如，一家当地报纸发表一篇文章指责江北人是汉奸。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负面影响；每个人都感受到威胁和上了黑名单。……汉奸这个词同江北人毫无关系。汉奸这个词原本指忠于清朝的汉人。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用这个词来攻击江北人只会分裂中华民族和帮助日本人。

苏北（或江北）人是不是一个有内聚力的类别，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出；公告只是要捍卫他们的名誉。

除了在组织上作出回应以外，许多苏北人居住区的人士都发表了各自的辩护言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诉诸苏北（而不是更局部的扬州、盐城或其他）身份。有位人士在他写给当地一家杂志编辑的信中抱怨说：“对于某些来自江北的人来说，走在街上听到人们取笑我们，其心情比在外国做一个中国人还要糟。”他批评公众把他认为的只是极少数苏北人通敌的活动归咎于所有苏北人的做法。

其他苏北人不去纠缠那些指控，而是激励同胞要立身行事更加爱国。淮安、扬州和南通旅沪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发表一份声明，尽管对指责苏北人是汉奸感到遗憾，但声明承认，“我们中的有些人完全丧失了良心和理智，帮助了敌人”。

它决心调查苏北人为敌所用的案件，扬言要严惩那些被发现犯有通敌罪的人：“任何被发现从事此种没心肝活动的人都将面临其乡间全部家产的没收，在城里则被处以死刑。对那些损害我们江北人名誉的汉奸决不予以怜悯。清除我们中间的汉奸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江淮同乡会同样派员调查苏北人为日本人效劳的案件。同乡会并不是关注苏北同胞为日本人效劳的唯一组织。据一份报告称，一批身为知识分子的苏北人印刷并邮寄传单，号召苏北同胞不要为日本人做事。传单一开头就说：“亲爱的富有同情心的苏北同胞们，我们早已意识到你们日常生活的性质，但是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请你们务必暂时忍受，我们以后会找到办法来帮助你们。你们不能只想到你们自己的狭隘利益。请不要帮日本人杀人放火……觉醒吧！觉醒吧！”传单的署名为“一个含泪的江北人”。

同乡会和知识分子的这些话可以解释为苏北人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有内聚力的集团，或者至少是对江南精英强加给他们的苏北人称号表示承认和接受的标志。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他们都指称自己为苏北人，并为臆想中的同类人承担责任。

不过，这些言论并不表明所有的，或者哪怕是大多数苏北人赞同这种信念。相反，这是苏北人“精英”集团成员发出的呼吁并就此表达的某种族群忧虑：知识界担心那些不富裕、受教育少的同胞们的活动会给自己的声誉抹黑。多数穷苦苏北人如何回应指控和回应他们同胞的呼吁尚不清楚。

苏北团结，即使只是精英间的团结，在日本进攻的背景中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正如对其他的族群认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外部人所加诸的“族群团结”被当作反击偏见和敌视的一部分。乔纳森·萨纳在一篇论述从移民到族群的过渡的文章中争辩说，是逆境促使移民来到美国以超脱其乡村身份，接受外部人加诸他们的国家认同。如果说上海的苏北人曾经历过一个时期的逆境，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不过，1932年间所经历的那种逆境似乎并没有导致苏北人自己持久地接受苏北人这个类别。相反，一旦对苏北人的敌视平息下来，这种短命的、以

阶层为基础的认同感便烟消云散了。较之对苏北人自己的认同意识，它对上海“精英”集团关于江北人类别信念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也持久得多。

1932年的日本进犯是苏北族群建构中的一个异常独特的插曲。它戏剧性地说明了政治是如何与经济地位和地理区域相互交叉的，不仅加固了对苏北人的偏见，而且加深了那种认为这个被人鄙视的集团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社会类别的信念。对这样一个类别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加剧了，因为上海人需要一个替罪羊，需要一种解脱他们自己潜在罪责的手段。因此，苏北人的含义在1932年事件期间扩大了。这个类别不仅说明贫穷落后，而且也包含了通敌者和麻烦制造者。

日本的进犯也是政治影响苏北族群的一个最明显可见的例子。然而苏北族群的发展无疑被其他不那么轰动的事件所打断，这些事件未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不显眼的。例如，缫丝厂女工在1924年着手组织工会，一位工厂主处理劳工动乱的办法是解雇所有来自苏北的女工，而不管她们是否卷入此事。可能参与组织的江南工人却未被解雇。据至少一份报纸报道，此次缫丝厂女工的工会活动，苏北人被认为是问题渊藪。无法断定在罢工期间或其他事件中苏北人是何等经常地被当作替罪羊。但这篇报道表明，他们比历史档案文件所载更为经常地被视为政治问题的起因。

在此类事件中，如同1932年日本进攻一样，流行信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界线，较之分析苏北人的住房和就业，更加难以区分。本来已经是贬义表述的江北人是否被引申到包含新近成为问题的人群？或者，认为苏北人在政治上有问题的那种认识是否说明他们作为贫苦的下等阶层被丑化？这两个动态很可能分不开，但它们同等地构成苏北移民转变成受鄙视的“江北人”的基本要素。

第七章 1949年后上海的苏北人 无形的不平等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时，它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分析和消除那构建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平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政治运动旨在消除阶级压迫及消除汉族人对认同为少数民族，如苗族、壮族等各族人民的歧视做法。与此同时，许多籍贯基础被根除了：同乡会被废除，从1958年起，禁止农村人口移居上海一类的城市。苏北人是族群歧视的受害者，在新社会人们指望苏北问题得以消除。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40年以后，前几章所说过的一些现象依然存在。尽管官方强调阶级划分，但以同乡划线为基础的隔阂，特别是苏北/非苏北之间的隔阂仍然是上海社会民众类别化的一幅画面。尽管文献资料方面的证据甚少，但对苏北人的流行偏见却依然存在；这种偏见在漫不经心的交谈中被经常表现出来，可以通过正式访谈和社会调查予以证实。简言之，苏北人仍然被视为一个独特的族群，并作为族群运作着。

当代上海的苏北居民与1949年以前略有不同。首先，今天上海多数所谓的苏北人并非出生在苏北；他们是移民的儿孙一辈，有些是曾孙一辈。他们在体貌特征上与其余上海居民已无法区分，只有语言表露其身份。虽然当代大多数苏北人讲普通话或上海话，但他们是在讲苏北方言和讲带有据说是苏北口音的北方官话的家庭里长大的。（至少有一位语言学家认为，懂上海方言的苏北人讲上海话带有明显可辨别的口音。）既然语言是唯一可识别的苏北人的标志，那些不带口音的人就能有效地掩盖其祖籍，至少可以掩盖到朋友们登门拜访听到他们的亲属讲苏北方言的时候。然而，与此同时，那些发音与苏北方言相似的人，即使他们并非来自苏北，都有可能被称为苏北人，南京人或安徽人常常遇到此类情况。

另一个特征区分了当代和1949年以前的上海苏北人。从历史上讲，压倒多数的苏北移民是逃离自然灾害和贫困的农民；引人注目的是，在上海政治经济精英行列中很少有苏北人。这一切在1949年起了变化：在跨过长江解放上海的大批队伍中，大多数人来自苏北。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被任命为市政府官员和干部。苏北人有着良好的政治威望，因此，在1949年以来的几十年中，上海的苏北社群不仅由体力劳动者构成，而且也有政治精英分子。

1949年以后，界定和重构苏北族群的政治环境也大大不同于过去。上海不再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那个半殖民地通商口岸，也不再有一个外国控制下的行政当局或占领军去影响社会类别的建构和含义。相反，1949年以后上海的族群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背景下建构的，它在确定可接受的类别方面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所做的，要介入得多和积极得多。籍贯及苏北人，不是国家认可的一种类别，但由于下文探讨的种种原因，籍贯仍是意味深长的。

当代上海的傲慢与偏见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人们是怎样看待苏北人的呢？苏北人是否仍然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在运作？苏北人这个类别仍具深远意义，最直接显眼的证据是语言，说到苏北人时的贬义性提法充斥于上海人的语言中。“江北佬”等称谓，仍然是上海方言中的骂人话之一。这些术语不仅用以指某个名副其实的苏北人，而且也用以斥骂某个地位低下或不讲道理的人。例如，说话粗俗的人被斥为“讲江北方言”；未能达到清洁标准的人被讥为“脏，不卫生，像江北乡巴佬”；在拥挤的上海公交车上推搡的人被指责为“像粗暴的江北人”等等。

就连苏北方言本身也受到了偏见的冲击。以藐视一切非上海方言而出名的上海人特别把苏北方言列为不令人喜欢的方言。一位（江南籍）历史学家本人对苏北人在上海面临的问题很敏感，他竟脸不红心不跳地宣称：“苏北方言真难听。例如在普通话中，人们若要问某某东西在何处时就说‘那里’。在上海方言里，我们说‘啥地方’，那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吗？”

但苏北人说‘拉块’(la kui)。你不得不承认这真难听，对吧？”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北方言是外来的、令人不快的信念，导致一些中小学教师（多数不是苏北籍）拒绝苏北人来教普通话。他们声称苏北人没什么用，因为苏北人学不好普通话。如果说操着比上海方言更接近普通话的苏北方言的人来教普通话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更多的教师在试图将上海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时没有类似的无力感。

审美观也反映了那种认为有一种独特的苏北风格的信念，因为任何带有苏北味的东西都受到嘲笑或责难。买一块鲜红色布料或穿一件红衣服就会引来朋友们或旁观者的评论，“难看死了——好像是江北人穿的”。一位年轻妇女回忆道，只要小学同班女同学的头发上扎根红丝带，朋友们就会模仿苏北方言叫她“小三子”——因为据说苏北人给他们的孩子以数取名：小三子、小四子等等。

对苏北人的偏见还延伸到大众文化。20世纪50年代，来自淮安的周恩来为上海的淮剧剧场题名，除了有过这样一个短暂的荣耀时刻，上海的苏北地方戏演出仍然较少。我力图说服几个中国朋友陪我一起去观看淮剧演出，但我的努力没有成功；负责为我的研究做安排的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确信淮剧会使我失望，相反他们给了我更有名气的绍兴戏的戏票。苏北人居住区的居民抱怨淮剧演出不常有。上海淮剧团的成员们激动地诉说他们有时遇到的冷遇。如前所述，当我随同淮剧团参与为期两个月的苏北之行时，演员们欣喜若狂，因为一个外国人的光临给他们增添了许多风光。

大众文化不仅反映了对苏北人的偏见。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使这种偏见持久化。这在滑稽戏的演出中最明显。丑角由某个苏北人或讲话带苏北口音的人扮演；苏北方言往往是调侃的对象；只要角色里有黄包车夫或小皮匠，就称呼他们为小三子、小八子（参见上文），由其他角色模仿苏北方言来发音。这很像美国大众文化里的山地人（即电视连续剧《贝弗利山人》）。

文学也是既反映了对苏北人的偏见又使这种偏见持久化。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里，被描绘成乡巴佬的主人公不出所料地来自苏北。例如，在周而复描写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人与资本家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中，一个来自苏北的张姓干部被描写成“穿着一身灰布人民装，里面的白衬衫的下摆露了一截在外边。脚上穿了一双圆口黑布鞋子，鞋子上满是尘土，对周围的环境与事物都感到陌生和新鲜”。于是乎，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在同一家医药公司的业务往来中被蒙骗了。

坚持要把苏北人界定为一个有内聚力的受偏见影响的社会类别的倾向在找对象方面得到了最具体的表现。一些托人介绍理想伴侣的人通常会提醒朋友们记住他们的择偶要求：必须不是苏北人。就连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婚姻介绍所也告称，上海年轻人登记择偶意向时，许多人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考虑被介绍给苏北人。“除苏北人以外，人选不限”“南方人”“不要苏北人”等等是填写登记表

上常见的。表格上有这样的问题栏：“你对配偶的家乡有偏好吗？”这本身就强调了籍贯持续的重要性。

许多本来是令人满意的一对在获悉一方是苏北籍人时散了伙。青年女作家王小鹰追述了她的一个表兄弟的困境，他谈了两年的女朋友是苏北人。他的母亲一听到女方的苏北口音就反对这桩婚姻，这一对年轻人于是分手。一位年轻的苏北人愤怒地哀叹他遭到的拒绝：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母亲为我介绍对象一事。在我与女方见面前，双方彼此已交换过照片，对各自的条件也都满意，应该说，此事十之八九会成功的。那天，母亲带我去陕西路口的“粤海”酒家相亲。餐毕，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我与女方一路散步到外滩。几天后，母亲传来口信说，对方不谈了。我听了有点莫名其妙，心想，难道我的相貌与照片相差得如此之远吗？又过了几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得知，女方因为听我母亲说一口“江北话”，不堪忍受才吹掉的。

还有一位年轻人，其父来自山东，其母来自扬州，他追述说，他未婚妻的父母迫使他们的女儿毁了婚约。“我的来自山东的父亲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就是不能容忍我母亲是扬州人因而我是半个苏北人这一事实。”一位大学毕业生对他的许多女朋友一知道他的苏北出身就回绝了他感到泄气和愤怒，以致他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要求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去工作。“我一到其他地方，北方人全都尊重我，以为我是聪慧的‘南方人’，但我一回到上海，人人都嘲笑我是‘苏北人’……我最好还是生活在别的什么地方。”

统计数据证实了此类态度。198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上海年轻一代苏北人大约70%同其他苏北人结婚。1986年上海闸北区的婚姻登记档案甚至更为极端：大约80%的填明原籍苏北的人选择苏北籍配偶。而且，不同籍贯成婚的案例中75%的新娘来自苏北，这表明，嫁给南方人对于苏北籍女性来说就是某种形式

的高攀。正如一位苏北籍的官员所解释，“我有七个女儿，没有一个愿意嫁给苏北人；她们全都希望改换门庭”。

上海人被问及何以不愿同苏北人结婚时，他们提出了几种解释。第一是把苏北人同贫困相联系。较之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成员一听说同工人结婚就感到不屑的态度，经济地位问题的含义更复杂些。至少在工人中，苏北人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下层，作家张辛欣在她的纪实作品中对所采访的一位年轻女性的评述就是明证。这位女性的未婚夫的父亲曾反对他俩的婚姻，因为女方的家庭来自“下只角”，即上海工人阶级居住区，而男方家庭则来自“上只角”。她是工厂里的一名技术工人，她的未婚夫是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然而对她来说，像她那样的“下只角”普通居民同苏北人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她解释说：“江北人全都从事低等职业。他们是澡堂、理发店和环卫站的杂役。如果他们的子女不做这类工作，那么他们的父母是做这种工作的。因此，你不能嫁给江北人。让那些江北人去找其他江北人结婚吧！”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同苏北人结婚被认为是社会阶层地位的向下流动。

然而，要害问题不仅仅是地位和阶层问题，苏北籍官员在为子女寻找对象时所遇到的困难说明了这一点。一位青年历史学家解释道，“苏北人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习俗问题”，苏北人作为伴侣之不可取，是对他们和上海人之间在习惯和习俗方面之差异怎么看的信念问题。在上海一个苏北人占优势的区里的文化站站长是上海本地人，他对为什么苏北人难以和宁波人通婚这个问题提出了如下解释：

苏北人和宁波人的习惯很不相同。宁波人要讲究得多。例如，他们做糖桃（甜汤团）：宁波人做得很小而又十分精巧，苏北人做得大而粗糙。或者如做烤麸（面筋球）：宁波人油炸得透，加糖，用油多，而苏北人不讲究调味。做素鸡（用豆腐皮做）也是这样：苏北人炸一下就吃，而宁波人还要加酱油。

他断言，这些差异可能使一对夫妻水火不相容。一位年轻妇女附议：她在登门拜访了男方的家，吃了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以后取消了同那个男子的婚约。“上海人会认为皮蛋是一种精品，精品应当用小量上菜。我认识到如果我嫁给这个男人，那就会非为这样的事情争吵不可。”性格上可感知到的差异加剧了这个问题：苏北人据说“直率粗放”“说话声音较响”“像吵架似的”“逻辑感不一样”“用钱小家子气”。有几个人的兄弟或姐妹同苏北人结了婚，他们抱怨说，由于生活在苏北人居住区，这些“粗俗的”苏北习俗取代了从前的文雅举止。有一个人的妻子是苏北人，他同她一起住在上海的“上只角”，他不让他们的孩子去看望住在“下只角”的外公外婆，怕孩子会染上苏北人的不良习惯。

这些关于上海人与苏北人之间文化和个性差异的信念也在住房分配上反映出来。许多上海居民会千方百计避免同苏北人毗邻而居，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或社会地位如何。一位年轻人的楼下邻居是苏北人，年轻人宣称：“没有人希望靠近苏北人住，因为他们同我们太不一样了。”他抱怨：“他们整天玩讨厌的流行音乐，他们关门砰砰响。”希望同苏北人保持距离的愿望也表现在雇用保姆上。上海静安区一家保姆介绍服务中心的主任说：“人人都宁愿要一个浙江保姆而不要安徽保姆。他们宁要安徽保姆也不要苏北来的保姆。”当要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有此倾向时，他断言，问题在于有关上海人与苏北人之间文化差异的信念，使上海人讨厌家里有苏北人。

因此，从上海人的高点看问题，苏北人依然是一种不同的族群秩序：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地区，讲不同的方言，不仅相对贫穷，没怎么受过教育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个性特征。这些差异实际是存在的，还是被上海人扭曲和夸大的（犹如19世纪中期英国人扭曲和夸大同爱尔兰人的差异），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下事实：上海居民相信差异存在。他们还在鼓吹和操纵出生地、语言和文化习俗来树立界标，从而维持我们/他们的两类划分。

苏北人自己的看法又如何呢？他们对苏北身份的承认或接受自1949年以来是否有了变化？乍看起来，似乎苏北人已经默认了他们的地位。这种羞耻感最明显地表现为他们不大愿意承认他们的原籍。例如，我结识多年的一位学者只是在读了我写的有关上海苏北人的文章以后才终于披露了他的苏北籍。他首先赞扬我在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然后好像披露某种深藏的秘密似的悄悄说：“我父亲来自苏北，所以我其实是苏北人。”

若问苏北人有关他们家的祖籍，他们的回答具有典型性：“江苏省”。在正式证件上，苏北人也通常将籍贯填作“江苏”。例如，1986年在闸北登记结婚的一大批伴侣都填作“江苏”而不填具体原籍。一位负责登记档案的官员指点我：“你可以肯定，凡是填写‘江苏’的人其实都来自苏北。他们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究竟来自何地。”稍后时期，一些苏北籍人要求当地派出所官员允许他们改籍贯，以便保护他们的子女不受歧视。

即使是在正式的访谈中，当我问到被采访者来自江苏省哪个地区时，苏北人也不大愿意回答。只有在我请他们在地图上将他们的原籍地指给我看时，这才清楚他们来自苏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来自江南的人从不迟疑地宣称他们来自无锡、常州或宁波。198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来自苏北的学生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的家庭来自南京，尽管她家原籍其实是南通。小说《小尤外传》描绘了否认原籍的故事，小尤刚刚受雇于上海某出版社当厨师，他一再坚称他来自长江中的一个岛扬中，而不是来自苏北。他的上司宁波人何东海有一次问他：“小尤，你来自江北？”

“我？.....不，我不是.....”

“不要怕承认嘛！”何东海说，一面搅拌着鸡蛋。“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北人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光荣。现在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看不起江北人。”

“我不是江北人，我是太平洲人！”小尤争辩道。“我说你来自江北。你强调个屁！”

“你真唠叨！你才强调个屁！”小尤发火了，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上海的苏北人往往费很大力气来掩盖其身份。最常见的办法是，他们在家外或在邻里不讲江北方言，部分是为了避免惹麻烦。但也是为了确保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苏北人身份。最年轻一代的成员就连在家里也不想讲苏北方言。上海淮剧团的一位导演抱怨说：“我们的孩子不想讲苏北话。即使在家里他们也不想讲上海话。”一位干街道清扫工的妇女持稍稍不同的态度：她为她的儿子能掩盖他的背景而自豪。她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们在家里讲苏北话，但一走出去，就讲上海话。我们的孩子学上海话很容易，因为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上学。我的大儿子出去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苏北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上海人。”

语言是苏北人试图掩盖其不体面身份的最明显最常见的办法。较不常用的办法是他们同苏北文化的其他方面脱离关系。例如，上海淮剧团的成员们抱怨上海苏北家庭的年轻人不肯去观看淮剧演出。尽管电视和电影越来越普及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点，但这也反映了他们怕被指认为苏北人。一位淮剧女演员指出：“他们觉得若去观看淮剧就有失面子。”一位导演补充说，苏北人家里经常为苏北戏起内讧：年轻一代人激烈反对他们的父母想在电视上看到苏北剧目演出的愿望。这不仅是因为烦扰了他们，而且还因为他们怕家里展现苏北文化可能被别人看见。

有些人以自己是苏北人为耻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致有些在上海长大的年轻人竟同他们的父母完全脱离关系。有一位男子娶了一位有苏北人血缘关系的女子为妻，她是在上海的一个苏北人居住区里长大的，据那位男子说，他妻子决心同她的过去彻底决裂。她不让他们的孩子去探望住在杨树浦的外公外婆，怕孩子们受那个环境的不良影响。另一位年轻人追述说，尽管他母亲其实是安徽人，但人人都称她江北人。言外之意，他也是江北人。他后来承认，“我在童年时就知道，在上海，这个称谓是带有贬意的。因此就怕与母亲一块儿出门，即使出去，

也尽量不与她讲话，怕别人叫我‘小江北’”。他到寄宿学校去读书时，他的困境才缓解，寄宿学校里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他终于得以甩掉江北人这个称号。不过有时候，他要掩盖自己背景的决心使自己陷入痛苦的境地。他追述说，例如有一个周末他探家返校，忘了带钱交住校食宿费。

无奈，我只得打电话回家，让母亲送来。那天，我上课时，眼睛老瞅着教室门上的一个窗口，下课就倚着教室的窗户向校门张望，因为我不愿意母亲用“江北话”到处打听我，而由我主动迎上去把事情办掉。上第三节课时，我似乎看到母亲苍老的面庞在门窗上闪现了一下，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下课铃刚响，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从母亲手中接过钱，急匆匆地对她说了一句“快回家吧”，自己就返回教室里。母亲大约本来想对我说些什么，见我急得那样，迟疑了一下，也就转身下楼了。

他最后说他对自己这样粗暴地对待母亲感到愧疚，并就此结束了这番谈话。

这些要掩盖苏北背景的苦心——不愿披露自己的原籍，离弃苏北文化和语言，同双亲和亲戚拉开距离——全都证实了不易改变的看法：苏北人这个与江南上海人有差异的类别是存在的。掩饰自己的苏北身份反而更明显地暴露了对这个社会类别成员身份的承认。

有的人并不试图反驳苏北称号而是愤而谴责其负面含义，这就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对苏北身份的承认。原黄包车夫程德旺是一位著名的劳动模范，他讲述了自己在本意良好的熟人说“嗨，老程，苏北人哪能像你那么好？你实际上看上去根本不像苏北人！”时的愤怒。他愤愤地追述道：“一听到人们这样说我就火了。我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使我气得发疯。”上海一位女作家的愤怒采取了稍许不同的方式。冲着对苏北人的偏见，她义愤填膺，干脆公开声称她的出生地苏北是她的原籍，纵然她家的原籍其实是声誉更好的宁波。她在一篇题为《苏北姑娘》的文章中解释道：“我祖母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宁波人，因为我的曾祖父来自宁波。”“不过就连我父亲也已忘了宁波是啥样子的，我只在地图上见过它。”她

讲述了自己在苏北滨海县度过的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她的父母在20世纪40年代内战时期作为共产党干部驻扎在滨海县。尽管如此，她祖母还是一再告诫她，如果她自认是苏北人，她就永远找不到丈夫。她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对她祖母以此为耻感到气愤。她宣布决心只要有人问起她的籍贯她就说是“苏北”。一位同样不服气的年轻人，他已不再住在上海，他对苏北人的偏见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每当他造访上海时便有意讲苏北方言。

对偏见的愤怒谴责伴随着苏北人对他们的族群身份萌发出的自豪感，这同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形形色色的族群所表达的情感并无二致。认为“苏北美”的信念直接间接地表露出来。中老年人不顾子女的意愿，坚持在家里和在苏北人的邻里中使用苏北方言，这尤其证实了他们私下要维护一种文化认同而不是被同化的决心。一位环卫局工人在对滑稽表演中贬义地运用苏北方言的做法抱怨了一番后宣称，“但是我们喜欢讲我们的语言！”

这种自豪感比较明显地表现在拒绝某些人消极被动地接受那种认为苏北是一个贫穷落后、文化贫瘠的地区的流行观念，而是去探索和彰显苏北丰富多彩的历史。一位原籍扬州的理发师讲了一大堆他故乡的著名作家和官员。他骄傲地宣称：“还有乾隆皇帝三次亲临扬州！”1984年，复旦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对前来调查上海苏北人地位的社会学家们说：“其实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苏北一直比江南富庶。”他对南方人的骄傲提出异议，指出苏北一度很繁华，以至于江南人移居江苏省的北半部。他说：“那时不存在江南人看不起苏北人的问题。”另一些人视线转向晚近时期的历史去寻找苏北光荣的证据，周恩来来自苏北的淮安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个事实。上海是新四军解放的，战士们主要来自苏北，上海市委研究室的一位机关干部指出：“在目前区、县、局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相当数量是苏北人。苏北人分布在上海的各行各业上，在四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人在报上伸张苏北的骄傲。他写道：“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悦耳语言和难听语言，语言只有词汇丰富与否和语法精确与否的差别，上海话与苏北话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旗鼓相当，半

斤八两。……从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这一点来说，上海话反而落后了一步。”最后，他指出了苏北方言对上海话施加的影响。

不平等的结构

苏北人所表达的骄傲、愤怒和羞耻，同流行的偏见一样，都证实了苏北身份在当代上海的持续存在。然而考虑到1949年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废除同乡会、限制移民、促进以北方官话为“普通话”，又如何解释籍贯的持久性，尤其是对苏北人之偏见的持久性呢？

在上海提出的最常见的解释是，偏见只不过是历史的遗患，是革命前历史的残渣，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换句话说，苏北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还在继续运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族群始终在运作。例如，许多人解释他们蔑视苏北人时说，“1949年以前，他们是最穷的人”。他们的意思是说，1949年以来社会现实已经起了变化，苏北人其实不再穷了；苏北人与贫困的联系快成了陈年旧迹。

这种解释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因为以籍贯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苏北人和其他上海人之间的外表区别（如衣着）已不再那么判然分明，有些来自苏北的人已成为政治精英。然而，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偏见不仅仅是尚未消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比陈腐价值观的遗患更重要的是产生苏北族群的社会经济结构仍在某些方面有着一定的自然延续，这种结构使苏北人在文化和经济上继续处于边缘地位。

尽管没有系统的数据表明籍贯与就业地位的相互关系，但中国社会学家们所从事的初步调查表明，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内的上海劳工市场尽管性质大变但仍有按地区界线划分的，至少就苏北人在非技术性行业并实际成为其主力这一点而言是如此。例如，1958年的一份三轮车工人调查显示，77%是苏北籍人，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一份调查表明，压倒多数的浴室服务员和理发师来自苏北。苏北人与理发业的联系如此紧密，因而苏北方言仍是该行业的语言，就连非苏北籍理发师亦是如此。多数城市环卫部门工人仍是苏北人，即使在没有多少苏北人居住

的区里亦是如此。对苏北家庭不同世代成员的就业岗位调查表明，向上的流动性几乎没有。据一份此类调查，超过2/3的年轻一代成员干的是非技术性工作。同样，1984年上海一个苏北人居住区中学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档案与1949年前有着明显的相似性：不少人加入了上海失业青年的行列；获得就业的人被分配到工厂或建筑工程队，或者到城市环卫部门做清洁工。

要解释苏北人何以仍集中在上海劳工市场的非技术性行业里，就必须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配置过程，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只是偶尔有个别苏北人因其原籍而被取消工作资格。更为常见的问题出在教育上，同他们的大多数是文盲的双亲不同，苏北人家庭的多数子女获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接受更高级教育的则仍不多。上海苏北人居住区的年长居民夸口说能列举出通过大学考试的人，言外之意是苏北人同等地加入了大学生的行列。然而，这些街区的年轻居民指出，能上大学的人数很少，那些上了大学的人有此成就便成了街坊邻里的知名人士。

对于苏北儿童在学校里成绩较差所提出的最常见的解释是环境问题：他们是在缺乏教育传统的家庭和不利于学习的街区里长大的。一位在上海的一个以苏北人为主的居住区里长大的年轻人，以多少有点情感夸张的用语讲述了这个问题：

有的生后伴随着母亲的小提琴声长大，听着安徒生童话长大，躺在一大堆玩具和小人书中长大；可也有的被刷马桶的声音从噩梦中吵醒，又在刺眼冲鼻的炉烟中吃着开水泡萝卜干，而后去学校听由家庭妇女中招募来的教师讲课，再在大人们的打牌或吵骂声中做功课……

上海穷富居民区孩童之间的其他差别可能更为重要。在诸如静安、徐汇等富裕区里的孩子更有可能是在有保姆帮助料理家务的家庭里长大的。在工人居住区如闸北、杨树浦，几乎没有多少家庭雇得起保姆，因此靠孩子们放学后帮助做家务。也有人期望子女早就业，以此贴补家用。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在学校里成绩不太好就不足为奇了。

很难确定结构性的歧视是否也会阻碍苏北籍的年轻人在教育体系中表现得更好。实际的配额不太会被用到，如限制某些学校录取的女性人数。然而分配给苏北居住区的教育资源很可能比较少。据说那里的学校不如城市里更有声望的学校。大学毕业生很担心被分配到苏北居住区的一所学校教书，据说那里的学生“很粗暴，没有学习的动力”。此外，只有成绩最差的学生才会被分配到苏北居住区的学校，而他们更为成功的同学则期待能够分配到理想的上海地区。

当代作家程乃珊在其半自传式短篇小说《穷街》中描述了她在苏北居住区的一所学校执教时吃到的苦头，那里的学生极少按时上课，许多学生从不到校。她执教的中学与她成长的街区的市三女中之间的反差令她不堪承受。“女中的毕业生不是一路读到研究生便是出国当留学生；最起码她们能当医生或工程师。而另一所中学怎么能同它相比呢？在那里，校门口马桶朝天晾晒。”她追述了另一位教师给她的解释：“这些‘下只角’里的学生天生不是学习的料，所以你备课是浪费时间。我们的学校是劳动大军的预备学校。大多数学生会接过他们父母干的活——体力劳动职业。”

居住格局也促进了苏北人同贫困的持续联系。大多数苏北人不住在上海的闹市区或中心区（由原公共租界和原法租界组成），而是住在闸北、杨树浦、南市、普陀等工人聚集区。这些地区是1949年以前苏北移民的集中地，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前没有什么流动性。尽管没有统计数字来证实苏北居住区的居民不大能迁居到比较理想的街区去，我采访过的几乎每一个苏北人的子女都和他们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区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住房工程已经消灭了1949年以前最糟的棚户区，但这些居住区按当时说法，是上海的“下只角”，程乃珊在《穷街》里描述了她执教所在地爱国村，那里大约80%的居民是苏北人。她回顾了她的第一印象：“学校离我家坐公交车只要一小时，但在这一小时中，我好像是从第一世界来到了第三

世界。……（我）本来绝不会相信，在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中，竟还有这样的一个角落，因繁荣而完全被忽视了一角。”

将苏北居民区同贫困画等号不只是凭印象。例如，在南市，75%的居民没有厨用煤气，仍然必须在户外用煤炉煮饭烧菜；89%的居民家里没有抽水马桶，仍使用马桶。据一位作家说，所有的苏北居民区都只有“极少的文化和福利设施，糟糕的住房条件，是整个城市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住在其他地区的上海人认为苏北居住区环境差、犯罪多，警告他们的孩子不要前往所谓的“江北村”，称谓依旧，即使这些区里并非所有居民都有苏北根，这也许表明了江北人这个术语作为贫穷、落后、低等的隐语在继续发挥作用的程度。

苏北人仍然集中在劳工市场的非技术性行业，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在贫民区里，这有助于说明对苏北人持续的偏见及认为苏北人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类别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或许也加剧了对苏北人的偏见。初步访谈表明上海“文革”中的某些派别部分同原籍有相互关联。裴宜理在她的上海劳工运动研究著作中指出，“保守派”红卫兵以来自江南的熟练工人为主力，而“激进”的革命造反派领导人则来自苏北。而且，许多人认为最暴力的派别如活跃分子码头工人，是由苏北人组成的。认为苏北人在“文革”中是最暴力的流行观念比他们实际是否如此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种观念促进了甚至也加固了偏见。

对苏北人的固有偏见和苏北族群的依然存续，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国封建历史的残余。“苏北人”，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传统表述依旧流传至今，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新的偏执态度。

对苏北人仍有偏见并不意味着它的内容不变如旧。

若以为当代上海这种显而易见的偏见在整个1949年以后127—128的几十年间一直很强烈，那将是具有误导性的。尽管难以衡量1949年革命后不久的年代里

的偏见程度，但如果说上海人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赋予苏北人类别以不同于过去的含义，那么，苏北人自己所认同的含义也是如此。人们不再强调苏北人之根的具体县市，如扬州或盐城；在不得已认同他们的原籍时，人们就宣称是“苏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已接受了视苏北为有内聚力的类别的信念。同样重要的是农村移民的停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因此几乎没有什么青年人和中年人本人是在苏北某地出生或长大的。

第八章 籍贯的族群含义

在上海，籍贯承载着族群的含义。它是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建构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我们/他们两类划分借以立足的基础；也是主张和建构本土身份过程中最经常地求诸和操纵的界标。不能把苏北人简单地说成是一个移民群体或下等阶层，尽管他们二者兼而有之。只有把苏北人作为一个建构中的族群来理解，一如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或奇卡诺，以原籍为界的不平等结构和社会建构过程才会呈现出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籍贯的公示或归属所蕴含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地名的字面意义，而地名本身就可能是社会和历史建构的。因此，苏北不是指一个自然地点本身，因为这个地点实际并不存在。

如果说族群概念一定要有人们关于共同语言、血统和传统的信念——如果仍然把族群理解为原始纽带的一种运作——那么，说苏北人是族群将是一种严重的扭曲。但是，正如从艾布纳·科恩到詹姆斯·克利福德的人类学家们所论证的，共同语言与文化之类的概念本身是在历史上建构起来的，只有在同其他语言、文化和传统相比较时才会产生意义。因此，比如，墨西哥的北方人和南方人很可能从未想到过他们是讲同一种语言或有着同一习俗的，江苏北部不同地区的人也莫过于此。但是一旦墨西哥人移居美国，他们就作为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被混为一谈了。换句话说，他们有共同语言的信念，只有在把他们同北美人相对照并被后者界定为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类别时才出现。只有在他们移居时，他们才有了族群身份。同样地，正如柯娇燕关于中国满族的研究所表明的，在清代逐渐被认为是满族和自称为满族的人实际上在地理上、语言上和文化根源上是极其多样的。满族这个类别根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把他们引向同汉族接触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获得意义和改变意义的。苏北人在移居江南和上海之前，同样没有相同身份人群的意识，没有对于共同传统、语言或习俗的感受，抑或是同乡之感。苏北这个地名和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并不存在。它们不是由苏北人建构的，而是由江南人

建构的。在江南人看来，没有一个客观界定的叫作苏北的地方存在，这无关紧要。他们建构并界定了它，但并不总是自觉地或有意地，并不总是一贯地建构和界定它的。在他们看来，苏北首先是一个把来自北方的穷苦难民划为一类的术语，并以此来突出他们自己与这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江南人为了捍卫他们的优越感，可能夸大了语言、个性、文化乃至地理上的区别。

相信苏北是一个地方和苏北人是存在的这种信念，也许很可能是定居上海的江南人带来的。但是在上海，建构苏北人这个类别的过程加剧了，并有了全新的含义。从19世纪中期至1949年，来自江苏北部的人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以逃离贫穷、洪灾、干旱和战乱。尽管人们用尽气力阻止他们在上海定居，但许多人还是住了下来，搭建了临时住房，有的以船为家，或者用芦苇和他们能找到的其他碎片零料盖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接受了自己是苏北人的定义。20世纪30年代，苏北人的棚户区围绕外国租界形成了几乎是完整的一个圈。苏北人拼命干活，缺乏能胜任较高地位工作的技能和教育，无法建立能使他们进入这些工作的私交和组织关系，因此只能去干拉黄包车、当码头搬运工、贩卖蔬菜一类的职业，偶尔进厂干活。雇主和江南籍工人的歧视进一步促使他们只能从事那些工资低的力气活。

苏北人当然是移居上海的难民、棚户区居民、苦力劳工。他们甚至可能是上述这些集团的多数。但是，苏北身份有其自身的生命，它源于但并不限于苏北人自身经验的现实。因此，苏北其名被加诸几乎所有被人鄙视的集团身上：苏北难民、苏北棚屋居民。一个人并不非得是来自江苏北部才被称为苏北人。而且，非苏北身份的确立往往是人们为争取地位、好工作和自尊感而使用策略的基础。

对于江南人来说，苏北身份的建构和归属部分地确立了一个类别，对照这个类别，他们就能界定自己并最终以上海人身份自诩。江南情调界定了上海：逐渐被众人知晓的上海方言源自江南的吴语方言。它不同于并排除了苏北的方言；后来被界定为上海地方戏的剧种是以江南传统为基础的，与北方的淮剧遥遥相隔；

上海烹饪也源于江南风味。做一个上海人就是要像江南“精英”那样文雅和精明，同粗犷的苏北人形成鲜明反差。苏北成了界定上海摩登的反衬。

由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江南人也许尤其亟须把他们自己同苏北人区分开。从19世纪中期直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解体，外国在上海的势力不可小觑。尽管无法知道假如上海不是一个通商口岸，苏北人是否还会作为一个族群起作用，但事实上，外国人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城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中国居民中，江南人本该是无可争议的精英，但他们总是从属于外国人。外国人把所有中国人都描绘成是不文明的和落后的人，这是上海人摩登的清醒剂，事情到这个地步，江南“精英”就比其他情况下更亟须制造另一个类别了。

然而，苏北身份不只是江南人在上海作自我界定用的一面镜子。它也是暗指阶层的一种隐喻，因为苏北人的话语往往关乎贫富。甚至在江苏北部的人自己中间，苏北这个术语也意味着阶层，扬州人对待他们的更穷的北邻盐城人、阜宁人和淮安人的居高临下态度便是明证。

苏北人在上海的经历表明了籍贯的潜在阶层性。然而，正如族群不是阶层的同义词一样，也不能把籍贯简单理解为仅仅是一个暗指阶层的隐喻。这两者难解难分地连结在一起，但无论哪一个都不能归结为另一个。人类学家约翰·卡马罗夫指出：

族群及其意识的根源存于不平等结构的构筑过程之中，但是，一旦被客观化为借以组织分工的“原则”，族群就有了个人和群体不平等命运的首要推动者的自主性质。正如美国黑人工人阶级并不认为他们的黑皮肤是他们阶级地位的一种功能，而是把他们的阶级地位看作是他们黑皮肤的一种功能一样，卢旺达的下等阶级胡图族或博茨瓦纳的卡拉加迪人也把他们的地位看作是他们族群依属所致，而不是相反。

在上海也是如此，苏北族群有它自己的生命。因此苏北人认为他们低下的地位是其族群身份的一种功能，而不是相反。

苏北人自己很少抛弃其小地方身份以证明苏北意识，这同关于苏北人是个社会类别的信念几乎毫不相干。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江南人是“精英”，因此有更多的权力来确定有关按籍贯建构的社会类别和有关谁有资格称为真正的上海人的话语术语。苏北人有时对类别提出异议，但他们在争议中并不处于同等地位。人类学家布拉克特·F.威廉姆斯在一篇有关族群理论的批判性评论中指出：

有关在同一政治单位的居民中族群形成过程的人类学分析要求承认，并非所有的个人都有同等权力来固定我者/他者身份形成之坐标的。个人也不是同等有权宣布放弃选择身份命名过程，以便成为隐身者使对方的明显身份难以对照衡量。一旦我们问问那些认同自己为一个特定族群身份的人是否也能成功地对这个族群身份化说不，则所谓我者和他者的集团归属是在平等基础上划定的这种幻觉便悄然消逝了。如果他们的集团在这个政治单位中成为有支配权力的集团，这样的说不才有可能。

在上海，江南人是占有优势的族群，有权论定我者和他者。相反，苏北人不能“宣布放弃选择身份命名过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苏北人是族群形成过程中消极被动的行为体。他们也许不处于同等地位，但他们的确或多或少提出过不同于精英所强加的那些类别，这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对于许多江苏北部的人来说，江淮身份比苏北（或江北）身份更有意义。而且，他们通过坚持其本土起源和身份，抵制了充满负面情感的苏北类别。有时候，他们也明确地对归诸他们的负面特性提出过异议。

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整个近现代上海的发展中，关于苏北人类别的信念及对苏北人的偏见是流行思想中的不变因素。不过这些信念和偏见的强烈程度很可能因时而异，虽然难以找到文件佐证。更重要的是，信念和偏见的内容起了变化。对苏北人的偏见反映了人们对一个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人群的鄙弃。对穷人的蔑

视可能是偏见中最持久的组成要素，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这种蔑视穷人的偏见理解为静止的东西，因为苏北人贫穷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初通商口岸上海的所谓穷的含义与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贫困含义很不同。实际上，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的贫困结构（那时以穷为荣）也不同于伴随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而来的贫困（那时“致富光荣”）。

对于中国史的学者来说，对苏北人的研究带来了如下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籍贯族群建构的历史大背景。自19世纪中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以来，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运动的主旋律：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反日爱国运动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族群身份竟是在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时期形成的。人们可能会期待汉族能有大的统一，而不是内部的隔阂。而且，民族主义与狭隘的地方主义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民族主义鲜有超越地方认同和忠诚的。即使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以死灰复燃的族群暴力冲突为主的一系列事件，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不禁为民族主义情感的外表之薄、崩溃之快震惊。也许更切合上海苏北人个案的是史谦德在他关于北京工人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见解：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超越族群认同，倒可能提供了公开展示族群认同的场合。而且，族群认同的形成很可能有助于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令人不安的创伤性事件以结构和意义。

苏北人的经历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籍贯对于上海的独特性。是否只有在上海，籍贯才具有族群意义？对这个问题至少有四种可能的答案：只有在上海，籍贯才成为族群身份；在全中国的城市条件都可以成为族群身份；只有在通商口岸一类的城市里，籍贯才成为族群身份；在中国每个地方——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籍贯始终是社会建构的，且都体现在权力关系的体系之中。

人们可能会推测，在上海，有很高比例的人口由移民组成，这使上海的社会类别的形成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因为在上海，不论人们根系何方，几乎人人都

是崛起者，移民群体争相使自己的等级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紧迫性。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在苏北人被建构的道路上设置了另一条界线，这点前面已经提过。

只有在同样是通商口岸、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民城市的香港，才会谈到籍贯问题。人类学调查几乎全都认为或断言，原籍之根的确是作为香港的族群在运作的，籍贯形成了偏见和歧视的基础。也许不无讽刺意味，广东人中的偏见对象之一是“上海人”——这个社会类别不仅由来自上海本埠的人，而且还有来自华中、有时甚至是华北的人组成。

籍贯的族群功能是否延伸至上海、香港等贸易口岸城市之外，此刻是无法断定的，因为尚无其他城市的研究把这个问题作为调查的聚焦点。史谦德的北京研究和罗威廉的汉口研究都描述了起了类似族群社会作用的原籍群体。但他们提供的资料不足以探索籍贯如何影响流行文化、阶级结构和社会冲突。汉口居民聊天中流露出他们对河南人的蔑视，令人想起人们对待上海苏北人的态度。河南人被人瞧不起，被认为脏，没有风度，人皆避免与之结为伴侣。一位武汉人追述了他孩提时拜访过的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学同班同学的家，他家就在所谓的河南村，这位武汉少年惊讶地发现同学家很干净。至少一位作家看到了北京的“类似苏北人”现象，在北京的三河县人，他们历来充当理发师、澡堂侍者、女佣，被北京人瞧不起。换句话说，进一步研究表明，籍贯的作用，至少在汉口和北京，或多或少与上海的情况类似。原籍族群在地方研究中的相对不显眼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是需要更仔细地观察它。

将族群理论运用于上海苏北人的经历，使中国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历来在很大程度上被无视的族群、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映入眼帘。即使籍贯在中国并不总是具有——也许只是很少时候具有——族群含义，但对苏北人的分析显示，有必要大大修正对原籍的理解方式。不能再把它解释为字面意义上的、静态界定的、回答正式报表上要求填写问题的那个地点。一个人的原籍宣示不应当按表面价值加

以理解。相反，籍贯——不论在中国何地何时——都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建构。

为了揭示分析中国籍贯的新思路，这本有关苏北人历史的著作倚重于族群理论，这种族群理论并非主要来自有关中国或原籍本身的研究。相反，它聚焦于美国的移民和种族集团或非洲的部族集团。但是，研究中国背景下的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反过来凸显一定形态的族群认同——基于原籍的族群认同，这也许比以往已认识到的更加盛行于其他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本书涉及中国的族群建构，但是，籍贯的族群含义可能证明这绝非是中国特有的。

参考文献

Alley, Rewi. *Yo Banfa!* London, 1952. 路易·艾黎：《有办法！》，伦敦，1952年。

Ash, Robert. "Economic Aspects of Land Reform in Kiangsu, 1949-1952." *China Quarterly* 66 (June 1976): 261-292. 罗伯特·阿什：《江苏土地改革的经济面面观，1949—1952》，《中国季刊》第66期（1976年6月），第261—292页。

Averill, Stephen C. "The Shed Peop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Yangzi Highlands." *Modern China* 9, 1 (January 1983): 84-126. 韦思谛：《流民与江西山麓地区的开垦》，《近代中国》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第84—126页。

Baron, Harold. "Racial Domination in Advanced Capitalism: A Theory of Nationalism and Divis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In Richard Edwards et al., eds.,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75. 哈罗德·巴伦：《先进资本主义的种族统治：关于民族主义与劳工市场里的分工之理论》，理查德·爱德华兹等编：《劳工市场的分裂》，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D. C.希思公司，1975年。

Barth, Frederik. "Introduction." In Frede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9-38.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弗雷德里克·巴特：《导论》，弗雷德里克·巴特编：《族群与边界》，第9—38页。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公司，1969年。

Batteau, Allen W. *The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艾伦·W. 巴托：《阿巴拉契亚一词的铸造》，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0年。

Bernhardt, Kathryn.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

秉谦：《江北人三字》，《生活周刊》第7卷第20期（1932年5月21日），第311页。

碧翁：《上海的人力车夫》，《上海生活》第4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60—64页。

Blake, C. Fred.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柏桦：《一个中国集镇的族群与社会变迁》，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1年。

Blu, Karen. *The Lumbee Problem: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Indian Peop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卡伦·布卢：《伦比族印第安人问题：一支美国印第安族的形成》，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

Boyle, 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

Buck, Pearl. *The Good Earth*.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 1931. 赛珍珠：《大地》，纽约：约翰·戴公司，1931年。

曹卉：《江北妇女生活概况》，《女声》第2卷第10期（1934年2月），第10—11页。

陈德溥：《江苏的昆剧、锡剧和扬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26页。

陈果夫：《苏政回忆》，台北：正中书局，1951年。

陈业伟：《让南市旧区焕发新的活力》，《上海滩》第8期（1988年），第1页。

陈招娣（音）访谈录，上海第一棉纺织厂，1981年4月11日。

陈中亚、应廷甲、许志远、吴立江：《关于歧视苏北人情况的调查》，《社会》第3期（1983年），第23—26页。

程德旺访谈录，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1986年10月30日。

程金范（音）访谈录，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1988年8月4日。

程乃珊：《穷街》，《小说家》第2期（1984年），第4—99页。

China Weekly Review，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Clark, John D. 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and Celestial Empire, 1894. 约翰·D. 克拉克：《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上海：《文汇报》及《华洋通闻》编辑部，1894年。

Clifford, James.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詹姆斯·克利福德：《文化的困境：20世纪的人类学、文学与艺术》，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

Cohen, Abner, ed. *Urban Ethnicit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4. 阿伯纳·科恩编：《城市族群》，伦敦：塔维斯托克出版公司，1974年。

Cohen, Myron. "The Hakka or 'Guest People': Dialect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 *Ethnohistory* 15, 3 (1968): 237-292. 孔迈隆：《客家人或“客民”：作为中国东南部社会文化变量的方言》，《族群史》第15卷第3期（1968年），第237—292页。

Cohen, Ronald. "Ethnicity: Problems and Focu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7 (1978): 379-403. 罗纳德·科恩：《族群：人类学的问题与焦点》，《人类学年鉴》第7期（1978年），第379—403页。

Cole, James H. *Shaohsing: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6. 柯慎思：《绍兴：19世纪中国国内的竞争与合作》，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6年。

Cole, James H. "Social Discrim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o-min of Shaohsing."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5, 1 (February 1982): 100-112. 柯慎思：《传统中国的社会歧视：绍兴堕民》，《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第25卷第1期（1982年2月），第100—112页。

Comaroff, John.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 *Ethnos* 52, 3-4 (1987): 301-323. 约翰·科马罗

夫：《关于图腾崇拜与族群：意识、实践和不平等的迹象》，《族群》第52卷第3—4期（1987年），第301—323页。

Crissman, Lawrence W. "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Man* 2, 2 (June 1967): 183-201. 劳伦斯·W. 克里斯曼：《城市海外华人群体的分居结构》，《人》第2卷第2期（1967年6月），第183—201页。

Crossley, Pamela Kyle.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

Crossley, Pamela Kyle.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 1 (June 1990): 1-34. 柯娇燕：《关于近代中国早期族群的思考》，《晚期帝制中国》第11卷第1期（1990年6月），第1—34页。

《大公报》（上海）。

《大清十朝圣训：仁宗睿皇帝》，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Darwent, Charles Ewar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05. 查尔斯·尤尔特·达温特：《上海：旅游者与居民手册》，上海：别发印书馆，1905年。

Davis-Friedmann, Deborah.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April 1985): 177-201. 戴慧思：《代际不平等与中国革命》，《近代中国》第2期（1985年4月），第177—201页。

邓裕志：《访上海一家缫丝厂》，《女青年月刊》（增刊）（1928年11月），第9—10页。

定海路街道爱国村居民委员会成员访谈录，1988年8月25日。

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大阪，1908年。

Drummond, Lee. "The Cultural Continuum: A Theory of Intersystems." *Man* 15, 2 (June 1980): 352-374. 李·德拉蒙德：《文化连续体：体系理论》，《人》第15卷第2期（1980年6月），第352—374页。

Esherick, Joseph.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

范树平：《江北一线》，《江苏月报》第4卷第2期（1935年8月1日），第1—5页。

Fang Fu-an. *Chinese Labor*.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1. 方福安：《中国劳工》，上海：别发印书馆，1931年。

Faure, David. "Local Political Disturbances in Kiangsu Province, China, 1870-1911."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 科大卫：《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6年。

Fei Hsiao Tung (Fei Xiaotong). "Small Towns in Northern Jiangsu." In Fei Hsiao Tung et al., *Small Towns in China*.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6. 费孝通：《江苏北部的小城镇》，费孝通等编：《中国的小城镇》，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6年。

Fei Hsiao Tung (Fei Xiaotong).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1.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年。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

Finnane, Antonia. "Prosperity and Decline under the Qing: Yangzhou and Its Hinterland, 1644-1810." Ph. D. dissertati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5. 安东篱：《清代扬州及其腹地的盛衰，1644—1810》，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5年。

"Flood Damage in China during 1931."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10, 4(April 1932): 343-344. 《1931年间中国的水患》，《中国经济杂志》第10卷第4期（1932年4月），第343—344页。

傅湘源：《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外传》，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

Gaan, Margaret. *Last Moments of a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78. 玛格丽特·加安：《世界的最后时刻》，纽约：W. W.诺顿公司，1978年。

高义龙、乔谷凡、张弛：《筱文艳舞台生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Gates, Hill. "Ethnicity and Social Class." In Emily Martin Ahern and Hill Gate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241-28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葛希芝：《族群与社会阶级》，芮马丁、葛希芝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41—281页。

葛元煦：《沪游杂记》，无出版地点，1876年。

Gladney, Dru C.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杜磊：《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1年。

工业部外贸局编：《中国工业手册：江苏》，上海，1933年。

Goodman, Bryna. "The Native Place and the City: Immigrant Consciousness and Organization in Shanghai, 1853-1927."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顾德曼：《籍贯与城市：上海的移民意识和移民组织，1853—1927》，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90年。

Goris, Jan-Albert. Belgium in Bondage. New York: L. B. Fischer, 1943. 简—艾伯特·戈利斯：《被奴役的比利时》，纽约：L. B. 菲舍尔出版社，1943年。

Granovetter, Mark, and Charles Tilly. Inequality and Labor Processes. New York: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July 1986. 马克·格兰诺维特、查尔斯·蒂利：《不平等和劳动过程》，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论文系列，1986年7月。

Gregory, James.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詹姆斯·格雷戈里：《美国的〈出埃及记〉：干旱尘暴地区移民和加利福尼亚的俄克佬文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

Griffen, Clyde. "The 'Old' Immigr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 Case Study." In Richard L. Ehrlich, ed., Immigrants in Industrial

America,1850-1920, 123-15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7. 克莱德·格里芬：《“老”移民与工业化：个案研究》，理查德·L. 埃利希编：《工业美国的移民，1850—1920》，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23—150页。

顾叔平：《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0—366页。

顾叔平访谈录，上海，1986年11月19日。

Guldin, Gregory. "Seven-Veiled Ethnicity: A Hong Kong Chinese Folk Mode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 2 (June 1984): 139-156. 顾定国：《七重幕遮掩着的族群：香港的模范中国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卷第2期（1984年6月），第139—156页。

Hale, Charles. "Contradictory Consciousness: Miskitu Indians and the Nicaraguan State in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1860-1987)."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9. 查尔斯·黑尔：《矛盾意识：米斯基托印第安人与尼加拉瓜国家的冲突与和解(1860—1987)》，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89年。

Hamilton, Gary G. "Ethnicity and Regionalism: Som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Ethnicity* 4 (1977): 337-351. 韩格里：《族群与地区主义：影响东南亚华人认同的若干因素》，《族群》第4期（1977年），第337—351页。

韩沪麟：《姆妈是“江北人”》，《新民晚报》，1986年11月30日。

Handlin, Oscar. *Boston's Immigrants*. New York: Atheneum, 1972. 奥斯卡·汉德林：《波士顿的移民》，纽约：雅典娜出版社，1972年。

Harrell, Stevan. "Ethnicity, Local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 (1980): 515-548. 郝瑞：《族群、地方利益集团和国家：中国西南部的彝族社区》，《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32期（1980年），第515—548页。

Harrell, Stevan. "From Xiedou to Yijun, the Decline of Ethnicity in Northern Taiwan, 1885-1895." *Late Imperial China* 11, 1 (June 1990): 99-127. 郝瑞：《从械斗到义军，台湾北部族群的衰落，1885—1895》，《晚期帝制中国》第11卷第1期（1990年6月），第99—127页。

Hauser, Ernest O. *Shanghai: City for Sa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0. 欧内斯特·O. 霍塞：《出卖上海滩》，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40年。

Hershatter, Gail. "The Hierarchy of Shanghai Prostitution, 1870-1949." *Modern China* 15, 4 (October 1989): 463-498. 贺萧：《上海妓女的等级结构，1870—1949》，《近代中国》第15卷第4期（1989年10月），第463—498页。

何正华访谈录，上海新新美容厅，1986年11月12日。

何志广（音）访谈录，上海市普陀区工商联，1980年6月26日。

Hinton, Harold.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 3 (1952): 339-354. 哈罗德·欣顿：《清代漕运制度》，《远东季刊》第11卷第3期（1952年），第339—354页。

Hinton, Harold.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1845-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哈罗德·欣顿：《晚清漕运制度》，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韩起澜：《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纺厂女工，1919—194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

Ho Ping-ti.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ui-kuan (Landsmannschaften) in Central and Upper Yangtzi Province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 (1966): 120-152. 何炳棣：《长江中上游诸省会馆的地理分布》，《清华中国研究学报》第5期（1966年），第120—152页。

Ho Ping-ti.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June 1954): 130-168. 何炳棣：《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第17期（1954年6月），第130—168页。

淮安旅沪同乡会，上海市档案馆，6-5-993。

淮扬旅沪同乡会，1948年，上海市档案馆，6-9-246。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

黄人镜：《沪人宝鉴》，上海：美华书局，1913年。

Jameson, C. D. "River Systems of the Provinces of Anhui and Kiangsu North of the Yangzekiang."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43, 1 (January 1912): 69-75. C. D. 詹姆森：《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北地区的河渠系统》，《中国实录与传教士杂志》第43卷第1期（1912年1月），第69—75页。

《江北旅沪同乡服务社录启》，1946年，上海市档案馆，6-9-228。

江淮旅沪同乡会，1946—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6-5-954。

蒋君章：《江苏省史地概要》，《江苏研究》，第1部分，第1卷第8期（1935年12月25日），第1—16页；第2部分，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25日），第1—9页；第3部分，第2卷第2期（1936年2月25日），第1—9页；第4部分，第2卷第3期（1936年3月25日），第1—8页；第5部分，第2卷第5期（1936年5月31日），第1—7页。

《“江南”和“江北”》，《中国青年报》，1982年5月30日。

蒋三孝（音）访谈录，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1988年8月27日。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解放日报》。

金园：《江北人在上海》，《女声》第4期（1934年），第9—11页。

静安区环卫局工人访谈录，1986年11月8日。

《靖江妇女生活》，绿荷女士编：《中国妇女生活写真》，上海：广益书局，1934年，第71页。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查默斯·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权力：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Jones, Susan Mann. "The Ningb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73-9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曼素恩：《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伊懋可、施坚雅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73—96页。

Jones, Susan Mann, and Philip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p. 107-1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曼素恩、孔飞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07—162页。

Junkin, William F. "Famine Conditions in North Anhui and North Kiangsu." *Chinese Recorder* 43, 1 (January 1912): 79-80. 威廉·F.琼金：《皖北和苏北的饥情》，《教务杂志》第43卷第1期（1912年1月），第79—80页。

《看看江北人》，《晶报》，1924年3月1日。

Ko, Dorothy Yin-ye. "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Wome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9. 高彦颐：《走向17世纪中国女性社会史》，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89年。

Kraus, Richard.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理查德·克劳斯：《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冲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

Kyong Bae-Tsung. "Industrial Women in Wusih: A Study of Industrial Conditions."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WCA of China, 1929.YWCA National Board Archives. 龚佩珍：《无锡的产业女工：劳动条件研究》，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1929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档案。

Lamley, Harry. "Subethnic Rivalry in the Ch' ing Period." In Emily Martin Ahern and Hill Gate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262-3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蓝厚理：《清代的亚族群抗衡》，芮马丁、葛希芝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62—318页。

Laurie, Bruce, Theodore Hershberg, and George Alter. "Immigrants and Industry: The Philadelphia Experience, 1850-1880." In Richard L.Ehrlich, ed., *Immigrants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123-15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7. 布鲁斯·劳里、西奥多·赫什伯格、乔治·奥尔特：《移民和工业：费城经验，1850—1880》，理查德·L. 埃利希编：《工业美国的移民，1850—1920》，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23—150页。

雷景敦：《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毕业论文，沪江大学，1930年。

Lees, Lynn Hollen. *Exiles of Erin: Irish Migrants in Victorian Lond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林恩·霍伦·利斯：《爱尔兰的逃亡：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爱尔兰移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9年。

Leung Yuen Sang. "Regional Rivalr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Shanghai: Cantonese vs. Ningpo Men." *Ch' ing-shih wen-t' i* 4, 8(December 1982): 29-50. 梁元生：《19世纪中期上海的地区争衡：广州人与宁波人之争》，《清史问题》第4卷第8期（1982年12月），第29—50页。

Leung Yuen Sang. 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189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

李长傅：《江苏省地志》，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第1—83页。

李平衡：《中国劳动年鉴》，北京，1932年。

李天纲：《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析论》，洪泽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25—239页。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1907年。《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重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刘惠吾、朱华、苏智良、崔美明、孙果达：《上海近代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柳培潜编：《大上海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陆曼炎：《江南与江北》，《人言周刊》第1卷第9期（1934年6月23日），第389—390页。

鲁迅：《玩具》，《鲁迅选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54—55页。

骆美奂：《江苏江北各县的没落——其原因及其救急办法》，《江苏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12月20日），第69—74页。

罗琼：《江苏北部农村中的劳动妇女》，《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期（1935年），第107—109页。

马秀英访谈录，闸北区环卫局，1986年11月3日。

Mandel, Ruth. "Ethnicity and Identity among Migrant Guestworkers in West Berlin." In Nancie L. Gonzalez and Carolyn S. McCommon, eds., *Conflict, Mig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Ethnicity*, 60-74.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露丝·曼德尔：《西柏林移民客籍工人中的族群与认同》，南希·L. 冈萨雷斯、卡罗琳·S. 麦康芒编：《冲突、移民与族群的表达》，博尔德：韦斯特维尤出版社，1989年，第60—74页。

Mann, Susan. "Pariah Communities in Qing Socie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March 1988. 曼素恩：《清代社会里的贱民群体》，为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准备的论文，1988年3月。

Mann, Susan. "The Cult of Domesticity in Shanghai's Middle Clas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hina Regional Semin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vember 1990. 曼素恩：《上海中产阶级的乡土崇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地区研讨班准备的论文，1990年11月。

Mann, Susan. "Women's Work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Berkshir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Rutgers University, June 1990. 曼素恩：《妇女的工作与家庭经济》，为罗格斯大学妇女史伯克希尔会议而准备的论文，1990年6月。

《民国日报》。

Moen, Lars. *Under the Heel*.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 1941. 拉斯·芒：《在铁蹄下》，费城：J. B. 利平科特公司，1941年。

Muramatsu, Yuji.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the Late Ch' 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9, 3 (1966): 566-599. 村松祐次：《晚清民初江南的中国地主所有制证契研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第566—599页。

Murphey, Rhoads.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

南通旅沪同乡会，上海市档案馆，6-5-978。

Naquin, Susan, and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韩书瑞、罗友枝：《18世纪中国社会》，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

Negishi, Tadashi. *Chugoku no girudo (The guilds of China)*. Tokyo, 1953. 根岸佶：《中国的行会》，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3年。

Negishi, Tadashi. *Shanghai no girudo (The guilds of Shanghai)*. Tokyo, 1951. 根岸佶：《上海的行会》，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年。

North China Herald，上海《北华捷报》。

Ocko, Jonathan. *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incial China: Ting Jih ch' 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 1867-1870*.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欧中坦：《中国省份的职官设置改革：江苏恢复省建制时期的丁日昌，1867—187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83年。

O' Keefe, Thomas Andrew. "Consider the Racism in the Term 'Hispanic.'"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0, 1989. 托马斯·安德鲁·奥基夫：《细察“西属拉丁美洲的”一词中的种族主义》，《纽约时报》，1989年10月10日。

Ong, Paul. "Chinese Labor in Early San Francisco: Racial Segmentation and Industrial Expansion." Amerasia 8, 1 (1981): 69-82. 保罗·翁格：《早期旧金山的华工：种族隔离与工业扩张》，《美亚》第8卷第1期（1981年），第69—82页。

Ownby, David. "The Ethnic Feud in Qing Taiwan: What Is This Violence Business, Anyw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782 Zhang-Quan Xiedou." Late Imperial China 11, 1 (June 1990): 75-98. 王大为：《清代台湾的族群世仇：这不是暴力事件又是什么？1782年漳—泉械斗的一种解释》，《清史问题》第11卷第1期（1990年6月），第75—98页。

潘景安（音）访谈录，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1988年8月4日。

彭小明：《上海话与苏北话》，《新民晚报》，1985年8月3日。

Perdue, Peter.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濮德培：《耗竭地力：国家与湖南农民，1500—185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87年。

Perry, Elizabeth.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

Perry, Elizabeth.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89.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未发表的手稿，1989年。

Pott, F. L. Hawks.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8. 卜舫济：《上海简史》，上海：别发印书馆，1928年。

戚雨凡（音）访谈录，上海淮剧团，1986年10月30日。

戚再玉主编：《上海时人志》，上海：展望出版社，1947年。

钱乃荣访谈录，上海大学，1986年11月。

Richards, L.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Dependencies*. Shanghai: T' usewei Press, 1908. 夏之时：《中国坤舆详志》，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8年。

Rowe, William.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

Rowe, William.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

阮恒辉：《扬州腔上海话的语音特征》，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吴语研究室编：《吴语论丛》，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2—174页。

阮恒辉访谈录，上海大学，1986年11月。

Ruiz, Vicki L. "By the Day or the Week: Mexicana Domestic Workers in El Paso." In Vicki L. Ruiz and Susan Tiano, eds., *Women on the U. S. - Mexico Border: Responses to Change*, 61-76.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维基·L. 鲁伊斯：《按日计或按周计：埃尔帕索的墨西哥国内女工》，维基·L. 鲁伊斯、苏珊·蒂埃诺编：《美墨边界上的妇女：应对变革》，波士顿：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1987年，第61—76页。

Sarna, Jonathan. "From Immigrants to Ethnic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Ethnicization.'" *Ethnicity* 5 (1978): 370-378. 乔纳森·萨纳：《从移民到族群：走向一种“族群化”新理论》，《族群》第5期（1978年），第370—378页。

《上海港史话》编写组编：《上海港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档案，缩微胶卷（67卷）。

上海工部局警务日报，1925年，上海市档案馆。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17 and Budget for the Year 1918*.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18. 上海工部局：《1917年度报告和1918年度预算》，上海：别发印书馆，1918年。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1 and Budget for the Year 1932*.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2. 上海工部局：《1931年度报告和1932年度预算》，上海：别发印书馆，1932年。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2 and Budget for the Year 1933.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3. 上海工部局：《1932年度报告和1933年度预算》，上海：别发印书馆，1933年。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35 and Budget for the Year 1936.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6. 上海工部局：《1935年度报告和1936年度预算》，上海：别发印书馆，1936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 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上海《申报》。

上海《时报》。

纽约《世界日报》。

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编：《上海街道和公路营业客运史料汇集》，上海，1982年。

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上海，1950年。

上海市人力车业同业公会编：《上海工部局改革人力车纠纷真相》，上海，1934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经济计划处编：《上海私营工商业分业概况》，上海，1951年。

上海市商会编：《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上海，1947年。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10日），第99—113页；《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10月25日），第45—57页。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之工资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员访谈录，1987年11月13日。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施小妹访谈录，上海第一棉纺织厂，1980年3月11日。

Skinner, G. William. "Introduction: 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 ing China."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521-5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521—554页。

Skinner, G. William.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 Analysis." In Carol A. Smith, ed., *Regional Analysis*, 327-364. New York, 1976.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流动战略：一种地区分析》，卡罗尔·A. 史密斯编：《地区分析》，纽约，1976年，第327—364页。

Sollors, Werner.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维尔纳·索勒斯：《超越族群：美国文化中的同见与歧见》，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

宋锦添、卢芳萍、张兴华、黄培庆、黄振英、李磊：《上海群众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戏剧艺术》第4期（1984年），第31—38页。

Soong, James Han-hsi. "A Visual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en Po-nien (1840-1895)."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7. 詹姆斯·汉希（音）·宋：《19世纪中国的视觉经验：任伯年(1840—1895)和海上画派》，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77年。

Spence, Jonathan.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Penguin, 1978. 史景迁：《王氏之死》，纽约：企鹅出版社，1978年。

Stauffer, Milton T.,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Made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8-1921*.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司德敷编：《中华归主：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基督教势力的人数与地理分布普查，1918—1921》，上海：中华续行委员会，1922年。

Strand, Davi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

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

苏北海门流亡救济协会，1946年，上海市档案馆，6-9-219。

苏北难民救济会议上海办事处：《上海苏北难民救济报告》，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6-9-225。

苏北难民收容所，上海市档案馆，6-9-223。

陶寄天：《锡沪杭女工生活概况》，《民众运动》第1卷第3期（1932年10月1日），第111—121页。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屠诗聘：《上海春秋》，香港：中国图书编译馆，1968年。

Walder, Andrew.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魏昂德：《共产党的新传统主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Shangha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1927-193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89. 魏斐德：《上海公安局，1927—1932》，未发表的手稿，1989年。

Walker, Kathy. "Merchants, Peasants and Indust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Nantong County, 1895-1935."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6. 凯西·沃克：《商人、农民和工业：南通县棉纺织业的政治经济学，1895—1935》，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86年。

王敦庆：《游江北殖民地纪》，《上海生活》第3期（1926年12月），第17—18页。

王尔敏：《淮军志》，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

王宏光：《来自上海“下只角”的报告》，《青年一代》第4期（1985年），第56—57页。

王健民访谈录，上海淮剧团，1986年10月30日。

王南屏：《江北农村实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王小鹰：《苏北姑娘》，《解放日报》，1980年11月2日。

韦慧：《旧上海街头的露天职业》，上海文化出版社编：《上海掌故》，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69—76页。

Welch, Holmes.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尉迟酣：《中国佛教习俗，1900—195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

White, Lynn T., III. Polid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林恩·怀特三世：《致乱的政策：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暴力的组织根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

Williams, Brackette F. "A Class Act: Anthropology and 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1989):401-444. 布拉克特·F. 威廉姆斯：《阶级行为：人类学和种族穿越族群领域到民族》，《人类学年鉴》第18期（1989年），第401—444页。

Wolf, Eric.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吴良蓉：《上海市苏北籍居民社会变动分析》，上海社会学学会编：《社会学文集》，上海，1984年，第170—190页。

吴良蓉、蓝成东：《这是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绊脚石——关于歧视苏北人的采访纪要》，《社会》第3期（1983年），第27—31页。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7期（1930年4月10日），第59—70页。

吴元淑、蒋思壹：《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毕业论文，沪江大学，1933年。

夏克云访谈录，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1988年8月4日；1988年8月27日。

筱文艳访谈录，上海淮剧团，1986年10月10日。

谢俊美：《上海历史上人口的变迁》，《社会科学》第3期（1980年），第107—113、124页。

徐珂：《清稗类钞》，上海：三吴书店，1920年。

许连生访谈录，上海浴德池浴室，1986年11月12日。

徐平访谈录，上海，1988年9月1日。

徐世梅（音）访谈录，上海第一棉纺织厂，1982年10月10日。

许世英等编：《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上海：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1932年。

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0年），第160—178页。

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7—107页。

严芙孙编：《上海俗语大辞典》，上海：云轩出版部，1924年。

盐阜旅沪同乡会，1946—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6-9-956。

Yanagisako, Sylvia. Transferring the Past: Tradition and Kinship among Japanese Americ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柳迫淳子：《改变历史：日裔美国人中的传统与亲缘关系》，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

Yancey, William, Eugene Ericksen, and Richard Juliani. "Emergent Ethnicity: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3 (June 1976): 391-402. 威廉·扬西、尤金·埃里克森、理查德·朱利安尼：《新兴族群：重新探讨与重新阐述》，《美国社会学评论》第41卷第3期（1976年6月），第391—402页。

杨章福（音）访谈录，文化局、闸北区中兴街道居民委员会，上海，1986年11月4日。

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1946—1947年，扬属七县旅沪同乡会，上海市档案馆，6-9-949。

易君左：《闲话扬州》，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雨枝：《关于上海的失业工人》，《女青年月刊》第11卷第4期（1932年4月），第45页。

曾宪洛：《扬州清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149页。

闸北区环卫局工人和官员访谈录，1986年11月1日。

闸北区中兴街道居民委员会退休工人访谈录，1986年11月4日。

张家琦、班志雯：《上海棚户区概况调查》，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1948年。

章荣华访谈录，上海市闸北区环卫局，1986年11月3日。

张辛欣、桑晔：《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张耀忠：《上海闸北贫民区的地下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0年），第82—93页。

赵如珩：《江苏省鉴》，上海：新中国建设协会，1935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编写组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市文化局编：《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上海市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周殿元（音）访谈录，上海扬州饭店，1988年8月24日。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年。

周国珍访谈录，上海市闸北区环卫局，1986年11月3日。

周健：《不想当光棍，上海苏北人改籍贯》，《潮流月刊》，1989年3月15日，第58页。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远东出版社，1936年。

《抓紧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教学》，《光明日报》1973年6月25日。英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章概览》(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1973年7月9—13日，第98—101页。

朱烁渊访谈录，1988年9月1日。

朱彦：《小尤外传》，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

朱宗宙：《清代前期扬州盐商与地方文化事业》，《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1984年），第13—19页。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